



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
1922—1982）

2 023 1494 0

欧洲法西斯 主义比较 (1922—1982年)

[德国] 沃尔夫冈·维佩曼著

宋钟璜 张载扬译

东方出版社

EUROPÄISCHER FASCHISMUS

IM VERGLEICH

(1922—1982)

根据德国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坎普

出版社1983年初版译出

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 (1922—1982年)

OUZHOU FAXISIZHUYI BILIAO

著者/[德国]沃尔夫冈·维佩曼

译者/宋钟璜 张毅扬

封面设计/金 朔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本/727×1092毫米1/32 印张7.75 字数/160,000

版次/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256-6/K·62 定价 3.65元

中译本出版说明

本书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沃尔夫冈·维佩曼的著作。维佩曼教授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和现状研究有年，这本《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1922—1982年)》就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在书中叙述了意大利民族法西斯党、德国纳粹党的兴亡和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西班牙、法国的法西斯政党的历史以及英国、芬兰、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瑞士、挪威等国较弱小的法西斯运动和派别的情况，并论述了法西斯政权与其他政权的区别。此外，作者还对德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在战后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作了叙述和剖析。作者在书中特别对各法西斯主义政权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除了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之外，在思想意识、表现形式、目标和政治策略上具有共同之处，从而论述了法西斯主义的一般概念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印记。作者态度严谨，论述细致，因此本书可供我国学者专家和读者研究和了解欧洲法西斯主义时参考。

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论述法西斯主义的，他谴责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及其罪行，论述它的衰亡的某种必然性以及警惕蠢蠢欲动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必要性。同时，作者对共产主义缺乏认识，因此书中有些地方的论述是

不妥当或不完整的。比如，作者忽视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果，忽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大缺点。

本书译者为宋钟璜同志和张载扬同志。宋钟璜同志翻译第1章至第4章第5节及其注释，张载扬同志翻译第4章第6节至第6章及其注释。由于本书翻译中涉及多种外国语言，因此在此特向提供可贵帮助的陈祥超同志（世界历史研究所）、方生同志和林光同志（商务印书馆）和曹其宁同志（外交部）等表示谢意。

·1991年7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 1 章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论概念的意义, 历史和问题	6
第 2 章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17
第 1 节 产生和兴起	17
第 2 节 法西斯主义上台	26
第 3 节 抵抗运动和法西斯主义的没落	34
第 3 章 民族社会主义	39
第 1 节 产生和崛起	39
第 2 节 “第三帝国”	51
第 3 节 抵抗运动的成败	69
第 4 章 具有群众基础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76
第 1 节 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76
第 2 节 霍尔蒂政权和匈牙利的箭十字党人	88
第 3 节 罗马尼亚的铁卫队	94
第 4 节 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	101
第 5 节 长枪党和西班牙佛朗西斯主义	107
第 6 节 法国法西斯主义	121

第5章 规模较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	
派别和模棱两可的情况	112
第1节 划分问题	132
第2节 英国	134
第3节 芬兰	139
第4节 比利时	145
第5节 荷兰	151
第6节 丹麦、瑞典和瑞士的法西斯主义派别	155
第7节 居于派别和叛国党之间的挪威民族统一党	166
第8节 模棱两可的情况，斯洛伐克、波兰和葡萄牙	171
第6章 结束语：在政治和论战中间的新法西斯主义	182
综 述：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	197
注释	208

导 言

1922年10月28日，意大利国王委托墨索里尼组织内阁。一周后，在当时的彼得格勒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了。领导成员卡尔·拉狄克用以下的话评论了墨索里尼在他所谓的“向罗马进军”后所取得的成功：“我不仅把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看作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武器的一次机械式的胜利，而且我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自世界革命阶段开始以来遭到的最大失败……”拉狄克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提出以下的紧急警告：“如果我们意大利的同志、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不理解法西斯主义胜利的原因和我们失败的根源，那么，我们将会

经历法西斯主义的长久统治。”①

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对此则从一种对形势更加悲观的估计出发说：“我们必须明白在意大利发生的事决不是局部现象。我们将会在其他国家经历也许以其他形式出现的相同的现象，这是必然无疑的。……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整个欧洲中部和中心经历这一或多或少是法西斯主义变革的时期。”②

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富有预见性的预言在11年后得以实现。在德国，希特勒上了台，而在欧洲其他许多国家，成立了力量相当强大的法西斯主义政党。1922年10月28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和1933年1月30日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上台实际上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遭遇的“巨大失败”。难道一个“或多或少是法西斯主义变革时期”已经真正来到了吗？20年代和30年代的欧洲史可以把“法西斯主义时期”③作为其特点吗？能不能说，在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国家表现了“相同的现象”呢？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一方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以及以意、德为榜样的其他政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共同点是否真正大得足以认为它们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特性？现在能否还坚持像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60年前提出的一种普遍的、不加区别的法西斯主义概念呢？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运动在意大利和德国得以掌权，而在具有同样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其他国家里没有成功呢？这原因在于特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前提，还是在于非法西斯主义的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战略和策略呢？

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在目前60年的法西斯主义讨论和研

究中引起激烈的辩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此首先要叙述欧洲各个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历史。但其中将不仅指出法西斯主义者的行动，而且也要揭示非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活动：因为一些法西斯主义政党得以上台，而其他一些法西斯主义政党却未能达到这一目的，这决不只取决于各个法西斯头目的本领及其政党的吸引力，而首先取决于非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力量的政策。欧洲法西斯主义史同时也是一部反法西斯主义史。但只有考虑到存在法西斯政党的各国各自的条件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才能理解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成败。

因此，这些目标就是本书所要探索和叙述的内容。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选择了以下安排：

在论述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的意义、历史和疑问的第1章里将揭示出，意大利文法西斯（fascio）*联盟一词曾在19世纪被意大利左翼集团和运动所使用，后被墨索里尼的老战士组织和后来的党所接受，而且以后更多地被法西斯的反对者而不是信徒转用于其他非意大利的运动和政权。在概述这一概念的转意时清楚地说明，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一开始就置身于理论和论战之间。直至今日也没有多大改变。许多同时代人总是利用这一概念作为单纯的斗争概念，甚至用作可以替代的咒骂语。史学家们总还争论把非意大利的政党和政权划为法西斯主义是否正当，在意大利法

* 法西斯（fascio）来源于拉丁文 fascis，原指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一束棍棒，古罗马高级官员的权标，象征众人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和权力，也象征国家的权威。——译者注

西斯主义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某些差别是否比其共同点更大一些；简而言之，是否能坚持一种普遍的法西斯主义概念。

对于这个问题，只能借助法西斯主义的比较研究才能回答。下面几章就是为此目的而写的。其中首先概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结构（除运动和政权阶段外，也考虑了“抵抗运动”）。

在第3章内，叙述了民族社会主义史，在间时代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划归法西斯党的那些党中，它是唯一不靠外国帮助而独自取得政权的党。

然后在第4章内，叙述了具有群众基础的或至少一度参政的那些法西斯主义。随后在第5章里，写了那些既未上台、在人民中又得不到明显的支持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其中许多运动勉强作为无足轻重的小党而默默存在。但是，它们的历史却有两方面原因令人感到兴趣和教益。一方面是因为通过与获得较大成就的法西斯主义的鲜明对比，可以看到阻碍其上升为大政党的因素。另一方面这些较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值得考虑是因为这些政党同1945年后在欧洲各国产生的那些政党颇有相似之处。这些所谓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将在第6章内加以叙述。这表明欧洲法西斯主义史并没有在1943年或1945年已经结束，但这些所谓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规模和成就（至少直到现在）远未达到在两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所达到的程度。1983年的欧洲在许多方面不是1922年或1933年的欧洲。但历史是否将会以这一种形式或以另一种形式重演，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中能够

学到什么，愿意学到什么。

在综述中，将对这一无疑是关键性的问题进行研讨。在这里力图提出各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同时探究，何种因素促使各个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兴起，何种因素又使之发展困难。在这一概括中，将对法西斯主义的比较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正如在第1章里已经叙述的那样，其实，甚至今天，根据欧洲法西斯主义迄今60多年的历史，这些研究成果的综合还只是开始。

以本书来弥补这一研究空白，不是，也不能是我的意图。我的目标比较简单。首先，我是要把欧洲各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政权的难以综览的历史文献加以综述。其次，我也试图通过对欧洲各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解决能否坚持一种普遍的法西斯主义概念这一问题。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一事实，即我的论点和假设带有暂时性，必须通过对法西斯主义史和欧洲各国法西斯主义史的进一步和更详尽的研究来加以检验。

然而，我觉得，现在作出结论，即使是暂时性的结论，也是正当的，有益的。最后，我恳请专业行家 and 每一位愿意了解欧洲法西斯主义史的史学爱好者给予支持。我认为，为了能理解“最近的过去”和当代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向罗马进军”60年后和希特勒夺权50年后的今天——对欧洲法西斯主义史的充分了解也是必要的。

第 1 章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论概念的意义、历史和问题

“法西斯主义的名字本身并不说明运动的精神和目的。法西斯是一个社团，一个联盟，法西斯分子是盟员，而法西斯主义可能是秘密结社”。^① 弗里茨·朔特赫费尔1924年用这段话指出一个平淡的、但常常不受重视的事实。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概念不一样，在内容上是空洞的。源于拉丁文 *fascis* ——古罗马高级官员的权标——的意大利文社团一词 *fascio* 在19世纪被共和主义、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集团用来想使自己区别于政党。随后在20世纪初，意大利右派也使用了这一象征性的名字。1917年，

意大利国会的右翼联合组成“保卫民族法西斯社团”。后来，1921年以来自称“民族法西斯党”的法西斯主义党就是由1915年成立的“革命行动小组”和1919年由战争参加者组成的墨索里尼的“战斗团”这两个组织产生的。

到这一时期，墨索里尼的新党大多被国内外观察家同其他非意大利组织，诸如在奥地利和德国出现的埃歇利希* 组织和义勇团以及一般同在巴伐利亚、匈牙利和俄国的“白色”集团相比拟。列宁还在1922年11月间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分子同沙皇的“黑色百人团”匪帮等同视之。^④但这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家几乎都习惯于把非意大利的反革命运动和政权说成是“法西斯主义的”。^⑤尽管在20年代初，克拉拉·蔡特金、安东尼奥·葛兰西、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其他一些意大利作家警告过勿把所有反民主的和反共的组织都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因为由此会失去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特点^⑥，但是，后来法西斯主义概念的普遍化恰恰在共产党内的法西斯主义学术讨论中几乎还没有成为问题。但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已把法西斯主义看成仅仅是“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⑦。由于大家限于就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职能来阐明它的本质，所以，所有有利于资本主义和危害共产主义的政党和政权很快就被看作“法西斯主义的”了。滥用法西斯主义概念导致连社会民主党也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孪生兄弟”或一翼，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维护议会制

* 格奥尔格·埃歇利希（1870—1941年），保守派政客，1919年成立巴伐利亚军团，任该团团长，1920年起，改名为埃歇利希组织，曾在上西里西亚组织暴动，1928年为巴伐利亚家乡保卫团领导人。——译者注

民主，因而有助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⑧后来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指出所谓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强调“法西斯主义的一般特征决不能”使我们不去“具体研究和考察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独裁，在各国和各个阶段的不同形式的特点”^⑨。但是，这一论述却是孤立的，而且没有任何结果。季米特洛夫本人在他详细的报告里只字未提与此相关的划分和区别的问题。讨论季米特洛夫这一报告的许多发言者也没有一个人论述这一问题，即世界各国种种真的或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和政权同赋予名称的意大利体系是否真有共同点。

1945年以后，这一问题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讨论中几乎完全被忽视了^⑩。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和现在谈论的法西斯主义，通常指的是民族社会主义。但迪特曼希·艾希霍尔茨和库尔特·戈斯魏勒在1980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研究》论文集的《前言》中强调了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为了确认这一说法，他们也提到上面引用过的季米特洛夫一段话^⑪。可是，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位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用这样一种对比观点撰写的著作。反之，几年来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至少到1969年），尤其在匈牙利却是另一种情形。这里出版了一些有关各种法西斯主义的饶有兴趣的论著。^⑫

如果说，共产主义作家至今对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异同点的问题研究这么少，那么其原因也在于，除了一些所谓资产阶级研究人员（1928年已发表过《国际法西斯主义》一书^⑬）外，正是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但

是，他们提出的很值得深思的意见和建议几乎被遗忘了。像格奥尔格·德克尔那样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930年就认为有必要提醒人们，只有“这个有关运动的所有基本特点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相符合时”^⑩才能讲它是法西斯主义。亚历山大·席夫林对欧洲各国法西斯主义的共同起因和特征进行了探索。他对此得出结论，“在某种特殊的民族发展的独有的特性中发现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是不可能的。但是，像共产主义作家那样把法西斯主义一般地归结到“高度资本主义的结构和特殊的发展现象”同样是错误的。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产生并勃兴的国家里，其经济和社会状况各不相同，但在政治领域却有共同的特点。在有关的社会里，“战后时期才宣布民主制”。在这个“反革命区域”（席夫林除德国外还列举了意大利、奥地利、芬兰、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西班牙）民主制未能得到巩固。此外，法西斯主义政党对“粗野的中产阶级”得以“在思想上和群众心理上”产生一种特别巨大的吸引力。^⑪

嗣后，阿尔卡迪·古兰德在其1931年发表的《无产阶级行动的今日》一书中较为详细叙述了这一思想。^⑫对于把法西斯主义概念延伸和运用到“任何一种同统治的暴力形式有关的事物上”应持否定态度，因为这样做，就使法西斯主义只能是“表述国家政权实施恐怖行动的极其陈旧的概念”而已。法西斯主义的“特有的新型东西”存在于它产生的时刻。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把它的成功并不归因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产业无产阶级的过多”，而是归因于“过少”。^⑬弗兰茨·博尔肯瑞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了这一论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

发展为建立工业资本主义的专政^⑧。古兰德则同他不一样，根本不排除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也能取得胜利，虽然它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不同于意大利。在德国和其他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西斯主义分子虽然不能像在意大利充分利用无产阶级的弱点和广大贫苦农民的消极支持，但他们会在由于经济危机而难以生存、社会地位日益下降的中产阶级那里得到相对的社会基础。^⑨古兰德像布劳恩塔尔、鲍尔、奥尔贝格、南尼、泰代斯库和希法亭等人那样试图对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和资本主义社会职能之间的应力关系用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理论来予以阐明。^⑩

对“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讨论的短促一瞥表明，法西斯主义概念被马克思主义作者决不只是用作骂人语言和宣传词藻，尽管正是反法西斯者比法西斯分子本身更加积极地争辩这个问题：法西斯主义是否是一种只涉及意大利的独特现象，还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⑪

但法西斯主义的比较研究的这些起步在1945年后或多或少地被人们所遗忘了。后来，恩斯特·诺尔特大力促使所谓资产阶级的研究也更加努力探索作为普遍现象的法西斯主义的问题。^⑫诺尔特的观点，在这里不作详述，既受热烈欢迎，又受多次批判。^⑬然而，直到今天，主要兴趣或多或少集中在他的对法西斯主义所作的各种定义上，特别在他的“超政治的”定义上（按此，法西斯主义是对“在实践上和在理论上的先验性的反抗”）以及他关于“法西斯主义时代”的论点上。^⑭诺尔特在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中最先依据的是对法兰西行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分析，后来也

包括了两次大战期间的欧洲其他法西斯主义运动。他在这些研究中的提示如同他的类型学（他把意大利的“一般”法西斯主义同德国的“激进法西斯主义”加以区分，并把这两种法西斯主义同在一些独裁政权里的“早期或原始法西斯主义”和“亲法西斯主义”作了比较）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④

60年代和70年代，虽然发表了一大批对各种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研究的单篇论文，但它们通常不是从比较研究观点出发的，而且它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些概论和文集中也是这样。在这许多著作里，或者没有论述所有法西斯主义，例如沃尔夫冈·席德尔发表的颇有启迪的成功的对比研究德国和意大利的论文^⑤，或者不同作者论述各个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兴趣各不相同，而且从不同角度论述。^⑥鉴于这些原因，把各法西斯主义史迄今的研究加以综合比较这一并不过分的企图会碰到很大困难。^⑦

与忽视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的同时，在一些国家，特别也在联邦共和国，出现滥用法西斯主义概念的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国家从阿根廷到扎伊尔都被几个同时代人刻画为“法西斯主义的”。在内政方面，所有政党和几乎所有国家和社会机构被用同样愚蠢的理由告发为“法西斯主义的”。

正是在最近，对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弱点以及上述对法西斯主义概念的无边无际的滥用（有时，这个概念已蜕变为纯粹的、可替换的骂人语言）敦促各方面对法西斯主义概念普遍化的意义和效果进行批判的研究人员采取行动。许多作者竭力反对把议会统治的和独裁统治的资

本主义国家广泛地等同为法西斯主义。另一些作者则强调，对“法西斯主义”一词不加区分的运用会导致无害化具有意大利特点的、首先是具有德国特点的、“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还会导致在科学上、政治上不能容忍地赋予独裁政权的“纯”反民主特征以神秘的魔力。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在这方面坚决拥护议会制民主和政治自由的独自决定的准则。^④由于这些微不足道是政治的原因和一些科学的理由，他赞同坚持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党和政权具有一定相似之处为出发点的极权主义概念，而这些政党和政权乃是议会制民主的敌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研究者伦佐·德费利切指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远远没有像德国民族社会主义那样造成那么多的伤亡，此外，民族社会主义不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那样依赖中产阶级的上层，而是依赖中产阶级中害怕自己沦为无产阶级的下层。^⑤德费利切的批判同布拉赫尔的批判相似，科学信念同一定的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

A·J·格雷戈尔把法西斯主义概念扩展到几乎所有过去和现在非民主的运动和政权（在此，他有意无意地根本怀疑法西斯主义概念的特殊性和适用性）^⑥，而亨利·A·特纳则强调法西斯主义本来就属于反现代主义的运动和政权的范畴。^⑦此外，布拉赫尔、德费利切、特纳、阿勒代斯^⑧、希尔德布兰特^⑨、马丁^⑩等人一致认为，正是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点多于共同点。因此，为了纯粹经验的研究，人们首先应当抛弃法西斯主义的一般理论和概念。^⑪连这些科学论点过去和现在都同一定的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而这些观点首先由特纳讲得一清二楚。特纳害

怕，如果在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紧密的关系，如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一再断言的那样，那么，当今资本主义一议会制社会的存在和团结就会受到威胁。⑧

这里必须进行批判的批判。在政治观点和科学观点之间也是能够而且必须进行区分的。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政党是在资本主义土壤上滋生和兴起的，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定阶层施加特别的诱惑力，资本主义集团乐意在政治上、财政上支持法西斯分子，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直至今日根本没有绝种；鉴于这些事实，任何一位真正意欲吸取历史教训的历史学家就会而且必须考察法西斯主义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论点以至假设。有句谚语说：“魔鬼决不从同一扇门进来！”而历史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但促成“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崛起和“夺权”的结构因素还完全存在并能造成所谓新法西斯主义的增长。法西斯主义研究总是带政治性的，有反法西斯主义的目标，而且对消灭法西斯主义提供行动指导。这在过去和现在除缺点外也对政治和教学领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人们通过揭示共同决定这一事件发展史的某些结构因素，过去和现在都能够借助至今几乎有60年之久的法西斯主义讨论的理论、论点和假设阐明这一事件发展史的疑难问题。

但是，除了这些政治因素和教学因素（如果愿意的话）之外，也有一些科学论断可以被用来反驳对一般法西斯主义概念的意义和效果的批评者。

1.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和政权之间的差别比起

各个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的差别还大，这一事实首先对布拉赫尔等人主张使用极权主义概念是不相容的。共产主义政党和法西斯主义政党追求不同的目标，并且建立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统治实践（但不是统治结构）中的类似点不足以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乎等同视之。①

2. 人们不得不对特纳把法西斯主义纳入反现代主义运动范畴的主张也提出类似的异议。这个问题并未由此得到解决；相反，概括和划定界线的困难变得愈来愈大。

3. 一些作者要求一般地放弃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特别放弃法西斯主义理论的运用，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历史研究在过去和现在永远不是纯经验的和没有理论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阐明我们有意无意地作为出发点的提问、方法和自发性的理论酝酿，那么，就会存在思想上掩盖和歪曲被说明的事实真相的危险。

4. 连法西斯主义一般概念的最尖锐的和最唯名论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存在过以意大利为榜样的、并被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但也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党的同时代人看法法西斯主义的各种运动。人们不能简单地耍戏法把法西斯主义概念变走。法西斯主义有它自己的历史并且也对历史加上了印记。它属于20世纪历史的“开字码锁的字码”。②它可以被看作是历史现实发展的、特别是工人政党史现实发展的“要素和指针”。③法西斯主义的阐述和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历史必然载人反法西斯主义史、共产党史和社会民主党史，甚至部分地载人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政党史。④

过去和现在，关于法西斯主义理论正是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历史的要素和指针，其历史意义是这么重要，而对它的科学意义上的关联却有那么多的争议和疑问。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全面理论进行了探索，以期借助于它像借助一把万能的钥匙来阐明一般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法西斯主义不同现象的形态和职能，这一探索直到今日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举世公认的结果。这里所述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通常只能解释各法西斯主义发展范围内的各别问题。这是指那些通过它们来说明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阶层的代理人或盟友的特点的理论^①；也指那些论点，依据这些论点法西斯主义是中产阶级的党^②，是特殊的民族发展史进程的必然结果^③，是一国现代化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结果^④，是某种社会心理冲动的后果^⑤，是文化或道德崩溃的产物^⑥，是一个人的特殊统治形式^⑦或者是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这些和其他理论必须加以集中。它们可以在法西斯主义研究中作为启发性的提问、作为研究方法的酝酿以及作为“中等有效范围理论”^⑧加以运用，而这一研究在方法上必须多元化，而且必须是比较研究。对于法西斯主义一般概念的资产阶级批评家，我们不得不用霍克海默尔的劝告来反驳，据此，如果你不愿去谈论资本主义，亦即一般的、不限定在各别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源，那么，你就应当对法西斯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保持缄默^⑨。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根据霍克海默尔的自我理解也不意味着），你就能独自阐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现象，用恩斯特·布洛赫的话来说，法西斯

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更深的根源。④此外，对那些赞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并仍仅仅述及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概念的人，我们不能不提出异议，如果你们只谈民族社会主义，那么套用一下霍克海默尔的名言，你们应当对法西斯主义缄口不谈。对这种“资产阶级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批评会在推动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的考验中达到顶峰。只有这样，法西斯主义一般概念的界线和效果的问题也就能得到回答。

这一点只有你首先撰写各个法西斯主义的历史⑤，才是可能的（变动一下安吉洛·塔斯卡常被引用的话），只有在这样叙述和比较以后，才能试图以总的理论形式来阐明法西斯主义的定义。

第 2 章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第 1 节 产生和兴起

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和理论家一致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的结果。但这句话并不能充分地说明问题，因为归根结底，这还取决于各次危机的规模和性质。下面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概述就表明了这点^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兴起受到特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深刻影响并且由它们所决定，而这些问题已经在19世纪就已产生，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果而更加尖锐化。

在上世纪中叶，意大利同欧洲西部和中部国家相比，是一个落后的农

业国^②。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试图推进工业化。这就导致了工业界、银行界和推行一种积极扶植经济政策的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从中得到好处的，首先是意大利北部的重工业，而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业，则大受损害。反之，农业大受忽视。这不仅波及单一农业经济的和尚受封建主义很深影响的南方地区，而且还波及北部的农村地区。在意大利，既没有进行一次农业革命，也没有对所有制关系和农业经济形式进行改革，广大小佃农和雇工面对少数大地主处于经济极其恶劣的状况之中。国家则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减轻农村无产阶级和北方各地区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产业工人的贫困。

在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胜利后于1861年成立的意大利王国虽然得以统一了领土——1866年取得威尼斯，1870年取得教皇国——，但是它既不能、也不愿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问题^③。工业界和农业界的上层人士善于实现他们的经济利益。直到1880年，由于全国人口中只有2.5%的人有选举权，因而通常组织政府的右翼和左翼自由派就不难在议会里为这一政策获得多数票。但是1881年经过选举法改革，大部分城市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后，由北方工业界上层和南方农业界上层迄至当时组成的联盟还掌着权。反对派势力通过私人协商、保证和威胁促成了合作并由此而保持现状。意大利人对这些非议会的政治活动使用这一措辞“trasformismo”^{*}，照字面翻译为“变化论”。但这一以“变化论”为前提的安抚和妥协

* trasformismo, 意大利文指议会中多数派的变化论，指多数派政府硬性各派人士参加，以免形成真正的反对派。——译者注

政策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和许多骚乱、饥饿革命和罢工激剧增长而不起作用。因此，自由派领导人、政治家焦利蒂^①试图通过现代化措施和谨慎的社会改革说服1882年成立的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领导人进行合作。

但焦利蒂所推行的改革及其对社会党人和人民党人所采取的“变化论”策略也在资产阶级阵营内遭到拒绝和批评。这些力量聚集在“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内，他们坚决拒绝焦利蒂所推行的改革，代之以主张通过一项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来转移国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②。但是，这项也被焦利蒂所迫不得已而接受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民族主义者要求并吞在南蒂罗尔和伊斯的里亚的“无法挽救的意大利居民区”（伊雷登塔）由于对外政策形势——暂时——未能实现，他们就转向推行殖民政策。意大利军队1896年突击阿比西尼亚以在阿杜瓦遭到惨重失败而告终，它于1912年在遭到惨重损失的长期战争之后才得以并吞了利比亚。但在内政方面，企图通过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转移社会问题的策略只是获得相对的成效。虽然大部分中产阶级得以被动员和团结起来，但社会党的成员并未被“民族斗争”代替阶级斗争的这一口号所迷惑。

在本尼托·墨索里尼^③的领导下，社会党的多数派宣告取消同以改良主义为前提的政府合作。社会党激进派在第一次根据（男子）普选原则进行的1913年的投票中取得了很大胜利。1914年爆发了各种各样心怀不满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

^① 焦利蒂（1842—1928年），意大利政治家，五次担任首相。——译者注

的罢工。这就迫使以首相萨朗德拉为首的保守派再次试图通过动员有民族主义思想和中产阶级出身的群众来转移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这一计划最初看来是有成效的。墨索里尼也参加了干涉主义者的队伍，因而他不得不脱离社会党，在干涉主义者的压力下，意大利政府或多或少地被迫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了战争^④。这场战争首先导致举国上下凝聚在一起的大规模动员，而且同时使经济现代化和飞速勃兴。可是，这一经济勃兴是人为的，短命的，因为它主要建立在由国家刺激和用贷款支持的、对这场战争所需的商品需求之上的。

战后表明，迄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严重尖锐化了。^⑤ 鉴于世界需求的降低和由于国家巨额赤字，人为膨胀起来的并由一些同政府紧密合作的企业所领导的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显得异常困难。通货膨胀日益明显，失业率持续上升。^⑥ 这就导致一些城市发生多次骚乱和罢工，在1920年秋季，当意大利北部工业区的工人占领了工厂之后，骚乱和罢工达到了高潮。政府通过提高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保险的诺言得以说服工人让步，但这一妥协使双方都感到不满。大部分工人对这些成就感到不满，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已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使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派从其较强的多数(革命)派分裂出去，由此直接和间接地导致工人运动本身的削弱。^⑦ 可是，企业主也决不对政府调停所达成的妥协满意。一方面，他们害怕工人运动将利用已经取得的权力地位，通过革命道路而实际掌权。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许

诺的社会福利费和工资的提高是无法负担的。

在意大利北部的农业地区，社会的紧张状态更加变本加厉。这里的农业工人组织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众多的庄园被占领，并由合作社经营，而这些合作社也受社会主义协会控制和领导的消费合作社网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还留下的大地主以至小业主面对社会主义协会必须不顾他们的实际需要雇用专由协会推荐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被雇佣的社会主义协会的领导人自己对于这些在当时欧洲所取得的难能可贵的成就仍不满意，因为他们要求土地完全集体化。这些目标不仅遭到大地主而且也遭到众多小业主和佃户的坚决反对，他们不愿交出土地，而想取得更多的土地。因此，这样小业主和大农业主就有了共同利益，因为他们害怕集体化并且希望把已经实施的改革重又取消。^①

战后初期的意大利是否会像社会主义者所希望和企业主、农业主所害怕的那样真正处在革命形势中？虽然这是大成问题的，但对各种问题采取非革命的议会解决办法同样是没有眉目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就伴随意大利政府体制的政治危机得到了补充，同时也激化了。

1919年11月16日的议会选举以迄今执政的自由党和民主党的惨败而告终。社会党人以其156个议席成为议会最强大的政党，而天主教人民党人取得了95个议席。通过这次选举结果，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履行义务和享有权利政府就很困难了，甚至简直不可能的了。社会党人和人民党人坚决拒绝合作，而焦利蒂反正只是犹豫不决地、半心半意地力图说服天主教人民党同自由党人组成联盟，也只取得非常短

暂的成就。但是，违背社会党人和人民党人的意愿是无法治理这个国家的。意大利传统的妥协和“变化论”的政策由此而宣告寿终正寝了。

继续进行以唤起民族主义狂热情绪又转移国内社会问题并以此方式达到团结一致的努力也毫无成效，甚至威胁到体制本身。意大利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遭到各种严重失败，但由于它属于战胜国，它的一些目标最终得到了实现。意大利取得了南蒂罗尔和伊斯的利亚及的里雅斯特，但不得不把同样垂涎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让给了南斯拉夫，而阜姆(里耶卡)则被宣布为自由市。意大利政府经过长久犹豫和激烈反抗后才在巴黎接受了协约国的这一决定。意大利的公众舆论则对协约国的决定和意大利政府所谓的放弃作出了愤怒的反应。意大利民族主义分子就用与此相联系的所谓“残缺不全的胜利”这一概念攻击协约国和本国政府。就这点而言，所谓“残缺不全的胜利”之说和在德国流传的“背后一箭”^{*}之说何其相似乃尔。有鉴于这些民族主义情绪，意大利政府对意大利军队在诗人邓南遮领导下拒不执行撤退命令并在1919年9月12日竟强行占领阜姆市却不敢进行有力的干预。这位自诩为“司令”的邓南遮控制这个城市达16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已发展了法西斯意大利政治方式的所有成分。这还用来让他的追随者搞群众性的集结行军和检阅，这些追随者身穿黑衫，举起骷髅旗，唱着战斗歌曲，行“罗马

* “背后一箭”(Dolchsto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出现的一种理论，认为德国战败是由于“后方的背叛”，即革命所致。——译者注

式”的敬礼并在集会人群和他们的头目邓南遮之间进行煽动情绪的对话。^⑩

1919年3月23日由墨索里尼在米兰成立的前线士兵组织“战斗团”，把邓南遮的政治方式视为榜样，而且得以充分利用上述意大利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出现的危机。但是，单单这些说明不了墨索里尼何以能在极短时间内发运一个群众性运动，它在1921年年初已拥有近20万成员。同样，这也同墨索里尼本人和他所鼓吹的思想有关，这种思想除了民族主义成分外，也包括一定的社会主义成分。新运动的思想及其按军人行动的外部形象所能吸引的，除民族主义者和以前的社会党人外，特别是战争参加者和青年人，他们愿把这个坚决反对迄今所有政党的同时想取代它们的崭新的运动视为精力充沛的唯一的政治力量，并相信它会彻底解决民法问题以及他们的切身问题。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这些要求令人感到这样不明确，甚至矛盾百出，但它们却又那样富有成效。^⑪

比纲领更有成效的乃是政治策略，这种策略归根到底就是继续进行作为内战的战争。大多以暴行结束的行动的支持者和代表人物是“法西斯行动队”，它们是由大中学生以及意大利精锐部队和突击队(柯迫蒂)的前成员所组成。这些参与内战的部队在刚刚取得的地区的里雅斯特和威尼西亚朱里亚获得了最初的胜利，在这些地区居住着斯拉夫少数民族，他们被视为意大利的敌人，而且常常不公正地被视为“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并受到攻击。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组织的房舍和本部像社会党人所遭遇的那样也被摧毁。1920年下半年，在波洛尼亚的一名民族主义残废军人议员在一次

市议会会议期间被枪杀之后，法西斯主义分子把他们的暴力行动扩展到了那里。法西斯主义分子采取无数恐怖行动回报这起政治谋杀案，他们在行动中得到资产阶级集团的赞同，而警察几乎没有进行干预。社会主义报纸各编辑部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所在机关被法西斯行动队袭击、捣毁或烧毁。一些社会党成员受到威胁、殴打或被打死。法西斯行动队很快在被洛尼亚、费拉拉并终于在艾米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农村地区转而采取所谓“惩罚性讨伐”活动，他们有计划地从农村到农村，从城市到城市，最后从省到省摧毁工会房舍、合作社、党和编辑部的办公室，对社会党人和人民党人队伍中的政敌进行拷打和杀害。这些行动获得了地主和农村小业主们的拥护，他们对到处成立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在物质上给予支持或者自己参加了它们的行列。这样，法西斯主义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社会成分上也起了变化。

参加最先在城市成立的法西斯主义组织的，主要是军官、大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各个阶层的离乡背井者，而所谓农业法西斯主义的行动队主要由大地主、中小农以及自愿或被迫参加法西斯主义农业工人工会的农业工人所组成。^⑥此外，也有省的中小城市的中产阶级成员。这样，法西斯主义获得了一种特有的社会特征。它成为首先由中产阶层支持的、具有激进的反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运动，尽管它并不放弃原先的反资本主义的纲领条款。这一纲领的内在矛盾通过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队的挑动行径是无法掩盖的了。

但是，法西斯主义的迅速崛起和在反对社会党人和人民党的内战中在其农业方面所取得的胜利自身也蕴藏着问

题。首先法西斯主义党各个部门存在地区性的隔绝，这些部门几乎不受限制地被各自的头目（被追随者和对手用阿比西尼亚语称为 Ras 〔头领〕）所指挥着。他们相互倾轧争斗，虽然这些头目并不能直接威胁墨索里尼的领导地位，但能够阻碍墨索里尼所追求的统一的党组织建设，同时妨碍墨索里尼寻求同社会党人缔结的一项和解协议。正当墨索里尼1921年11月7日得以从迄今的运动内成立一个肯定还未巩固的党（民族法西斯党）时，他的和解计划就彻底破灭了。农业法西斯主义头目们所宣布和领导的反对社会党人、人民党人和自由党人的大规模恐怖活动有增无减地继续进行。墨索里尼不得不在1921年11月的罗马党代表大会上满足于自己被确认为“领袖”，而不能去阻挡自己下级领导人的攻击性挑动行径并予以控制了。

这样，法西斯主义党决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集团。此时此刻，有可能利用法西斯主义内部的争执并对其恐怖活动至少加以抑制，但没有人这样干。

焦利蒂在力图削弱社会党人和人民党人的努力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把法西斯分子吸收到自由党人的竞选联盟中来。可是，这一“变化论”策略面对法西斯主义分子却根本无能为力。1922年4月选举中取得议会35个议席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尽管没有停止他们显然违法的恐怖活动，但他们却获得自由党一定程度上的承认。如今军警对于法西斯分子的暴力行动更少制止了。反之，重又获得选举胜利者地位的社会党人和人民党人在组成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联合抵抗阵线方面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当被称为“劳工联盟”的所有社会主义

派别(共产党人除外)的统一阵线号召举行一次反法西斯总罢工时,当局和资产阶级势力不禁回想起占领工厂时期,尽管对社会党人来说,这次果敢行动只不过是抵抗法西斯主义和保卫民主权利而已。人民党人和自由党人像国家行政机关那样,对在此期间也从工业集团取得重要的物质捐助的法西斯行动队无情摧垮社会党的这一反抗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同时,墨索里尼善于充当能独自在混乱中维护社会的人物,实际上,这一混乱就是由他自己挑起内战的私人军队所制造的。

10月27日晚,墨索里尼向在那不勒斯集会的行动队发出了进军罗马的命令。^④尽管黑衫队员根本没有武装,或武装得很不够,但军警依然不予干预。在国王拒签由首相法克塔所提出的实施戒严状态令后,墨索里尼得胜了。他被任命为首相,而在此之前所举行的威胁性的、暴力性的进军罗马成为一次胜利进军。

第2节 法西斯主义上台

墨索里尼虽然在1922年10月28日成了政府首脑,但他的地位看来极其虚弱。在议会535名议员中,属于民族法西斯党的,只有35名,但在1923年初,民族主义党加入了法西斯党。墨索里尼所依靠的联盟成员,除上述提到的民族主义党人外,还有自由党人和民主党人,主要还有人民党人。尽管如此,墨索里尼在力图对这些各不相同的联盟伙伴加以利用、联合的同时,随时起用自己议会外的力量进行威迫。这股力量存在于他的党的军队之中,这支军队并未被解散,而是被

改组为民兵，形式上从属于军队领导之下，但同军队有所不同，它不对国王而对法西斯主义的领袖宣誓效忠。

然而，1923年11月8日法西斯主义的议会盟友同意通过所谓的选举法时，对这支内战部队和各省法西斯主义的强硬头目们的恐惧没有解释，甚至没有申辩^⑨。这项法律规定，每个得票最多的党，如果获得的选票占全部投票25%以上，就可获得议会中三分之二的席位。1924年4月5日的选举表明，自由党人和人民党人随着同意选举法而决定自己剥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法西斯主义分子同他们的自由党竞选盟友一起几乎获得了全部议席的三分之二，而且在议会中执掌了无人与之匹敌的主宰地位。但这次选举胜利的取得首先由于采取的恐怖主义措施，以及工业协会方面的财政支持。^⑩看来，墨索里尼已达到了目的。他成了选举产生的、无可争议的政府首脑，此外，他看来已控制了那些明明白白地呼吁所谓“第二次革命”的法西斯头目们。这时，发生了一个事件，几乎导致墨索里尼的垮台和尚未巩固的和高度发展的法西斯制度的崩溃。

1924年6月10日，社会党议员马泰奥蒂在去议会的路上被法西斯行动队员袭击杀害。他虽然不是法西斯恐怖的第一名受害者，但正是马泰奥蒂由于他反对法西斯分子的侵袭所发表的无畏的战斗演讲而特别有名且受到人们尊敬。因此，对他的谋杀引起了巨大的愤慨。正当共产党人徒然要求举行总罢工时，民主党人、天主教徒和社会党人则在反法西斯主义前提下聚集在一起，结成共同的抵抗阵线。但以焦万尼·阿门多拉为首的反对派仅仅实施了还不如说是半心半意的措施。反对派的议员们（除共产党人和一些自由党人外）不是

坚决地、最后通牒式地要求国王解除墨索里尼的职务，而是离开议会，以便在阿文丁山* 上成立一个自己的代表机构。

墨索里尼在最初的踌躇之后再次施展了利用对手们相互倾轧、自己从中渔利并最终把他们排除的才能。他向国王、教会和工业界警告，如果他的法西斯政府垮台，那么，社会主义运动有可能再次兴起。与此同时，他解除了一些特别激进而出名的法西斯政客的职务并让他的民兵向国王宣誓效忠。他对其党内的批评者和竞争者也采取一种可以比较的、妥协和威胁相结合的两面策略。他实现了激进的法西斯头目们主张以法西斯主义精神全盘改造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时日益限制各省强硬的法西斯主义代表人物的影响。墨索里尼以这一政策获得了成功。他重又获得君主国、军队和工业界的支持，排除了自己党内的竞争对手并摧垮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反对派。导致彻底摧毁意大利自由主义体制的这一发展是在各个阶段内完成的：⑥

1925年10月2日，工会的自由由于建立了雇主和受雇人一起参加的法西斯协作体组合而被取消了。1925年11月初，接着制订了法西斯主义法；通过这项法律，政府首脑的权力扩大，议会权力缩小，如今议会完全置于行政权之下。还通过法律解散市议会，取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和新闻自由，解除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员的职务。在另一次墨索里尼遇刺事件后，乃于1926年11月9日公布了一项国家保护法，通过这项

* 阿文丁是古罗马南部的七山之一，传说古罗马平民起义反对贵族时曾在此避难。——译者注

法律，所有政党，除法西斯党外，悉被解散，所有反对派报纸被取缔，并且设立特别法庭以审判敌视政权的政敌。1928年年初，订定了一项新选举法，法西斯大议会所提出的统一名单选民只能全部投票赞成或反对。因此，意大利的议会制彻底被独裁专政所代替。但是，这一独裁专政决不像法西斯分子用“极权国家”这一宣传口号宣称的那样如此极权主义和团结一致。实际上，这个法西斯国家保持了它原先的联盟性质。它的存在和内部团结是以墨索里尼在不同的势力之间进行协调和平衡的能力作为基础的。

墨索里尼的权力一方面基于国王授予他作为政府首脑的地位，另一方面基于他作为法西斯主义领袖对法西斯统一党及其民兵和许多附属组织实施的指挥权。墨索里尼极其关心保持国家首脑和党魁这一双重职务。这个党既不像墨索里尼的保守党盟友所要求的那样加入国家并受其控制，也不像以法里纳奇为首的激进法西斯主义分子所要求的那样把这个国家置于它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虽然墨索里尼有意协调的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并存局面得到了保持，但事实上，党的官僚主义化早于官僚机构的“法西斯主义化”。所以，意大利的一体化远未达到纳粹德国那种程度。王室、军人和教会的权力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④它们根本没有被一体化，而且充其量不过是法西斯主义的盟友。通过1929年2月的拉德兰条约^{*}，天主教会所获得的权力和影响甚至比它先前所

* 拉德兰条约是教皇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于1929年2月11日签订的。条约规定恢复教皇管辖梵蒂冈城的世俗权力。——译者注

有的更多。它除了从国家方面获得重要的财政捐助外，还取得在教育和家庭方面广泛的申诉权和协作权。

更加复杂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协作体组合制*，它被视为法西斯主义政权的第三支柱。^④ 上述1925年10月通过的法律虽然承认各法西斯工会为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但企业主在企业内享有无限权威。根据1926年的法律和1927年的劳动宪章实施的协作体组合制同法西斯工团主义者有关雇主和受雇人和谐和平等合作的想法是不符合的。事实上，在12个再次合并为组合的辛迪加内，不可能谈到工人阶级和企业主代表的平等权利。此外，企业主同工业协会拥有自己的代表机构，该机构可以凌驾于国家机构和法西斯大议会之上实现工业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这个领域里也出现了一种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方面，这里谈不到工业的一体化；另一方面，工业家已丧失了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影响，而且后来日益感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认为，这个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国家”是建立在相互控制和平衡的一种复杂和矛盾的体制基础之上的。谈不上整体的一体化。墨索里尼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能否取得和加强这个由这些迥然不同的力量和人物组成的法西斯党的支持，以及通过公民投票方法所取得大多数居民的拥护。只采取镇压措施是达不到这一目的的，因为遭受镇压的除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领导人外，主要还有少数民族、

* 1927年由意大利法西斯工会、企业主联合会和法西斯党等的代表共同组成“协作体组合”，自称是“各阶级协作”的组织。——译者注

蒂罗尔的德意志人和伊斯的利亚和的里雅斯特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法西斯政权的存在和团结只能在墨索里尼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取得成就时才会持久。当时就是这么回事。

在法西斯政权的直到1930年左右的第一阶段里，出现了一种重要的经济兴旺。^④对此，首先是世界经济因素起主要作用，因为其他国家战后紧接着经受严重危机之后也出现了经济勃兴现象。但另一方面，法西斯宣传机器把克服经济危机作为法西斯政府所采取措施的结果加以庆祝，这至少有一部分是合乎情理的。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的特点是自由主义和进行干预这两种因素的结合。这一方面是指向自由贸易政策过渡、使一些公有企业和设施重归私人所有和使股份权自由化；另一方面指国家指令和控制的工资冻结、对亏空企业采取支持措施以及国家对一定工业部门和国内垦殖项目的促进。

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自1929年起世界经济危机也在意大利产生明显影响以后就得到了加强。通过缩短工时和进一步降低工资（在产业工人中收入减少约15%，反之，农业工人减少40%）以及通过补助和就业措施，力图降低失业人数，因为失业人数在1934年已高达一百万人以上。正当所有这些措施还没有达到预期的迅速成效时（1939年的国民收入重又达到了1929年的水平，这时才达到了这一成效），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又进一步加强。1935年10月，爆发了阿比西尼亚战争，国联以经济制裁进行回报；但从那时以来，经济政策处在随着军事观点而来的自给自足政策的影响之下。另一方

面，奉行了以侵袭阿比西尼亚而开始的、以重建罗马帝国的思想目标为依据的对外扩张政策。这表明，墨索里尼显然不得不通过对外取得补偿性的胜利来转移国内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存在的各种问题。

出于外交和内政考虑的这一帝国主义政策在初期收到了效果。^④ 在内政方面，通过在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和阿尔巴尼亚的战争胜利而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导致广大阶层的人民团结一起，此外还通过实施儿童补助、不扣工资的度假和法西斯控制的业余活动组织“Dopo Lavoro”丰富多彩的活动赢得了人民群众对政权的拥护。^⑤ 没有被一体化的军队通过取得胜利的军事行动必然同政权日益紧密结合起来。经过向自给自足政策和战争经济的过渡，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终于这样强大，以致工业家及他们一直很强有力的工业协会所能施加的影响已明显衰退了。但是，法西斯政权在内政方面的加强和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却面对着这一事实，即法西斯意大利在对外政策上和军事上日益依赖于它愈来愈强大的盟友——纳粹德国，尽管墨索里尼无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间接地导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体制的崩溃的这一发展或多或少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墨索里尼带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和上台。^⑥ 一方面，尽管按照墨索里尼的话说，法西斯主义决不是出口商品，但他却自豪地指出由他所树立的榜样德国人也在模仿。另一方面，墨索里尼坚决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并吞奥地利的企图。1934年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发动政变、联邦总理陶尔斐斯被杀害后，墨索里尼就指令部队在勃

伦纳山口边境公然进军。1935年，出于对德国在意大利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东南欧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的畏惧心理，他在斯特雷扎竟同意组成一个、虽然很松散的、反对纳粹德国的抵抗阵线。可是，在入侵阿比西尼亚后，西方列强不愿也不能再把法西斯意大利吸收到致力于反纳粹的联盟中去了。它们为了不彻底破坏由它们建立的国联的基础和原则，决定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这一本来就是半心半意执行的政策自然而然地唤起第三帝国采取行动，把急需的原料（尤其煤）和工业产品供应给意大利。

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合作在1936年通过共同干涉西班牙内战而得到了加强。随后在同年11月成立了“柏林—罗马轴心”。但是，它还远没有稳固，正如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他们来自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奔赴西班牙，以便同佛朗哥和德意干涉军作战，挫败国际法西斯主义。像德国一样退出国联的法西斯意大利毕竟在1938年3月同意了奥地利“并入”德国。1938年9月，墨索里尼虽然还得以在慕尼黑会议上扮演了在希特勒和违背捷克斯洛伐克意志把苏台德区交给第三帝国的英法政府首脑之间的“真诚掮客”这一角色，但他不能阻挠推行修改边界政策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希特勒去决定欧洲政治中的所有事件。1939年，墨索里尼更加努力去制止德波战争的爆发并保持中立，但他利用时机，在1939年占领阿尔巴尼亚，一年后进攻业已被德国军队打败的法国，以便为自己捞取一份战利品。

因此，意大利最终被拖入这场战争，在随后的岁月中，它绝非作为最初战无不胜的德国的势均力敌的盟友进行着这

场战争。德国根本不需要入侵希腊的失败战役，希腊于1940年在德军出动后才被打败；德国也根本不需要北非的失败，最初还是在隆美尔统率下的德国非洲军团反击下才转败为胜；这件事向全世界和意大利公众表明，意大利这个被法西斯宣传机器吹捧的军事大国多么羸弱和多么依赖于德国。在意大利士兵作为仅仅是德国的辅助部队还在俄国作战期间，1945年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登陆的英美联军没有遭到很多抵抗而长驱直入首都。它们的进军直接地或间接地使法西斯政权走向覆灭。

第3节 抵抗运动和法西斯主义的没落

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解职并立即被逮捕。墨索里尼的垮台虽然还并不标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最终灭亡，但这件事却是它走向灭亡的决定性阶段。墨索里尼的下台是国王、一些军官和法西斯党的一些机关工作人员的成果。他们得到了教会的或多或少的公开支持。当然，英美军队在意大利的驻扎就构成了这场政变在巴多利奥元帅领导下得以成功的直接条件。反之，法西斯政权的独特机构和强有力的抵抗运动的存在造就了这次政变成功的至少是间接的条件。由于军队、教会和国王在法西斯独裁专政建立后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自己的地位，所以，它们在1943年还掌握推翻墨索里尼的权力工具。当时，它们间接地和直接地不仅迫于盟军而且迫于本国抵抗力量的活动不得不采取行动。意大利抵抗运动立即成为一个政权的组成因素，对此虽然不能

过高估计，但也不能过低估计。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有必要对这一反对派的历史作一简述，它是在1922年起使用的反法西斯主义概念影响下聚集在一起的。^④

前面已提到，墨索里尼成功地粉碎了阿文丁派的反法西斯的活动。在建立法西斯独裁专政的过程中，所有反对派政党、工会和报纸都被禁止了。政权的敌人被特种秘密警察监视，被同样新型的特别法庭判处长期监禁，或者被流放到偏远的岛屿上拘禁。少数民族也受到严重迫害，而在意大利人数占很少的犹太人起初未受侵扰。1937年至1938年间，在同纳粹德国合作过程中才采取了反犹措施，这些措施大体上按纽伦堡法进行。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行列中，至少在早期也有犹太血统的人员，但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被杀。墨索里尼所鼓吹的“种族主义”并不以生物学观点为其特征的。

尽管在法西斯意大利的恐怖活动没有达到像在纳粹德国那种规模和程度，但墨索里尼却能把反法西斯反对派几乎全部摧毁了。那些未能逃出的或未被逮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初期很难逃过秘密警察的追捕并取得居民的支持。由于上述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这个政权至少在最初的几年显然在居民中间，也在工人阶级内部，赢得极大的拥护。如果说，反法西斯主义者最初或多或少地未能取得成就，那么，这也在于他们内部不能团结一致。

进行地下活动的共产党领导最初力图从国内开始散发传单并也组织零星罢工。不少领导成员被捕（其中也有党的理论家安东尼·葛兰西，他在1935年死于狱中）。陶里亚蒂把党的领导机关迁往国外，从国外继续指挥反法西斯活动。可

是，起先同资产阶级力量和各社会党合作之举被严厉地拒绝了。尽管许多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同坐在法西斯班房里，但陶里亚蒂经过最初的踌躇之后，1928年也接受了共产国际发出的有关受法西斯警察迫害的社会党人是“法西斯主义的孪生兄弟”的指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论点才被放弃，并寻求同社会党人和其他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当时宣传的人民阵线的前提下进行合作。

可是，在这以前早就有属于不同党派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进行了紧密的合作。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派和革命派的代表作了开端，他们在法国流亡期间团结在“反法西斯联合会”中。卡洛·罗塞利1929年从拘留营逃到利帕里群岛，终于成功地除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外也说服了人民党人流亡代表参加反法西斯合作行列。由他创建的“正义和自由”组织(Giustizia e Libertà)持有一种坚定的共和主义思想并从法国开始建立在意大利北部的各个地下组织，但这些组织1934年被法西斯警察摧毁。罗塞利本人于1937年在德国逃亡中被杀害。1931年，倾向君主制思想的诗人劳罗·德博西到罗马作飞行宣传，但他未能返回，他的这一行动表明，在保守阵营内也有人拥护反法西斯主义。此后，反法西斯阵线得到了加强，反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本身成为动员人民的神话。这首先表现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意大利各党派不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同他们的外国朋友和同志并肩作战，以反对佛朗哥和迁去援助他的德军和意军。

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主要在国外进行活动，而且往往限干利用报刊评论来攻击法西斯意大利，然而，不同党派的

反法西斯主义者同意合作这一事实应当说是具有巨大意义的。这不仅表现在法西斯主义后期先在法国，后来在美国举行各次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计划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意大利本土广泛实行统一的抵抗运动的反抗行动方面。抵抗运动的存在和对反法西斯抵抗斗争可能以一次革命而告终的畏惧心理最终影响国王和巴多利奥元帅决定撤去墨索里尼的职务并接受同盟军的停战谈判。这时，抵抗运动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它不仅反对德国占领军，而且也反对由德国人安排的萨洛共和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最后阶段中，一方面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回到它的“革命的起源”，另一方面却日益沦为德国占领军的地地道道的同谋者。这个阶段既复杂又微妙。

在巴多利奥于1943年9月8日宣布了5天前同盟军签署的停火协议后，德国部队在几天后就占领了尚未被盟军占领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昔日的盟友如今受到像战败的敌人那样处理。南蒂罗尔和威尼斯被并吞，德军占领区遭到有计划的、残暴的洗劫，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到处搜索犹太人和政敌。墨索里尼于1943年9月12日被德国伞兵救出以后，不顾这一显然纯由纳粹德国利益所决定的政策竟同意在11天后宣告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⑥

还没有完全失去号召力的墨索里尼努力争取人民的赞同并非没有成效。他从加尔达湖畔萨洛政府所在地宣布了范围广泛的社会改革并且唤起自己同胞们的爱国主义，他们应同德国占领军站在一起，与推翻他的卖国贼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但是，这些呼吁收效甚微，尽管萨洛共和国无疑不单纯是一个傀儡政府，因为许多法西斯分子还认为对墨索里尼

必须始终忠贞不渝。然而，主动权日益落到了胜利进军的盟军和抵抗运动的游击队手里。在日益削弱的法西斯萨洛共和国的地区，也爆发了罢工、对法西斯分子和德国军队的袭击以及其他暴力行动，这些行动最终导致各省得以在盟军抵达之前获得了解放。

对于抵抗运动的反法西斯活动的规模和成就当然不可作过高的估计。此外，也不能不看到这一事实，在罗马成立的反法西斯政党委员会（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以国王为首的保守派集团和教会集团之间发生了紧张状态和冲突。顺便提一下，这时共产党人仍然忠于人民阵线的思想纲领，而且反对取消君主制代之以共和国或代表会民主制的企图。但是，尽管在也还带有战后初期印记的抵抗运动内部有这些纷争，我们总的来说还必须承认，意大利在巴多利奥政变后，即使不是全部、但在很大程度上独自从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解放了自己。这一点和不同党派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较早的合作对意大利党派显而易见的、直到当今的意见一致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党派，除新法西斯主义者外，一如既往，总是以它们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传统为依据。

但这一反法西斯号召也带有一定的思想特点，这可以用这段笑话言简意赅地表述出来：意大利其实有八千万人，因为1943年前有四千万法西斯主义者而1943年后有四千万反法西斯主义者。对这个意大利笑话不会有相应的德国笑话，这绝非偶然。正如在下一章所要揭示的那样，就是这个“德国法西斯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地意大利相比，除了共同点外，也显现出在根源、组织机构和后果方面相当多的不同点。

第 3 章

民族社会主义

第 1 节 产生和崛起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同意大利法西斯党相似，产生在战后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但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年代它才真正崛起为群众性的政党。墨索里尼在他的党成立后不到3年就上了台，不过，后来他为了党的扩充和巩固花了6年功夫；而希特勒花了13年之久才得以夺取政权，然后他利用权力在6个月内消灭了所有敌对的和竞争的力量。可见，纳粹党的兴起史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发展有很大不同。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法西斯政党所面临的条件是不同的。

德国的工业化程度远比意大利要高。在这里不存在可与意大利比较的农业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多数始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下倾向于改良主义，而且积极参加粉碎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和共产党的革命尝试。历届民主政府最初成功地克服了因战争经济转变为和平经济以及因战争赔款而引起的经济危机。最初，连德国战争失败后比意大利强烈的民族主义修正主义也被遏止了。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引起的直接的战后危机接踵而来的平静是虚假的，迷惑人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出现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现象的活跃和增长，而这些危机现象一开始就给魏玛共和国打上了标记。就这点而言，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所面临的前提，尽管时间因素不同，但也有结构上的共同点^①。

纳粹党的历史、结构、纲领和政治实践同意大利模式比较，除有不同点外也有一定的共同点。^②如果说，民族社会主义自1922年以来被称作“法西斯主义”并受到反对，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1920年2月24日以后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德国工人党在最初到1923年这一阶段内同意大利法西斯党相似，主要是由昔日的战争参加者和城乡中产阶级的成员组成的。^③与军官、小工商业者、雇员、官员和农民相比，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成员显然是少数。可是，这个所谓的工人党处心积虑地也争取无产者阶层。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各种假社会主义要求中有诸如托拉斯国有化、没收战争利润、土地改革以及在1920年2月24日的25点纲领中模糊不清地所称的“打破利息奴役制”。^④又同意大利法西斯党相似，这些反资本主义的目标，被用明显反社会主

义的、民族主义的纲领条款加以补充并且同时受到阻碍。但是，纲领的核心是反犹主义，它一定程度上成了各种民族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要求的夹子。犹太人不仅被看作少数民族，遭到反对——在党纲的许多章节里要求驱赶迁居德国的“东部犹太人”和对几世纪以来定居而同化了的德国犹太人授予“外国人法律地位”——，而且犹太人整个地被视作德国战败、所谓威胁性的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的真正根源和责任者，而且把他们说成是魔鬼。这种原始地、但并不只从种族思想意识上考虑的反犹主义使民族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区别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只有灭绝意志是可以对比的，这种灭绝意志虽然在意大利并不针对少数犹太人，但恐怕针对马克思主义者，还针对少数民族，这一点常常是被人所忽视的。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和政治实践中也像在社会和思想意识领域上有其共同点。纳粹党同样按照军事观点来划分并建设的，而且掌握穿着制服、部分武装起来的队伍。1921年8月3日成立的冲锋队到1923年11月就拥有一万五千名成员。^⑥冲锋队在其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成分和其青年年龄结构方面，特别由于其强调刚强性格方面与意大利法西斯行动队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冲锋队在它的组织里和在它出现时沿袭并保持严格的军事礼仪，但有两点同墨索里尼的内战部队有很大不同。尽管纳粹冲锋队同其政敌也诉诸暴力冲突，但它在大厅里和街道上搏斗殴打的程度远未达到在意大利所能见到的那种恐怖性质。冲锋队同由农场主在人力、物力方面支持和建设的意大利农业法西斯主

义的行动队有所区别，绝不能称它是大地主和工业主的工具（即使在它的早期）。

希特勒从一些中、小企业主那里所得的财政资助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早些时候像一支由农业主和工业主豢养的、但并非完全依赖他们的内战军队，而纳粹党则一开始更多地通过宣传活动，诸如演讲、集会、游行等等，来加强它的党员和追随者的队伍。初期，这些经常性的宣传活动取得了成效。纳粹党成功地越出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地区也在其他德国邦内取得基地并成立地方工作队。然而，还在1923年年底，党的重点显然还在巴伐利亚。在这里，纳粹党已形成一支政治力量，在慕尼黑和柏林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指望于它。希特勒意识到他拥有相当大的、限于地区性的实力地位，乃于1923年11月8日自以为力量已强大得足以仿照墨索里尼的榜样敢于“进军柏林”。

这次冒险计划并非像其完全失败后所表现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希望。^④1923年10月间，发生了中央政府和巴伐利亚邦务总办冯·卡尔之间的冲突，卡尔在这场冲突中得到以冯·洛索夫军区司令领导下的国防军巴伐利亚部队的支持。这些纠纷引起巴伐利亚政府和中央政府互相不再承认。希特勒试图利用这一悬而未决的状态为其目的服务。1923年11月9日夜，他拘留了冯·卡尔和冯·洛索夫，旨在说服他们支持他对中央政府发动的政变。但冯·卡尔和冯·洛索夫旋即又宣布同希特勒脱离关系，并命令警察局粉碎定于11月9日进行的民族社会党人的示威游行。为这一目的被征集的邦警察部队服从了这一命令。警察遂向希特勒和鲁登道

夫所率的纳粹政变分子开火，其中被打死16人，队伍解散，鲁登道夫当即被捕，两天后，希特勒也被抓获。这场政变遂告失败。

纳粹党在全国各地遭到取缔。但希特勒不管这次全面失败竟成功地东山再起。这场政变本身以及1924年4月1日宣判鲁登道夫无罪和判处希特勒要塞监禁（这一监禁时间短得令人可笑，而且还被人视为光荣）而告终的审判导致希特勒名扬整个德国，而且受到许多追随者和同情者的庆祝。纳粹党终于成了舆论界经常所称的“希特勒运动”。希特勒在监禁期间写下了自己纲领性的、但同时代人很少读过的《我的奋斗》一书。他在被释放后，还成功地在1925年2月27日重建的纳粹党内实现了他的领导要求。

这绝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没有被捕的那些纳粹头目们在此期间加入了“德意志人民自由党”，该党在1924年5月4日的国会选举中毕竟取得32个议席，但在1924年12月7日的选举中又丧失了18个席位。1922年年底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分裂出来的右翼组成的“德意志人民自由党”不过是纳粹党的匿名组织。它的工作重点主要在德国北部地区，希特勒暴动前，纳粹党在那里力量很薄弱，在反对议会制方面，德意志人民自由党未达到纳粹党所曾做过的那种激进程度。在该党的民族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更多从民族观点考虑的代表人物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导致分裂和新建各种民族主义的和民族社会主义的派别。

希特勒善于充当各方申诉的仲裁人，把大多数竞争对手引入重建的纳粹党。其余的民族主义派别沦为完全无关

紧要的派别。但是，对政治策略和思想目标的争吵却从未结束。

争吵主要在与纳粹党是否应坚持其至今的政变策略和为争取工人阶级而确立一个显得非常革命的目标相联系的问题上愈演愈烈。希特勒被释放后，为了使纳粹党的重新批准不受威胁，决定放弃了以法西斯榜样的政变策略，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赞同议会制的政策。只有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才能摧毁民主制，到那时，正如希特勒公开宣称的那样，可能会有“一批人丢掉乌纱帽”。这种对合法性的暂时的承认并不排除对待政敌采取暴力行动，然而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发生在街头、集会场所和工人区现场的争斗不是本身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采取这种也使用暴力进行的宣传活动，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党的、特别是冲锋队的、对青年人的吸收力，另一方面也唤起纳粹党所诉说的、由它自己广泛制造的印象：似乎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一位领袖、才能消除杂乱无章的状况并建立秩序。

只有在克服了多方面的抵抗之后，希特勒成功地使德国北部和西部的大区党部领袖相信这一策略的正确性，这一策略虽然较缓慢、但却更加牢靠地去取得政权。^②此外，聚集在“德国北部和西北部纳粹党大区党部工作组”施特拉塞兄弟领导下的那些对这一合法路线的批评者们认为，不顾一切挫折，纳粹党的目标应当是首先争取工人阶级的拥护。因此，他们主张强调反资本主义纲领条款，而希特勒为了加强民族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反犹太主义的目标，削弱了这些条款。对于这些彼此密切相关问题的争吵终于导致1930年奥托·施

特拉塞退党。1930年年底至1931年年初，发生了一次新的党内危机，其结果是，易北河东部地区的全部冲锋队在瓦尔特·施滕纳斯领导下起而造反，并宣告追随柏林区党部领袖戈培尔。^④这场危机只有在希特勒亲自干预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更使纳粹党领导人感到威胁的是，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同冯·施赖歇尔将军所进行的谈判，但谈判没有结果，以致避免了这场可怕的党的分裂。

党内的分歧没有达到像在意大利各省领导人掌握高度独立地位的那种程度，这一地位同德国大区党部领袖的地位是无法比拟的。然而，分歧表明这一基本事实，这个民族社会主义的领袖党绝对不是团结得像它对外所表现的那样。这些党内分歧由于经常性的竞选(按这个词的词义)挑衅行为和迅速取得的胜利而得到了克服。

纳粹党在1928年5月20日的国会选举中只获得2.6%的选票和12个席位，比人民党人4年前在12月大选中所得的席位还少2个。然而，纳粹党的党员增长数已表明了一种发展趋势。在它的队伍中，工人的数量一如既往偏少，日益增长的，除手工业者、中小企业主、雇员和大学生外，也有大学教师、公职人员、特别是农民涌进了党内。^⑤它正是在中、小城市及其农村加强鼓动宣传活动的结果。1929年，纳粹党在各乡镇和邦议会选举中的选票远远超过10%。更为引起轰动的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合会”在各大专院校全德大学生委员会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⑥1929年，它平均已经获得所投票数的30%以上。纳粹党在1930年5月就已拥有约24万几乎全是男性的成员，所以它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了。然而，

绝大部分公众对于纳粹党在1930年9月14日国会选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意外惊奇，它竟以18.3%的票数和107个席位一举跃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两年后，纳粹党在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其席位翻了一番，当时达到230个席位。

这一跃进式的增长最初主要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间接和直接的结果。^①正是那些不得不蒙受收入削减和有理无理地害怕贫困化的中产阶级成员投了纳粹党的票，反之，产业工人则依然广泛进行反抗。但根据新的估计，总还有约20%的纳粹党票数来自工人阶级。^②尽管如此，经济危机现象对于纳粹党的选举胜利并非单独、也非直接起了决定作用的。下述事实突出地表明这一点，即这些因经济危机终于受害最深的失业者大多投了德国共产党的票。另外，纳粹党的胜利并不处处都一样大。这些胜利在农村、天主教地区是极小的，但在中、小城市及北部和东北部新教的农村地区特别大。在社会经济结构相似地区的不同选举态度应首先归因于两个教会对于民族社会主义所持的不同立场。由于纳粹党的一些代表人物、特别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所持的宗教观点，天主教会至少到1933年为止对纳粹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成功地敦促它的教徒选举中央党。与之相反，分裂为28个地方基督教会的新教教会的代表人物虽然也拒绝罗森贝格的新异教的观点，但同时却或多或少地公开同情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目标。毕竟纳粹党在东部边界地区所取得的胜利同样特别大这一事实不能不主要在这里蔓延特别厉害的民族主义来加以说明，因为它更加强

化了一些由经济和信仰所制约的因素。综上所述，可以肯定，纳粹党的成员和选民虽然是主要由、但决不是完全由中产阶级的成员组成的。

尽管如此，纳粹党基于各种理由仍然不能说具有中产阶级的党的特性。^④ 纳粹党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基本上、甚至完全具有中产阶层特色的组织，更确切地说，它从来就没有放弃争取和代表各阶层人民的要求，其中也包括最初很少争取到的工人阶级。它把自己的选举胜利根本不只是归功于社会要求和其有意模糊不清的经济纲领。表现同样有诱惑力的是纲领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条款以及纳粹党用以引起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激情的政治格调。许多人选举纳粹党不是因为它的纲领，而是因为他们被纳粹党以其活力、团结和特有的刚毅力而诱发出来的外部形象所感动。这特别对青年男子成员有吸引力。常常为人们忽视的是，与意大利民族法西斯党（和其他法西斯主义运动）相似，纳粹党所拥有积极精神的核心是一个纯粹的成年男子的联盟，它代表了当时诱人的那种讲哥们义气、具有青春活力和军人好斗的道德和性格。

类似中产阶层论那样片面和错误的观点就是当时和现在仍流传的所谓纳粹党不过是工业巨头收买的和操纵的工具而已。^⑤ 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断言纳粹党和其他政党一样从各个工业主那里取得财政捐助用来支付鼓动宣传和竞选所需要的巨额费用，这是对的。但对这些财政支持的数目，至今没有可靠和足够的统计。然而，许多材料说明，纳粹党的“自筹资金”，即党费和纳粹举行集会演出的收入，

比收到的捐款重要得多。^⑤与此相反，可以肯定，工业界的捐款与其说是民族社会主义选举胜利的原因，还不如说是这一选举胜利的结果。

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经济和社会危机现象，也不是大多数中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和一些乐意在物质上支持纳粹党的工业巨头们的意愿——远为重要的却是德国非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和反法西斯主义力量和政党所犯的错误。

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能从它们意大利兄弟党徒然地力图阻止法西斯主义兴起和上台所犯错误中汲取教益。^⑥尽管它们基于这个意大利例子能够而且必须知道法西斯主义如果胜利摆在它们面前的是什麼，但是，这两个相互敌视很深的德国工人党不愿克服它们纲领性的原则分歧，结成共同反法西斯主义的抵抗阵线。德共领导人从纯功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定义出发，把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以至德国社会民主党标以“法西斯主义”，对之进行斗争，并用冒险的、但同时在逻辑上令人信服的断语来说明资产阶级和社民党政客至少以间接方式支持了资本主义，如果它们维护议会民主制的话。社民党所代表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党的“民族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只是在运用的方法不同而已。“民族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的直接代理人出现，而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则以其对议会民主制的信奉更多地从间接方面支持资本主义，因为民主制是一种勉强掩盖着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德共也提出过一些统一战线的建议。这些建议几乎都不是向社民党领导而是向社民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普通成员提出

的，目的是说服他们加入德共及其下属组织。然而，对保卫民主和联合社民党都未能作出决定。德共自觉力量已强大到能够同社民党、也能够同纳粹党进行斗争。这时，德共在“只要碰上法西斯分子就打倒他们！”的口号下所进行的纯暴力策略和通过接受民族主义要求说服纳粹党追随者加入德共的努力之间犹豫不决。按照一名从纳粹党转而加入德共的国防军少尉的名字称之为舍林格尔*路线的这一策略在1930年宣布的“争取德国人民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共产党纲领中达到了顶点。这一民族主义的拥抱战略和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点甚至导致德共同纳粹党结成一些局部的、短暂的联盟。例如1931年夏季共同组织公民投票以解散普鲁士邦议会和推翻社会民主党政府以及1932年秋季在柏林交通公司进行的罢工就是这样。①

社会民主党人对这种情况看在眼里，认为更有理由来拒绝同共产党人认真进行结盟谈判，因为正是民社党人和共产党人完全一样想要摧毁社民党所建立和保卫的民主制。他们在反抗中依靠自己用以削弱民族社会主义宣传（不过成效甚少）的论据的说服力和自己已经取得和扩展的政治权力地位，这首先指社民党所领导的“黑红黄色国旗队”，**它拥有200万成员可成为冲锋队的抗衡力量。如果民族社会主义者仿照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企图用暴力夺权，那么至少在普鲁士由社民

* 舍林格尔曾是国防军军官，赞成实行“民族革命”，后被德国最高法院以谋反罪逮捕，释放后加入德共。——译者注

** 黑红黄三色是魏玛共和国国家的颜色，国旗队系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准军事组织，成立于1924年。——译者注

党人领导的警察局会得到援助。但是，在德国总理冯·巴本于1932年7月20日采取显然非法的行动未遇任何抵抗废除了由社民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之后，社民党的反法西斯纲领已失去了支柱。国旗队在1932年7月20日和1933年1月30日都根本没有被动用起来。这种毫无抵抗的退避表明了社民党在反法西斯战略上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它在保卫民主制时只限制在使用民主方法，而错误地等待在右派政党中和在官僚机构、经济界和军队内部的民主的敌对分子遵守民主的竞赛规则，虽然他们已经公开表明对共和国采取原则性敌视立场。它对魏玛共和国的其他民主政党也在逐步瓦解和放弃民主制这一事实反应太晚而且太软弱无力。为了防止“更坏的情况”，也就是制止法西斯主义夺权（人们囿于意大利的例子想象只用暴力和政变方式夺权），社民党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阶段对于1918年所取得的社会成就的废弃、甚至对基本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破坏采取了容忍态度。这样，就产生了民族社会主义者得以为其“夺权”而利用“权力真空”的状况。^⑩

但是，对德共和社民党错误的反法西斯战略的批评决不是为资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态度以及军队代表、工业界代表和农业界代表的态度辩解。这些势力对于严厉的紧缩通货的经济政策负有责任，通过这一政策，失业率随着灾难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而不断增长；这些势力也要对布吕宁、冯·巴本和冯·施莱歇尔的总统制内阁的政治路线负有责任，这些内阁由于它们不掌握议会多数，破坏了宪法而且缓慢地摧毁了本来还稳定的民主制。尽管纳粹党在1932年11月6日的国会选举中丧失了34个席位并陷于有可能导致失败的危机之中，

但在德国大工业界、农业界的上层代表和冯·兴登堡总统周围的一些政客的发起下推翻了冯·施莱歇尔总理并成立了一个希特勒领导下的联合政府。

第2节 “第三帝国”

1933年1月30日合法成立的内阁除了希特勒自己外，还有两名其他民族社会主义者：威廉·弗里克，任中央内政部长；和赫尔曼·戈林，任不管部长兼普鲁士内政部长，指挥最大的一个邦的警察局。此外，民族社会主义者以其拥有几百万成员的党和按军事观点组织起来的、部分武装起来的冲锋队和党卫队掌握着1933年1月30日以前历届民主政府和总统制内阁几乎还未能控制的其他权力工具。因此，如果说，希特勒的保守党盟友认为他们向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交出一部分重要的国家权力即支配警察的权力，就能使纳粹党的群众运动一体化并予以控制，这是极为短视的，而且鉴于意大利的经验也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民族社会主义者利用了1933年1月30日交给他们的权力，以便借助他们的党组织去镇压政敌并清除保守党盟友。民族社会主义的“夺权”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行动，它是在近6个月之内广泛地完成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为此却用了6年之久。^④

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不久，国会就被解散，公布了新的大选。在这次竞选中，民族社会主义者不仅动用了这时已源源地从工业界送来的捐款，而且还肆无忌惮地、成功地充分利用自己作为参政者和一支已半国家化的党的军队领导

者所掌握的权力地位。通过两项公告(2月11日和2月22日)，普鲁士的四万名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被任命为辅助警察。戈林在2月17日指示他们在迫害政敌时毫不留情地使用射击武器。还在2月27日国会纵火之夜，共产党人被归咎牵连此案，当晚，几千名共产党干部按事先准备好的名单被捕了。一天后，这一史无前例的逮捕浪潮事后通过《总统保护人民和国家令》“合法化”了，因为所有魏玛宪法的重要基本权利已经失效。德共党员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虽然他们的党还能参加3月5日的国会选举。德共所获得的81个席位竟在3月13日被宣布为无效。

这次国会选举由于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迫害已无自由可言，在大选中，纳粹党获得所投票数的43.9%。因此，民族社会主义者并未达到力争的绝对多数。然而，这是一次宣传和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何况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钢盔团合并而产生的“黑白红斗争阵线”占有8%的票，已准备支持希特勒了。反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恐怖行动还在继续，他们被关进冲锋队和党卫队的许多“野蛮”的集中营，在那里，他们被殴打，常常被拷打致死，也没有国家机构——警察局、司法机关、国防军——进行干预。在这期间，对纳粹党的政敌和盟友继续进行着有计划的一体化和清洗工作。3月5日国会选举过后不久，尚未由民族社会主义者领导的邦政府被废除，并由所谓的“中央特派员”接管。3月31日，通过“授各邦同国家享有同等地位”的法律而根据3月5日国会选举结果新成立了邦议会，也没有举行新的选举。8天前，在3月23日，通过《排除人民和国家危急的法令》实际上把国会取消了，因

为民族社会主义政府被授权可以不经国会和参议院的参预和协作就能颁布法律。这一《授权法》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因为反对它的只有那些还没有被捕的或者尚未逃走的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在各议会一体化和清洗后，又根据4月7日的“恢复专职公务官员制”法也把政敌和不享有暂时还受保护的前线士兵地位的这些犹太人从行政机关清洗出去。5月2日，各工会被解散，它们的房子被占领，财产最终被交给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劳动阵线”。6月22日，社民党也被禁止，它的干部只要没有坐在许多“野蛮”的集中营里或者逃亡出去，就被逮捕。在6月和7月间，还存在的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自动解散后，就通过1933年7月14日的法律宣布纳粹党为德国的唯一政党。至此，从上到下以恐怖主义的、假合法的方法所完成的夺权过程大体上结束了。

从这时起，在纳粹党外，只有军队和教会还掌有一种至少是潜在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权力。这两个机构虽未被一体化，但受到广泛的清洗。军队在民族社会主义对政敌的灭绝讨伐期间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在1934年6月30日所谓“罗姆暴动”（在这次“暴动”中除一些冲锋队领导人外也有几个保守党政客，包括前总理冯·施赖歇尔将军，被杀害了）中所持的消极态度犯了同谋的罪行，而且客观上已成为民族社会主义暴力统治的帮凶。甚至在1938年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依据微不足道的、甚至可笑的控告——前者因一位“身份不相称的”夫人，后者因犯了所谓同性恋过失而受牵连——被解职后，在武装部队内竟没有引起任何抗议。大多数军官多少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德国的扩军和初期的胜利

战役，而且当民族社会主义政权面临全面失败和所犯滔天罪行暴露无遗的时候，他们还认为对向希特勒本人宣过的誓负有责任。然而，一些军人集团的抵抗表明了上述事实，即军队整个来说还未完全被民族社会主义者一体化和剥夺权力。^④

尤其复杂的是“第三帝国”的两种教会的地位。这里有一些数量上较少的集团和个人的反抗，也有许多集团和个人的热心的、有时过分热心的顺应。顺应和反抗既有宗教方面的动机、也有政治方面的动机，这在两种基督教派绝不是相同的。天主教会的领导出于善意的同情很快就放弃了它直到1933年对民族社会主义所持的强烈反对态度。对此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希特勒在其上台后不久提出的、在1933年7月20日已由罗马教廷和“第三帝国”签订的政教协定。这对天主教会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不仅让教会学校继续开办，并得到法律保障，而且许多天主教世俗、妇女、手工业和青少年联合会存在得到法律上的书面保证。诚然，天主教会随着同意授权法不久被解散的中央党的牺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天主教会忍受了这一点，而且接受了与政教协定相联系的、在政治和宣传上极为重要的对“第三帝国”的承认并抬高它的身价，因为教会希望能够阻止自己的社团和联合会一体化。它的社团的勃兴、1933年以至1934年被民族社会主义者容许、甚至鼓励的加入教会的浪潮以及天主教会学校数量的扩大看来暂时证实了这些希望。

但是，自1935年以来，纳粹党以日益扩大的成就力图消除天主教青年会的影响，这些青年会随后逐一被解散，并入

了希特勒青年团。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其当前推行废弃信仰政策的过程中加强了反对教会学校和天主教报刊的运动，终于到1941年，所有还保留的主教管区的报刊不得不停止发行。此外，民族社会主义者发动指控天主教团成员道德败坏和违反外汇管理法的用心险恶的诽谤运动力图使天主教信徒脱离教会。这一变本加厉地敌视教会的政策后来引起了一些天主教徒的抗议和反抗，但它从未获得整个天主教会的全力和公开的支持。

福音教会的绝大多数，除了自由派神学家和信教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相当小的团体外，对于夺权、民主制被摧毁和民族社会主义恐怖政权的建立持赞同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感到高兴。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是新教教会内部在政治方面奠定的对官厅的传统的忠诚、以及从宗教方面考虑的对德意志民族的弘扬和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制的蔑视。不过，一些民族社会主义者在1933年的头几个月内努力在组织上使28个邦福音教会达到一体化的试图失败了。一些因结在“青年宗教改革运动”中的牧师和迄今的教会领导起而抗议这种也遭到兴登堡总统批评的一体化的总形式以后，原已在1933年6月24日安插的“邦福音教会的国家特派员”奥古斯特·耶格尔又被撤回了。

当然，这场争执是以对民族社会主义者非常有利的妥协而告终的，因为协议规定，各教区对在“第三帝国”内的福音教会的形式和整顿应自己来进行表决。在安排不充分的、由纳粹党的全部宣传工具支持的7月23日教会选举中，“德国基督徒”组织获得所投票数的60%以上。于是，在福音教会内

“从下”进行的夺权看来已完成了，因为1932年才成立的、常常自称是“耶稣基督冲锋队”的这一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基督徒”组织的运动这时在大部分教会领导中和德国的几乎所有教区中掌握了多数。这个运动一贯利用这一多数，把各个福音教会不仅在组织上、而且也在思想上进行一体化。在各邦教会内，如9月5日在旧普鲁士联盟福音教会内，实施了雅利安人条例，它规定把“非雅利安人”牧师和教会神职人员开除出去。9月27日，希特勒的亲信路德维希·米勒被选为“全国主教”，因而成为所有福音教会的头领。1933年11月13日德国基督徒组织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要求，从这时起，《旧约全书》和《保罗书信》不再受到重视，因为它们是从犹太教的产物，在这之后，甚至具有保守思想和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的新教徒不愿再根据政治一体化接受这种神学雅利安化。这时产生了最初从纯神学考虑出发的抗议运动，该运动后来由1933年9月11日成立的“牧师非常联盟”、最后由明认教会领导和组织。从中发展出教会抵抗运动，这一运动在明认教会的一些代表人物那里是自觉地、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其实是勉强地接受了一种政治性质。^①

如果我们撇开个别教会和军事集团和个人的抵抗不谈，那么，概括起来可以确定，教会和武装部队虽未完全被一体化，但已大大被适应或自己适应到这种程度，以致它们基本上并不构成第三帝国内部持久存在的危险了。它们与其说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竞争对手或者甚至是它的敌手，还不如说是它的盟友。因此，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民族社会主义宣传家的论断是对的，他们说，第三帝国已是团结得像铁板一块的

领袖独裁之匡，已能把一切敌对的、竞争的力量清洗并一体化了。这个“希特勒国家”也比意大利法西斯“极权国家”更加极权，但它也同意大利法西斯一样，具有某些多头政治的特点。

党、工业界、武装部队和官僚机构的各个集团和个人之间经常发生权力争斗。连地区和地方这一级，党内内部以及他们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间也在争权夺势。所以，指出这些经常发生的权力争斗是重要的，这里不可能具体地加以叙述；但也应防止过高估计第三帝国的多头政治的基本特点。一方面，应该想到，这些权力争吵并未削弱，而是加强了希特勒的独裁权力和决断权限，因为希特勒善于像在崛起阶段所做的那样，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民族社会主义掌权者内部挑动那些不和的集团和个人相互争斗，从中渔利。此外，还必须非常重视这一因素，即这些不可低估的多头政治的特点丝毫没有限制和减少民族社会主义恐怖的水平 and 数量。权力争斗既未受阻，也未延缓民族社会主义恐怖体系的建设 and 功效，因为在迫害政敌和少数民族时，在这些争夺权势范围的集团和个人之间并无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简述一下民族社会主义恐怖体系的发展和职能方式。^⑥

1933年这一年里，冲锋队和党卫队的上述无管束的恐怖行动大多随着对1933年2月28日国会纵火法的指令而“合法化”，随后又逐步加以遏制，因为纳粹党头目害怕对此失控。取代这种恐怖的是盖世太保* 的由行政机关控制和国家批准的

* Gestapo(盖世太保)系Geheime Staatspolizei(国家秘密警察)的缩写。

——译者注

恐怖。盖世太保是从柏林警察总局的IA处分出来的。1933年11月30日，当时还称为“普鲁士国家秘密警察局”的官员和雇员获得很广泛的职权。对他们采取的措施既不能申诉，又不能通过法律裁决。但在这期间，对盖世太保和它的头子戈林来说，却出现了一名党内强有力的对手。这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他直到1934年春控制着除普鲁士外所有邦的政治警察。戈林对希姆莱和党卫队的擢升毫无好感，但他害怕罗姆的冲锋队。因此，他在1934年4月20日同希姆莱达成一项“协议”，希姆莱这时充当了普鲁士总理即戈林的代表、普鲁士盖世太保的督察员；普鲁士盖世太保同其他非普鲁士各邦的政治警察合并成盖世太保并加以扩充。

两个月后，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出击了，消除了冲锋队令人厌恶的竞争以及其他实际的和潜在的政权敌手。希姆莱在粉碎所谓的罗姆暴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大受奖赏。他作为“全国领袖”所指挥的党卫队是从冲锋队分离出来的，并直接听命于希特勒。它从冲锋队接管了集中营的领导和看管权，集中营如今得到了“国家的承认”，而且按照达豪集中营榜样进行了扩建。它们不仅被用来迫害和威吓政敌，而且也被用来变成党卫队的经济王国的中心和起点，因为它从1930年以来也竭力剥削因政治和“种族”原因而被关押的人的劳动力。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后来也成功地把政权的其他监视机构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并把它们并入国家保安总局。

1939年9月27日成立的国家保安总局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36年已与盖世太保合并的刑事警察和保安警察，二是保安

处(SD)。保安处是早在1931年成立的纳粹党秘密警察监视机构，它在1933年以后在希姆莱及其代表海德里希领导下与盖世太保同步进行扩充的。盖世太保各部门及其领导机构进行追捕并从全国把每月形势报告送往柏林以供利用，而保安处就提出追捕和监视政敌和种族主义受害者的一般原则。首先是驱赶，最终是“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②

反之，1933年已把政治上、种族上不受欢迎的法官和检察官广泛清洗掉的司法系统，不受作为恐怖主义第三帝国核心的党卫队恐怖组织的控制。但是，这对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还是不够的。此外，还大大强化了政治刑法。这就是，一方面在1933年2月28日颁布了“反对背叛德意志民族和叛国阴谋”紧急法令，由此修改了刑法的一些条例，使司法人员便于行动。另一方面，在3月21日颁布了“反击对民族振兴政府的恶毒攻击”的法令，以此就能惩罚所有哪怕只是敢于批评民族社会主义政府的人。许多唯命是从的法官以其一贯的残忍把刑法和诉讼法里进行的这些和其他内容上的修改条例付诸实践，随着1934年4月24日成立人民法院，德国的司法系统也就在组织上得到改变和扩展。

1934年7月14日已开始工作的人民法院的建立是民族社会主义者对国会纵火案结局的回报，这起纵火案是以对纵火嫌疑犯范·德·卢贝在法律上极成问题的死刑判决和无罪释放共产党被告而告终的。人民法庭的任务是迅速而严厉惩罚政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修改了各项诉讼程序的规定并制止申诉和修正的可能性，从而加重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的负担。人民法庭的法官和陪审员大多是从冲锋队和党卫队领导层中

选出来的。他们总是满足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愿望。他们不仅工作极快(1935年“只”宣布210个判决,而1944年达2000个判决之多),而且作出的判决极其苛刻,根本不经法律程序调查。从1934年至1944年,总计宣判死刑约13000起,其中大部分已经执行。^④

民族社会主义恐怖机构的措施的受害者,除了反对这一制度的、其抵抗从未完全中断的政敌外,主要是少数民族。当然,首当其冲的是犹太人,他们遭到诽谤中伤,权利被剥夺,被置身于“民族共同体”之外,备受压榨、迫害,最终遭到灭绝。民族社会主义者对犹太人的迫害在这里不能详述,各个机构进行迫害的方法是各不相同的,而且理由是各种各样的。

党的积极分子及其分部进行迫害时,公开采取最引人注目的、但非常没有必要的行动,他们鉴于居民态度大为消极而提出举行体现所谓代表“民意”的无理要求。这表现在1933年4月1日对犹太人的商店、门诊所和律师事务所的抵制活动,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和各地设有大学的城市焚毁“非德语的书籍”,特别是在1938年11月9日进行的大屠杀,时至今日还美其名曰“全国砸玻璃窗之夜”,尽管这一行动决不只是砸碎窗玻璃、洗劫犹太人商店和捣毁将近所有的犹太教堂,而且把26000名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把91名犹太族人杀害。

此外,比这些和许多其他被民族社会主义者所容忍、挑动并实施的侵犯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几百条反犹主义法律、法令和附加法令,它们的根据又是民族主义者自己所代表的“民意”。前已提到,根据1933年4月7日的“恢复专职官员制”法只解除与此有关的犹太出身的专职官员的职务,但自1935年9月

以来，那些原先由于前线士兵条例还享有很不可靠的“保护”的专职官员也受到了牵连，许多职业终于禁止犹太人干，从1938年以来已扩展到所有犹太人医生、律师、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这些法律和其他特别法（用以禁止犹太人上公办学校和大学、进电影院和戏院、听音乐会、进澡堂、参观展览，而且最终不准犹太人购买和占有汽车、电话、报纸、一定的服饰和贵重物品甚至家畜）通常是以1935年9月15日的纽伦堡法为依据的，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国家公民权利，禁止他们同“雅利安人”通婚和性交。党和国家还通过掠夺德国犹太人的财产，对这些污蔑和迫害措施加以补充，这种掠夺被称为“雅利安化”，不仅由国家机构，而且也由一些公司和私人来执行。

概观这里只能列举的许多由不同机构领导的反犹行动，难以从中揭示出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和一种统一的动因。事实上，这仅仅出于回溯的观点，对欧洲犹太人最终力图并几乎达到的整体灭绝看来，是民族社会主义对犹政策的必然的而且有计划的结果。尽管如此，在对德国和被德军占领的欧洲的犹太人进行诽谤、排斥、剥夺权利、抢劫和迫害的各个阶段里，实际上已创造了以其残暴而坚定地进行“大屠杀”的条件。总的方面基于民族社会主义反犹政策的动因，也没有一种统一性。一种也应受到反对、但毕竟在理性上可以理解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在民族社会主义反犹政策的初期阶段占了上风，而用行政机构的顽强性和大生产的完美性来推行对犹太人的灭绝不得明确地、甚至几乎只能用种族思想的教条来说明。因此，尽管民族社会主义对犹太人的灭绝特点，但同民族社会主义者对待德国其他少数民族的

态度有一些类似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③

这首先是指直到1933年年初还生活在德国的估计有26000名的辛托人和罗姆人*。对于这些在德国一般称之为“吉卜赛人”的生存，没有一个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夺权以前关心过。1933年1月30日以后，这种情况起初也没有多少改变。这些辛托人和罗姆人少数民族早些时候是间接地受到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各种反人道的法律和法令的牵连。这也包括1933年11月24日颁布的《惩治危险惯犯法》，民族社会主义者把所有因刑事上有过不法行为和犯罪行为而受到两次在法律上有效判决的人都算作惯犯。自1938年以来，这类在当时绝非只是铁杆民族社会主义者所办的“社会害虫”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在这些人里，也有各种吉卜赛人，他们由于自己的流浪生涯已触犯过各种法律和法令。但这些措施早些时候是基于所谓预防刑事犯罪的考虑，而这些考虑也成了1936年的这一非常僵硬的《吉卜赛人法令》的基础。通过这一法令，那些在1月30日以前也不受欢迎的“吉卜赛人”被置于更加严厉的警察监视之下。

纳粹国家的这些歧视吉卜赛人的措施“只是”在数量上区别于警察局先前对这种“国家祸害”使用的那些措施，而1938年6月13日的大逮捕就以经济的因素作为基础。党卫队力图除吉卜赛人外也抓捕判过刑的犹太人的这一所谓“抓坏人行动”的过程中来提高奴隶劳工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在释放

* 吉卜赛人自称“罗姆”，原意为“人”，1965年成立了“罗姆人国际委员会”。而德国的吉卜赛人又自称“辛托”。——译者注

许多政治犯以后暂时下降了。但党卫队对吉卜赛人的“兴趣”决没有就此消失。1938年12月18日，希姆莱指令，在“最后解决吉卜赛人问题上”可以运用“种族生物学的发现”。

这些“种族生物学的研究”工作是一些科学家依据中央刑事侦查局灭绝吉卜赛人中心所提供的材料而进行的。在这些调查过程中，所有六岁以上的吉卜赛人经过鉴定，根据种族和刑事犯罪报告，分为所谓“纯吉卜赛人”、“吉卜赛混血儿”和“按吉卜赛人方式生活的流浪者”。在战争爆发前后，这些认识被付诸实践。对大批吉卜赛人进行绝育措施，把吉卜赛人家庭从德国境内驱逐到波兰，最后在入侵苏联以后把他们集体屠杀。1942年3月13日颁布了“处置吉卜赛人法令”，明确规定，“对犹太人发布的特别规定”也应相应地用到“吉卜赛人身上”。在这之后，根据估计，有50万至60万吉卜赛人，其中包括武装部队的士兵，在奥斯威辛和其他灭绝营内被用毒气杀死。^⑥

尽管它们同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所遭受的灭绝行动是不可比拟的，但是，德国及其并吞地区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不得不承受的那些迫害措施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是指劳齐茨地区的索布人和德国东部地区、柏林和鲁尔区的波兰人，他们依据1934年1月26日的希特勒—毕苏斯基条约起初还保留的文化组织被占，而且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侵袭波兰后被送进了监狱和集中营。

在波兰战役后实际已被并吞的地区和在波兰地区周围已扩展的东普鲁士、西里西亚、但泽—西普鲁士大区领导的和瓦尔塔大区的统治区内，波兰人的处境困难得多了。他们受

到剥夺民族独立的政策的迫害，受尽剥削，被驱赶、谋杀，甚至动辄就被判死刑和处决。

最后，还要提到在第三帝国另一个少数民族的命运，虽然它毕竟有250万人，但它的生存今天往往被人遗忘了。这是指所谓“外籍工人”，他们是从欧洲各地，特别是从波兰和苏联，被招募或简直是被劫持来的。这些“外籍工人”的处境极其恶劣。他们通常生活在工厂附近简陋的集体住房里，给养很差。如果他们对这些措施进行反抗，或者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遵守规定的劳动纪律，那么，他们就从盖世太保的工厂被调走，或交给集中营，或交给所谓的“劳动教养营”。虽然“外籍工人”主要因经济原因被雇佣到这个国家，然后在此受到剥削，但他们的待遇也受到一定的种族主义思想影响，因为这种待遇，并不取决于劳动力和劳动意愿，而是取决于各个祖籍国家的“种族成分”。波兰和俄国的“外籍工人”在“种族成分”的表上排列在最后，他们像待遇更加恶劣的犹太人奴隶劳工那样必须身穿他们被指定的服装，佩带标志他们出身的字母和标记。如果没有这几百万外籍强制劳工和奴隶劳工大军的参加，民族社会主义者就不可能保持战争经济和德国居民相对高的生活水平。对于这一事实，人们往往不能予以充分注意，有人声称，无论如何希特勒总是有功的，消灭了失业，克服了经济危机，这种说法就成了那些看来磨灭不了的“希特勒神话”一类的东西了。^④

事实上，民族社会主义的宣传所颂扬的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内所取得的成果是虚假的。这些虚假成就主要基于纯粹非生产的就业措施和严格转变为一种坚决的自给自足政策

和战争经济政策。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最高目标是准备一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有计划地掠夺一些国家，以补偿在扩军备战方面所投入的、大部分借来的资本。这个经济计划是粗浅的，显而易见的，但至少在短期内是有成效的。它不仅唤起了经济上的虚假繁荣，而且大大地促进了广大人民阶层的凝聚，因为他们非常容易地会看到这样一些成就而看不到另一面，即第三帝国的恐怖主义这一面。

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也是这样。许多工人对第三帝国的社会福利措施的印象很深，虽然在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冬季救济活动和“欢乐带来力量”活动等组织范围内实际上达到的社会福利成就绝非像民族社会主义宣传所说的那样是巨大和重要的。当然，许多工人不愿把民族社会主义的虚假工会“德国劳工阵线”看作已经丧失的代表机构的替代组织。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民族社会主义者成功地以其劳动就业措施和军备工业的促进而消灭了失业。因此，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说有明显改善。虽然在许多消费品价格上升同时，在经济危机中反正已达到最低的工资已被冻结不动，但在一些工业部门里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1938—1939年达到了1928年的水平。这是劳动力缺乏的后果，自1938—1939年以来，在一些部门，特别在军备工业部门内，存在缺乏劳动力的状况，这就导致许多工人能够通过更换工作或以此相威胁迫使支付超过法定限度的工资。

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也直接、间接地从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中得到好处，虽然民族社会主义者没有遵守他们在1933年前所作的诺言，而且推进了经济的集中和现代化。尽管如

此，不仅职员和公务员、而且小工商业者和农民的境遇也得到了改善。对此起作用的，除经济的普遍复苏外，还有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这也许是因为把犹太人从职业生活中排除出去，并且掠夺了他们的财产，这同样直接、间接地导致许多非犹太人医生、律师、工商业者收入的提高。反之，农民不仅得到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的特殊赞扬，而且他们以1933年9月29日的“德国世袭农场法”获得明显的物质上的好处。这项法律规定，7.5公顷以下大小的田庄不得出售，也不得强制拍卖。但一般抵债不在此限。

最后，特别是工业主也是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受益者，他们不必再面对讨厌的工会享有的权利和要求伤脑筋了，他们的利润由于军备繁荣而极大地增长。此外，他们从掠夺和侵略战争中、从抢劫德军所占有的国家中以及从肆无忌惮地剥削“外籍工人”和集中营的奴隶劳工的劳动力中都大大获得好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参与决定了这场升级为全面掠夺和种族之战并必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战争的爆发和进程。

如果我们撇开一些由自给自足经济和战争经济所制约的干预不谈，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放弃了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广泛变革，但是企业主在这个不完全的、但相当彻底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里总是不能把保留给他们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在部署和进行民族社会主义掠夺战争时，他们能协作，但是对这场以“大屠杀”为其顶点的种族战争施加重大影响，对他们来说是办不到的。人们不能、也不可用来回答庸俗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效益的提问来解释奥斯威辛。对于民族

社会主义者进行的总体战也与此相似，这场战争以其彻底失败和一大部分（24%）生产力也包括私人经济生产力的丧失和破坏而告终。

早在1933年，国内外的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就宣称：“希特勒就是战争！”尽管如此，东西欧外交领域里的国务活动家们也重复了德国那些保守派政客所犯的错误，他们错误地认为能够通过绥靖政策和遏制政策来制止和框住民族社会主义的能动性。他们不仅对破坏德国民主制和迫害政敌和犹太人的举动或多或少地袖手旁观，束手无策，而且他们还容忍并接受了希特勒通过扩军备战、进军莱茵非军事区和所谓“兼并”奥地利，把凡尔赛条约的条款逐一废弃。1938年9月29日慕尼黑会议上由英国和法国明确同意对苏台德区的并吞表明了这一“绥靖”政策达到了顶点，而决不是终点。1939年3月希特勒摧毁了“捷克其余部分”并占领了属于立陶宛的梅梅尔地区后，英法政府才在1939年3月31日同意保证波兰的独立，因为很明显民族社会主义侵略政策的下一个目标是波兰。

于是，西方的绥靖政策时期就过去了。这一政策由苏联的“绥靖”政策所代替，苏联通过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约为德国入侵波兰创造了一个重要前提。事实上，1939年9月1日不宣而战入侵波兰的德国军队只进军到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内所确定的防线。苏军占领了除波兰东部外的罗马尼亚部分地区和波罗的海独立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尽管法西斯主义德国和共产主义俄国之间缔结了持续到

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为止的这一令人惊奇的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也是一场世界观战争，这场战争实质上正打上了先是希特勒的思想观点、后是强权和经济政治算盘的烙印。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各个时期和阶段按照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和其他纲领性讲话中所记载的“时刻表”那样发展。所以，比如同苏联缔结暂时的联盟和希特勒“本来”想避免的对英之战无疑都不是事先决定的。对丹麦和挪威入侵的基础，既不是以种族主义也不是以反共产主义为特点的思想要求，而仅仅是海军和工业界军事战略和经济上的要求。希腊、南斯拉夫和北非的战局也与此类似，它们也不是原先设计的，而是未预料到的军事和政治事件的结果——意军的羸弱、南斯拉夫亲纳粹政变的失败等等。²⁹

尽管如此，直接跟随作战部队进入波兰的军警特遣队追捕和杀害了实际的和潜在的政敌以及犹太人和波兰领导层成员，这些行动已表明，对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一开始不仅仅是一场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民族社会主义德国与德意志帝国不同，它不仅要在欧洲建立政治霸权，而且也要在欧洲大陆、可能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种族新秩序，对此，这一由德意志人所代表的、被认为是超群出众的“日耳曼主宰民族”就应统治其他各国民族。正当斯拉夫各民族成员遭受奴役并被处在像古代奴隶那样完全无权的地位时，这一广泛实施的计划继续规定，犹太人“种族”应被完全灭绝，因为它被视为一切罪恶的根源，即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根源。尽管这种设想令人感到十分狂妄，但它却被坚定而残暴地付诸实践。它对于工业界和武装部队的经济 and 军

事利益和目标来说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这就是说，甚至在实现种族主义思想目标同民族社会主义者确保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努力不再一致的时候也是如此。^⑧

在坚持这种疯狂的、甚至是导致自杀的对种族战争信条方面，民族社会主义在质量上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有区别的。反之，在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不是灭绝犹太人）、一体化的规模和恐怖机器的完善方面，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在数量上的区别，而德意两种运动的思想意识（又把种族主义思想作导因的反犹主义除外）、表现形象和社会组成是可以比较的。数量上不同的一体化和在德国效率高得多的恐怖体系终于成为在下一节所要叙述的、德国抵抗运动未能取得像意大利抵抗运动至少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史的最后阶段所取得的那样的成果的原因。

第 3 节 抵抗运动的成败

被禁止的和被打入地下的工人运动政党和组织的成员从一开始最坚决地反对第三帝国。^⑨他们也受到民族社会主义恐怖组织最严密的监视和迫害。尽管如此，工人抵抗运动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却得到很低的评价。一方面，这是由于如上所述民族社会主义者建立了接近完善的监视系统和恐怖系统，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工人运动各地下政党和组织（撇开一些地区性的、甚至地方性的例外）在第三帝国时期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解决它们内部的冲突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抵抗运动组织。工人抵抗运动的各个集团各自出击，各自挨打。

德共被取缔后最初还企图保持自己严格地从上到下划分的等级机构，而且不顾法西斯恐怖进行群众性行动。几千名共产党员参加制作和散发地下传单和其他宣传活动。直到1935年，甚至还把党费凭证售给地下德共党员。直到那时，德共和共产国际领导还认为通过这种便于盖世太保抓捕的群众行动，第三帝国所谓面临的崩溃就指日而待了。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一同法西斯德国的条件几乎不相符合的战略和把社会民主党当作“法西斯主义的‘翼’”而与之进行的斗争才得到了纠正。由于直到这时除党的领导外还有几千名德共地下党员在一连串的逮捕中丧生，所以自1936年以来，只限于保持国内活动的共产党抵抗运动小组和国外领导之间的一种相当松散的情报联系。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影响下，共产党抵抗运动消声匿迹，直到德国入侵苏联后才又活跃起来。成立了各种抵抗运动组织，其中有些同社民党、甚至资产阶级和军界的集团也有接触。但是，德共同意共所不同的是，它未能成功地把1935年决议的人民阵线方案贯彻到反法西斯斗争实践中去。很快又解散的巴黎人民阵线委员会是一个例外，而在德国、主要在国外、尤其在苏联活动的“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小组大多数由共产党人领导，他们不得不尊重苏联常常不是从“反法西斯”动机所决定的利益。^⑨

社民党和其所领导的德国总工会的领导在1933年久久地幻想着，它能通过对民族社会主义政权奉行一种谨慎克制的政策确保其组织的存在。这种灾难性的顺应路线例如表现在经过逮捕和逃亡已经减少的社民党议会党团对希特勒1933年

5月17日所作的所谓和平演说的赞同态度上，这一路线实际上已导致党的分裂。逃亡的社民党人在布拉格成立了一个称“索帕德”（Sopade）的新组织，它还在6月22日禁止社民党前的1933年6月18日以一篇纲领性文章向德国工人阶级呼吁并告诫他们要打破“锁链”，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拥护“改造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而斗争。

早先已有少数社民党人和工会成员转入地下。但他们不同于共产党人，很快认识到地下群众组织连同各个小组、党的领导和收缴党费、会费会激发盖世太保的抓捕。那些社会民主党人不这样做，而是从反抗恐怖主义的第三帝国的可能性的清醒估计出发，主要限制在利用谈话圈子、体育协会等保持传统的联系，以便第三帝国行将崩溃时掌握人员和干部进行重建工作。这个系统由社民党人和工会成员的可提供情报、但隐蔽得好的小组组成，这些人放弃了轰轰烈烈的抵抗活动，但正如“索帕德”报道的那样，同布拉格的党的领导机构保持很好的接触。除此之外，也有过一些地区和超地区的非常积极的抵抗运动小组，除社民党人外，也有德共前党员和共产党和社民党分裂出来的小派别成员参加进去。这方面主要有柏林的“红色突击队”，汉诺威地区的“社会主义阵线”以及超地区的“新开端”小组。^⑤

它们之所以特别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被盖世太保粉碎之前像德共反对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国际社会主义斗争联盟的抵抗小组那样进行过极度激烈的抵抗斗争，而且也因为在这些小组里形成了来自不同党派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团结。^⑥ 同样，还有些反法西斯组织，它们是在第

三帝国期间和它崩溃后不久成立的，其宗旨是在德共和社民党之外成立新的工人运动，但是这一点由于所有占领国持反对态度，如同早先组织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企图那样，未能成功。^④连工人抵抗运动代表人物同教会、资产阶级和军界的反对派集团的接触也没有达到像在意大利所见到的那种范围和程度。如果我们撇开1944年7月20日前不久所建立的接触不谈，那么，彼此不信任感未能得到消除。

值得注意的是，福音教会和天主教会内部的反对派集团和个人之间几乎也没有接触。福音教派和天主教派的反对派基督徒之间的真正合作基本上只是发生在克莱骚集团内，这个集团正如多次提到的那样，也同其他资产阶级和军界集团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抵抗运动发生过接触。之所以很分散，而且天主教和福音教抵抗战士的合作很晚，其原因在于如已描述的这两个教会在第三帝国里所处的境况不同。

虽然明认教会已在1934年5月的巴门宗教会议上以或多或少的神学论据严厉驳斥了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生活唯一的和整体的秩序”的要求，但是，对这一反对派集团的代表人物来说，也很难宣布废弃这种教会史上发展起来的并为世代代神学家一再所阐释的有关教会和国家的紧密合作。卡尔·巴特*基本上参与过巴门声明的起草，他的辩证神学在这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三帝国作为非法治国家的性质老早就公开显露出来了，那么，许多神学家用这么长时间来确证第三帝国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

* 卡尔·巴特（1886—1962年），瑞士加尔文教神学家，被称为新正统神学和辩证神学的奠基人。——译者注

符合上帝意愿的国家，事后未免太使人感到惊奇了。但至少到最后产生了一些神职人员以政治和神学为动因的抵抗行动（这里就不能详述了）和一些公开的抗议。其他还有全国兄弟会临时领导的呼吁，它反对所谓“积极的基督教信仰”，反对1936年5月28日在青年教育运动内部实施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非教派化的企图，拥护部分明认教会鉴于苏台德区问题而日益临近的冲突于1938年9月30日通知举行为维护和平的祈祷礼拜仪式，最后还拥护第十二次普鲁士明认教会会议1943年10月对大规模屠杀精神病患者和“异族”成员公开发表的批评。但是，这是福音教会为抗议民族社会主义迫害犹太人所说的唯一一句话，另一方面，也有人本着自己信仰基督的良知感到有义务去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④

从整个来看，天主教会的代表人物对第三帝国的为非作歹进行公开谴责也是踌躇不决的。对此，教会的顾忌起了重大作用，因为法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和教皇害怕过于露骨的抗议可能会招致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宣布撤销政教协定。等到民族社会主义者过分明显地违犯政教协定的条款以后，教皇庇护十一世才对此下决心提出批评。尽管如此，在教皇通谕《火焚的焦虑》中找不到一句抗议虐待和迫害犹太人和被禁止的工人运动队伍中的抵抗战士的话。反之，明斯特主教加伦伯爵反对民族社会主义者所推行的杀害精神病患者的抗议是有力，至少暂时有成效的。后来，1943年，天主教主教们在十诫主教通告中比较尖锐地抨击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宗教政策和种族政策，如同福音教会在第十二次普鲁士明认教会代表会议所做的那样。这仍然是天主教会作为机构至少是间接

地呼吁抵抗活动的唯一文件。另一方面，不可忘记福音教和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对民族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抵抗。④

总的来说，德国抵抗运动的顶点无疑是1944年7月20日对希特勒的谋杀事件，这个事件本应是一次全面起义运动的信号，但运动在开头取得一些成功后很快就夭折了。据估计在谋杀者所策划的行动成功结束时就可能像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变后那样发展为一场广泛的、成功的抵抗运动，更何况参与这一谋杀准备工作的集团已同教会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抵抗运动小组建立了联系。不少人认为这一估计是有根据的。

但是，不可不看到，这些资产阶级一军人集团的代表人物所追求的远非遵循议会民主制设想的目标。这首先是指以卡尔·格尔德勒*为首的极端保守集团，该集团成员曾会聚在西里西亚的克莱骚毛奇伯爵**的庄园里，他们所遵循的社会模式既是空想主义的，也是一去不复返的。在批判这些记载在许多备忘录里的反民主内容的社会和立宪政治计划时，不可不看到两个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事实，一方面是已提到的从共产党人直到保守派的所有抵抗集团的至少是附着式的团结，另一方面是也争取高级军官参与策划政变的这一成

* 卡尔·格尔德勒（1884—1945年），曾任莱比锡市长，纳粹政府物价检查专员，后为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1944年七·二〇事件中被处决。——译者注

** 毛奇伯爵（1907—1945年），曾供职于纳粹德国最高统帅部战争管理委员会，为克莱骚集团主要领导人之一，1944年七·二〇事件中被处决。——译者注

功的企图。因为这些抵抗战士是从清醒的、绝对现实的估计出发的，根据这一估计，消除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统治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只能由军事集团来发起。遗憾的是，只有为数很少的军官相信自己虽然曾向希特勒效忠宣誓过，但没有义务去容忍第三帝国大屠杀和其他为非作歹的行径。纵然这次政变企图由于偶然事件和计划不周（首先未能达到和几乎未去进行对公众舆论的动员）而彻底破产，但是它在历史上、道义上的意义不能以其失败来相比拟的。^⑧

整个德国的抵抗运动也是如此。虽然它基本上只遭到失败，但它终究是有成效的，因为它和无组织的抵抗和日常斗争的许多行动和表现形式向战胜国和德国人自己表明，民族社会主义终究没有像它的宣传一再鼓动的那样取得成功。当然，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逐渐减少的多数派几乎直到末日仍向他们的领袖欢呼，但同样也有另一些人，他们不欢呼，他们不迎合，他们进行抵抗，而且用这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进行着抵抗。^⑨ 尽管如此，在两个德国和政党之间，对德国抵抗运动的评价及其传统总是存在着争议。同在意大利不一样，在德国，抵抗运动的遗产和使命并未被认识为一种团结的因素。这个事实直到今天对民主协商、谅解的能力和德国的民族感都起了重大的影响。^⑩

第 4 章

具有群众基础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第 1 节 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和 民族社会主义

奥地利在地理上不仅位于意大利和德国之间，而且它以其民族社会主义的分支和或多或少地显然遵循意大利榜样的卫戍军—法西斯主义而特别显示了法西斯主义的这两种主要变种。如果我们考虑到陶尔斐斯*和许士尼格**政权过去和现在被许多同时代人和一些研究人员视为具有法西斯主义的特点，而且如果我们最终考虑到

* 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1892—1934年)，奥地利总理，被暗杀。——译者注

** 库特·冯·许士尼格(1897—1977年)，先后任奥地利司法、教育、外交部长和总理。——译者注

1918年5月以来就自称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奥地利“德意志工人党”比希特勒的党更老，那么，这个国家所拥有最大广度的法西斯主义的变种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一广度是从德意志工人党的“早期法西斯主义”经过卫国军的“正统法西斯主义”直到奥地利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激进法西斯主义”，而陶尔斐斯政权可以根据诺尔特*的类型学划为“亲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产生了“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而奥地利却是几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这些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和结构只能借助法西斯主义的对比研究来叙述并加以说明。但首先应当叙述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涉及这些法西斯主义的前提条件。^①

正当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危机而其生存受到威胁时，第一个奥地利共和国由战胜国强制诞生了。^②从保守的基督教社会党人直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政党代表出于民族和经济原因赞成同德国合并。但是，这一得到大多数居民支持的愿望却被协约国坚决驳回，因为它们把明确禁止合并的条文写进了圣日耳曼和约。如果我们考虑到最终发动战争并战败的德国通过这种方式合并奥地利可能会变得比1914年更为强大的话，那么，这种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宣布的自决原则的明显的蔑视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一定是合乎情理的。

基于战胜国所强加的义务而产生的奥地利共和国不得不对看来几乎难以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依据种族

* 恩斯特·诺尔特著有《法西斯主义的三个方面》一书。——译者注

观点、但也考虑到奥地利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意大利的强权政治利益而划定的奥地利边界强行切断了奥匈帝国各个经济区之间所建立和发展了的联系。德奥疆地的各工业部门同它们传统的销售地区和原料地区的联系也被切断了。由于许多工厂因缺乏煤炭不得不停产，就出现了大批失业现象，这种失业现象还由于军队的遣散和许多对奥地利小国行政当局不再需要的公职人员的解雇而加剧。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由于外交方面的威胁日益尖锐化。这方面表现在南斯拉夫力图通过诉诸武力并吞斯拉夫少数民族居住的克恩滕广大地区。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苏维埃共和国也被视为具有极大的威胁性。

不管有这些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巨大困难，仍成立了一个能履行权利和义务的相当强大的走议会道路政府。^④经过1919年2月16日举行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人以72个议席成为最大的党，它同获得69个议席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共同组成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卡尔·伦纳*为首的联合政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以此证明，它像对之怀有感激之情的德国同志那样不想推行革命政策，而是推行改良主义政策。不过，他们曾是比较坚定的、起初比较有成就的改良主义者。这一方面表现在社民党人、负责社会行政管理事务的国务秘书费迪南德·汉努施所实行的社会改良，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休假制度、实施失业工人保险和企业委员会法，另一方

* 卡尔·伦纳（1870—1950年），奥地利社民党人，曾先后任奥地利国务总理、国民议会主席，战后任联邦总理、总统。——译者注

面表现在由社民党人尤利乌斯·多伊奇所领导和执掌的“国民军”建设。这一坚定的改良主义政策虽然在奥地利社民党人队伍里不是都得到公认的，但它并未像在德国那样导致党的分裂。正当工人士兵苏维埃被奥地利社民党逐步一体化和解散时，1918年11月3日成立的奥地利共产党却仍是一个多少是无足轻重的小党。反之，社民党人无法消除基督教社会党的不信任，更何况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愿、也不能放弃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例如，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模糊不清的要求。

在社民党人已于1920年被逐出政府之后，基督教社会党人在1920年10月17日大选中以79个席位获得了多数，而社民党人只达到62个席位。社民党人成为反对党，他们在第一届奥地利共和国的整个期间没有再离开反对党地位。为了应付灾难性的经济状况（这种状况在1920—1921年冬季还导致奥地利粮食情况极为困难），基督教社会党的联邦总理伊·克纳茨·赛佩尔在1923年10月间请求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奥地利提供贷款。但奥地利对此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在日内瓦协定里，奥地利保证在20年期间不得放弃自己的独立，在国内保持安宁和秩序，并且在两年内达到国家预算平衡。后者不经过大批解雇公职人员是不可能办到的。在总数27万国家公职人员中被解雇了10万人。日内瓦协定的这些条款在人民内部激起了愤怒浪潮，社会因素同民族因素交织于其中，因为正是国际监督和再次禁止合并遭到了许多奥地利人的切齿痛恨。1921年春天在蒂罗尔和萨尔茨堡举行的非正式公民投票中，拥护同德国合并的几乎达到百

分之百。由社会和民族方面产生的对日内瓦协定及其后果的这种激情被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者利用了，它日益抹去了那种完全微不足道的小党性质。

如上所述，“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从1903年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党”产生出来的。^④它在1911年国会选举中获得2万6千多张选票和3个席位。实际上占大多数德意志工人参加的这个党的重点是在苏台德区。它除社会目标外还有民族目标，尤其是反捷和反犹目标。虽然该党议员在国会内参加社民党议会党团，但德意志工人党由于社会和民族要求相结合更多地归入“早期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集团，不属于完全遵循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舍纳勒尔的“泛德意志”协会，这个协会又可与德意志帝国的反议会制的群众运动（泛德意志协会、东部边界协会、海军协会等）和“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相比拟。

当舍纳勒尔泛德意志协会在由各派组成的大德意志人民党（该党1919年2月16日大选中获得26个席位，但在1923年10月24日大选中只得10个席位）内上升时，从1918年5月以来改名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德意志工人党保持了它的独立性。但在其苏台德中心地区分出去以后，它在1919年2月16日的大选中所得票数只占百分之一。但在该党领袖瓦尔特·里尔律师竞选的维也纳的一些市区，它所得票数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四。尽管也有一些工人一直是该党的选民，但它已发展成为带有中产阶级印记的党。自1919年以来，该

^④ 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尔（1842—1921年），奥地利泛德意志民族党领导人，激进反犹主义者。——译者注

—— — — — —

党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一直保持紧密的接触，最后导致该党完全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一发展已在1923年导致这位迄今的党的领袖里尔退出该党，同“大德意志社会协会”组成一个自己的、但始终是微不足道的小集团。连他的继任者卡尔·舒尔茨也在争取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保持一定的独立地位和维系老德意志工人党的假社会主义路线的努力中失败了；这个老党和它的遵循民族主义的工会在奥匈帝国时期的德意志族工人中间拥有一定的后盾。屈从于慕尼黑的党领导的意志最后势必愈走愈远，以至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没有自己的国内领导人，而是被各纳粹党的大区领导人来领导。结果引起了党内激烈的争斗，自1931年以来，希特勒安插特奥·哈比希特任这个国家的专员，得以部分地平息了这些争斗。

尽管党内有这些争吵，但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还取得了一些选举成果。它在1930年议会选举中只获得3%的选票，但它在1932年有三分之二奥地利人参加的邦议会和地方选举中平均获得所投票数的16%。在维也纳、萨尔茨堡和其他城市，它的票数比例升至30%以上。但是，这些相对大的选举成果只是从“大德意志人民党”和后来被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大部并吞的、同样具有大德意志色彩的“农村联合会”的手中夺来的，而奥地利社民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选民却表现出有相当的抵抗力。在1933年4月奥地利议会制垮台之前进行的地方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者获得40%的选票，但他们也未能在工人阶级和倾向基督教保守派的农村居民队伍中打开突破口。德意志民族社

社会主义工人党基本上仍然仍以奥地利各城市和工业区为中心，它在这些地区除了中产阶级成员外也争取到相当多的工人。在它的武装组织里，工人比例甚至是很高的。奥地利冲锋队和少量党卫队的社会成分几乎同社会民主党的“捍卫共和联盟”没有多大区别。

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1933年1月拥有党员4万名，1934年6月增至8万7千人，1938年2月达到15万名；总的来说，这个增长速度比起德国远为缓慢，而且成效也小得多。一方面是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相当强烈的、至少暂时也有成效的抵抗，另一方面是由于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者遭到了同基督教社会党人密切结盟的卫国军—法西斯主义的角逐。

卫国军是战争结束后由过去的军官、士兵、大学生、高等知识阶层成员和农民组成的，旨在抵御来自南斯拉夫以及从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对奥地利边界和领土完整的实际的和假设的威胁。^⑤就这点而言，它同德国志愿兵团有很大相似之处。起初，它同志愿兵团，特别是埃舍里希*组织，有过紧密的联系。但是，卫国军同德国志愿兵团所不同的是，它后来随着外交形势大大和缓而自己存在的理由已消除后，仍未解散。它始终留在奥地利的各邦作为穿着制服、有时佩戴武器的部队而存在，它受到基督教社会党历届政府或多或少的公开支持并作为非正规的权力工具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内政斗争而得到了扩充。

* 特奥伯格·埃舍里希（1876—1941年），先后任巴伐利亚民团上尉，德奥自卫组织上尉和巴伐利亚护乡团领袖。——译者注

鉴于卫国军的存在和职能，社民党人也不愿把自己成立和控制的工人军解散，而是把它扩建为1932年成立的“捍卫共和联盟”。按照尤利乌斯·多伊奇和奥托·鲍威尔的计划，这个按军事观点组织起来、同时掌握1918—1919年未交出的武器的联盟应当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即如果资产阶级势力不遵守民主准则，力图剥夺奥地利社民党通过议会道路已经取得的和还想取得的政治权力的话。^⑩社民党人和基督教社会党人在大联合破裂后不仅在政治领域内互相敌视，而且也以这两个军事组织各自执掌着能够进行一场内战的政治权力手段。

奥地利无疑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这一严重威胁它的存在的形势由于一个双方肯定都不愿意、但从长远看会阻碍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创造民主协商的事件而尖锐化了。这就是1927年1月30日在布尔根兰的沙滕多夫地方爆发了社会主义者和“前线士兵”之间的争执，因为后者开枪打死了一名8岁的男孩和一名战争伤残军人。1927年7月14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审判以无罪释放凶手而结束。一场自发的、并非由社民党人组织并能阻止得了的群众性抗议示威游行以纵火烧毁法院大楼和一场有89人（大多是示威者）丧命的街头斗殴大血案而告终。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在1927年4月27日的大选中只获得73个席位，而社民党人增至71个席位，于是他们通过这一事件觉得证实了自己对“赤祸”的极度恐惧，因为根据他们的看法，这一危险是由“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社民党所代表的。

他们通过加速扩展卫国军来作出反应。这时，它已成为

一个政治群众运动，愈来愈力争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并消除对基督教社会党人的依赖关系。卫国军未来的政治路线在各个领导人中过去和现在仍有争论，他们虽然在憎恨社民党人方面是广泛一致的，但在政治和思想方向上却大有分歧。特别保守的天主教派尽力继续支持基督教社会党人，而施蒂利亚的卫国军领导人普夫里默尔呼吁同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者结成联盟，以便利用暴力取得政权。但由他在1931年9月13日发动的暴动完全失败了，因为其他卫国军领导人拒绝追随他。^⑦后来，施蒂利亚卫国军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之间的亲近进程仍在继续，最终导致这两个组织广泛融合起来。吕迪格尔·冯·施塔海姆贝格侯爵代表了第三方面，他在1930年9月当选为卫国军的全国领袖；但他未能到处行使自己的指挥权。他最坚决地主张把卫国军部队改组为一个政党，该党1930年5月18日在科尔诺伊堡“宣誓”中确认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作为内政部长参加沃古安政府的施塔海姆贝格的推动下，卫国军作为独立政党参加了1930年11月的议会选举。由于普夫里默尔的追随者抵制这次选举和卫国军部队倾向保守的天主教派的成员公开选举基督教社会党人，施塔海姆贝格只获得所投票数的6%。于是，卫国军按政党组织起来的这一翼虽然挫败了民族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在这次选举中只得到3%的选票，但是，它在通过议会道路所取得的成果是出乎意外的微小，而且掩盖了整个卫国军在数量和政治方面的实际力量。

卫国军面对日益强大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更加陷于守势。民族社会主义者以奥地利同德国合并这一不妥协要求充分利

用了经济危机爆发后也起作用的一种宣传论点。反之，卫国军对合并问题采取较为谨慎态度，因为它不愿失去坚决反对奥地利合并给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法西斯意大利和基督教社会党人的支持。基督教社会党人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这种被视为异端的种族主义思想教条抱有反感，而卫国军中一部分持有比较温和的、从宗教和社会角度出发的反犹主义的人也有同感。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和卫国军在社会组成上的差别与思想意识上的分歧是相符合的。卫国军的成员和选民大部分是中产阶级和农民。只有在施蒂利亚，卫国军成功地在一部分工人里赢得一定的支持，其所以如此，因为工人常常在这里被他们的雇主强迫加入卫国军。总的来说，卫国军成员中的工人比重估计只有10%，中产阶级占20%，根据确实很粗略的估计，农民占了70%。

虽然民族社会主义者得以牺牲卫国军而加强了自己的影响，但是，联邦总理陶尔斐斯摧毁奥地利议会制所起到的影响起初与其说对民族社会主义者有利，还不如说对卫国军有利。④ 1933年3月间，议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以后，陶尔斐斯根据《战争经济授权法》继续采取既反对社民党人、也反对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反民主措施。这表现在1933年3月8日的范围很广的集会禁令、宣布新闻检查、1933年3月30日决定解散“捍卫共和联盟”以及5月19日宣布禁止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各组织穿着制服的命令，这项命令最终在1933年6月通过完全解散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及同它结盟的施蒂利亚卫国军而得到补充。1933年9月21日，陶尔斐斯指令建立所谓“强制收容所”，其中以韦勒斯多夫的收容所特别有名

和臭名昭著。这里未经法庭审判而被关押的政敌有民族社会主义者，也有社会党人。

在社民党人面对陶尔斐斯摧毁民主制而几乎袖手旁观和无所作为后，乃于1934年2月13日爆发了在上奥地利捍卫联盟领导人里夏德·贝尔纳舍克领导下的一次起义，但起义只限于林茨和维也纳。奥地利社民党领导经过稍稍犹豫之后才宣布总罢工，但这次罢工失败了。虽然大部分铁路员工已由工会组织起来，但联邦军队仍无阻碍地被用火车运往林茨和维也纳。这次起义本身以180名士兵和约200名“捍卫共和联盟”成员的丧命而告结束。社民党和“捍卫联盟”的领导人，只要没有能逃脱的，均被逮捕了。

然后，在7月25日，爆发了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暴动，暴动只由党卫队成员来执行，而奥地利冲锋队作为对“罗姆暴动”的反应始终持消极态度。^⑥这次暴动在暗杀了联邦总理陶尔斐斯之后失败，因为等待来自德国的支持落空了，德国鉴于墨索里尼的威胁态度不愿进行干预。陶尔斐斯的继任人冯·许士尼格由此觉得已证实了他的看法，只有法西斯意大利愿意并能够保证和捍卫奥地利的独立。由陶尔斐斯追随意大利模式业已开创的方向也在内政领域里继续。为有利于被称为“祖国阵线”的统一党，还存在的政党悉被解散，卫国军的影响也逐步受到遏制。它的成员不得不同许多公职人员一样参加“祖国阵线”。然而，这个取代民主制的新体制绝不像它显现的那样强大和团结一致。这个新的统一党和它按德国模式建立的下属组织如“欢乐带来力量”、“冬季救济会”、“冲锋军团”等，如同受奥特马·施潘^⑦的等级制国家观点和法西

斯主义模式影响的协作式组合制，都是人为地从上到下建立的组织，这些组织不能掩盖这一新体制的内在弱点。

许士尼格虽然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经济危机，并在1936年6月同德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据此德国有义务结束对奥经济战并承认奥地利的独立。但是，当意大利日益接近第三帝国时，这些经济成就和希特勒的诺言就不再有任何价值了。如今，希特勒不仅支持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而且在1938年2月12日竟以公开干涉威胁许士尼格。^④1938年3月11日，许士尼格不得不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压力下中断了计划中的公民表决的准备工作并且宣布下台。3月12日早晨，德军开进了奥地利，处处受到热烈的欢呼。甚至包括在此期间也转入地下的社民党人在内的合并反对者很少表示愿意保卫奥地利独立的同时也保卫这个由陶尔斐斯建立的、并由许士尼格扩展的政权。在他们眼里，它被看作是“奥地利的”——而且由于它至少到“合并”时为止得到天主教会的强大支持被看作是“教会法西斯主义的”。

这一连字符号标记在几个方面看都是有疑问的。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政权无疑是一个独裁专政。但它未能像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专政那样依靠一种原始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祖国阵线”尽管在数量上强大，但它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因此是虚弱的组织，它是通过从上指令部分国家机器和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权利的卫国军法西斯主义的联合而产生的。对法西斯意大利（部分也有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组织 and 标记的接受或多或少地是表面的。陶尔斐斯和许士尼格两人绝不能同一位有超凡魅力的法西斯“领袖”的“理想”相称；此

外，他们也不能发展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思想，以取得大部分人民通过公民投票表示拥护。当他们把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和假社会主义的思想完全抛弃时，民族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者所“占有”。最后证明天主教会的支持很不可靠，它根本不能在奥地利人民内部取得持久的依靠。另一方面，天主教会对陶尔斐斯—许士尼格的独裁政权的暂时支持一事并不否定运用“法西斯主义”概念。说到底，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权从各自教会所得的支持也是相对长久和有利的。

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政权无疑是反民主的和独裁的，但它并不表现为法西斯主义的或者“教会法西斯主义的”专政。尽管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最后应明确指出，与此相联系的决不是依据政治上或道义上的动机所作的“估价”。不仅依据科学问题，而且由于与此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对独裁政权和法西斯政权进行区别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存在削弱法西斯专政的恐怖和趋向极权的性质并使独裁专政的反民主特征凶恶化的危险。民主抵抗和反法西斯战略的可能性和界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看来“只是”科学性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正如还将叙述的那样）也将以类似的方式在评述其他独裁专政时表现出来。

第 2 节 霍尔蒂政权和匈牙利的 箭十字党人

奥匈帝国的已独立的匈牙利部分于1920年6月4日也不

得不像德意志奥地利一样在巴黎附近的特里亚农宫内签署了一项极为苛刻的和约。^④匈牙利失去领土71%和人口63%。当然，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绝大部分人不是匈牙利人。然而，历届匈牙利政府均致力于重新解放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并使他们归属匈牙利核心国。

然而匈牙利的政治家很容易有忽视这一事实的倾向，即在“其余部分的匈牙利”也居住着少数民族。这就是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他们在结构上以农为主的匈牙利形成一个在这个国家缓慢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替补市民阶层。可是：德意志人，特别是犹太人，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被同化和马札尔化了，但他们一开始就受到歧视。早在匈牙利战后最初几届政府就把犹太人从国家行政机构全部赶走，并对犹太人大学生实行限额招生，规定犹太人大学生的比例不得超过犹太人在全部人口所占的比例（6%）。后来反犹太法案仍不断加剧。于是，匈牙利历届政府对还很虚弱的匈牙利中产阶级关于限制犹太人的经济优势的要求作出反应，因为有80%的律师、50%的医生和37%的工业家是犹太人，他们在军官团内的比重占1.6%，在产业工人中只占0.4%。此外，早在1914年前匈牙利社会内部就已存在的反犹太主义由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许多领导人具有犹太人血统而加强并激化了。

正是对这一苏维埃共和国极其残暴的反动对这一独裁政体的建设和结构产生了影响，这一政权同时在对外政策上推行改变现状的目标。在这方面，1919年3月21日由匈牙利社民

党和共产党联合宣告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起初在人民内部遇到的反抗甚微，因为由贝拉·库恩作为革命战争所进行的对匈牙利邻国的进攻主要被认为是民族解放战争并得到支持。在红军的帮助没有来到而匈牙利革命军遭到失败后，才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的对立政府，这个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特别是罗马尼亚军队的支持下（罗军甚至长驱直入布达佩斯），成功地粉碎了苏维埃共和国。接踵而来的是史无前例残暴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在这一恐怖之下丧命。

虽然在1920年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小农党作为最强大的议会党团脱颖而出，而新改组的社民党为抗议“白色恐怖”和继续取缔所有共产党组织未参加选举，然而，这也并未建立起一种议会民主制。1920年3月1日在布达佩斯被部队包围的议会上，海军上将尼古拉斯·冯·霍尔蒂被选为“摄政”，因为君主国的继续存在最初是得到一项法律的明确承认的。但是，在王位继承者查理突然发动政变的企图失败之后，他和奥地利整个王室要求恢复王位的权利于1921年11月10日被剥夺了。在作为“摄政”掌握宪法所保证的强大地位的霍尔蒂催促下，各保守派和自由派联合成为执政党，它在所有选举中获胜，并提供各自的总理人选。小农党同极其虚弱的社民党人、一个基督教小党和其他零星派别被打入反对派。由于根据1922年由拜特伦总理实施的新选举法只能有一半成年居民参加仅限于在布达佩斯和其他较大城市秘密举行的、而在农村风行的是公开的、但可操纵投票的选举，执政党就不难在这一假选举中各自获得多数票。拜特伦还取消了新闻自由，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自由派的自由权利。

对工人运动和犹太人的这一极端强硬的路线继续由持反犹观点的总理格姆伯斯及其继任人贝拉·伊姆雷迪推行着。1936年12月公布的敌视犹太人的法令就是遵循纽伦堡法这一模式的。所有犹太人，也包括参加过战争的或甚至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从此以后不得再从事种种职业。此外，还把犹太人的财产“雅利安化”。早在20年代，历届匈牙利政府同法西斯意大利紧密接触，以便实现它们改革现状的对外政策。在这以后，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反犹法同在外交上日益紧密依赖第三帝国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我们最终考虑到匈牙利的经济政策也完全受到工业主和大地主利益（迫切需要的农业改革并未进行）的影响，那么，有一些事情就为许多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霍尔蒂政权称为法西斯主义独裁专政的这一论点作了说明。尽管有这些确定无疑的民族主义、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倾向和目标，但霍尔蒂的独裁政权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因为议会制并未完全取消，而且因为它不能、也不愿依靠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匈牙利的各法西斯主义政党未能被吸收到政府中去，而且大多还受到政府激烈的反对。

早在20年代，匈牙利是欧洲各国的激进右派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的会聚点和避难地，他们中的一部分受到非官方和官方机构的支持。^⑩当然，奥地利卫国军肯定也是这样，他们如同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一样从匈牙利获得物质上的捐助。但是，匈牙利政府一开始对自己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并不持肯定态度。一个肯定例外的是1932年成立的“匈牙利民族

社会主义工人党”，因它的领导人佐尔坦·伯什泽尔门尼同格姆伯斯显然是有紧密的接触的，后者的“觉醒的匈牙利运动”受到了法西斯主义及民族社会主义模式的强大影响。伯什泽尔门尼的“匈牙利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有意显示自己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一时拥有二万党员中的许多人出身于工人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在一次政变企图失败后，该党被禁止，伯什泽尔门尼被处以长期监禁。他在战争中幸免于难，1945年后他在匈牙利共产党内部还起过作用。

所有或多或少地公开信奉德国模式的和维护强烈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大多从种族主义思想出发的反犹主义的目标的其他法西斯主义派别同样是无足轻重的了。它们在1935年的议会选举中只获得2个席位。

反之，1935年由费伦涅兹·斯扎拉西建立的“民族志愿党”参加的人却较多，该党几经易名终于根据它的标志称为“箭十字党”。（这个箭十字是代替匈牙利法西斯分子和民族社会主义者初期使用的卐字符号；匈牙利政府禁止佩戴卐字符号，因为它被视为一个外国的国家权力的标志。担任现役军官的斯扎拉西最初对格姆伯斯是同情的，他成功地把几个较小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政党联合起来。其中有佐尔坦·梅斯科的“民族社会主义农业工人和工人党”、亚历山大·费什泰蒂茨伯爵的“匈牙利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党”、菲代尔·帕尔费伯爵的“民族社会主义党”。斯扎拉西的箭十字党人同这些自我标榜为人民党或工人党的、但其成员主要出身于匈牙利小贵族、官方、军官和知识分子的派别有所不同，他们显然也能从工人阶级和小农阶层争取到追随者。

根据一些统计,1937年党员的17%是军官,13%是农民,不少于41%的是工人。事实上,箭十字党人,正如最近调查表明,在1939年5月28日的议会选举中,在主要由工人居住的布达佩斯郊区以及在全国工矿中心能够从社会民主党人和小农党手中夺得巨大的胜利。在这些选举中,箭十字党人以其18%的选票和49个席位成为仅次于执政党的第二强大的政治力量,执政党获得70%的选票和183个议席。在布达佩斯郊区,箭十字党人得到所投票数的41.7%,而执政党只有27.5%,社民党17.1% (它在整个匈牙利只得5个席位),基督教党6.9%。因此,1939年拥有25万党员的“箭十字党”是具有群众基础的,因为它能争取来自各阶层人民、特别是来自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追随者和选民。^⑧

尽管这一选举成果显著,但箭十字党人未被吸收到政府,而是受到极为严厉的迫害措施。斯扎拉西本人被判处长期徒刑,起因是,他公开表示了在匈牙利显然是伤害名誉的怀疑,即霍尔蒂的夫人有犹太人血统,于是这件事不过是阻止箭十字党人掌权的藉口。1940年,斯扎拉西在德国的压力下才被释放。

在此期间,匈牙利已更加亲近第三帝国了。^⑨这一在匈牙利也毫无争议的政策最初获得了价值。1939年,匈牙利获得部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1940年,它在欲把匈牙利更紧地捆在自己身边的德国的明确同意下也夺回了1920年割让给罗马尼亚的领土;1941年春德国人侵后通过并吞南斯拉夫领土而扩大的这些胜利促使匈牙利政府站在德国一边而参加了对苏战争。墨索里尼垮台后,霍尔蒂企图与同盟军进行和谈。

但是，德军抢在他的前面，占领了这个国家；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在并吞匈牙利同时在艾希曼领导下开始把匈牙利犹太人驱逐到奥斯威辛。

1944年10月，霍尔蒂同苏联签订了停战协议。在他垮台后，德国人把斯扎拉西安插为政府首脑。他的箭十字党人参加了灭绝匈牙利犹太人的工作并对挺进的红军进行抵抗。尽管斯扎拉西的血腥的短命统治带有一种仅仅是卖国政府的性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箭十字党是一个具有群众基础的独立的法西斯主义党，它正是在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阶层里拥有显而易见的巨大支持，它的“夺权”当然受到独裁的霍尔蒂政权千方百计的阻挠。

第3节 罗马尼亚的铁卫队

罗马尼亚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且也是受益大国，因为1858年由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侯国合并产生、在1878年才从土耳其独立而成为的王国得以把自己的领土13万9千平方公里扩大到29万5千平方公里。^④它作为小协约国成员国和法国和波兰的结盟国家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在东南欧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强大却面对着一种对这个国家的生存极有威胁性的外交形势。罗马尼亚周围的国家，除波兰外，对新的边界划定并不同意并且有一定的领土要求。首先是苏联和匈牙利，而匈牙利为其改变现状的政策找根据，指出在特兰西瓦尼亚居住着众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根据罗马尼亚

（也许是偏低很多的）统计，这些少数民族达到142万人，占总人口的7.9%。同样主要在特兰西瓦尼亚定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有75万人，占罗马尼亚国民的4.1%。这个按中央集权制建立起来的罗马尼亚国家对这些少数民族奉行强烈的民族主义政策。历届政府，特别是大部分罗马尼亚人，对犹太少数民族持特别敌视的态度。

罗马尼亚犹太人估计占总人口的5%，但恰恰在罗马尼亚本土，工商业发展薄弱部门独占鳌头。大部分未被同化的犹太工商业者在农村和小城市引起觉得受他们剥削的乡村居民的仇恨和歧视，而罗马尼亚的师生则害怕他们的犹太同事和几乎占罗马尼亚大学生一半的犹太人大学生的竞争。早在19世纪进行过几次大国抗议和干预的大屠杀的罗马尼亚反犹主义在罗马尼亚大部分居民中广为传播。它除了宗教和社会因素外，还包含民族因素，因为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把很大程度上未被同化的、受外国支持的犹太少数民族看作破坏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和社会机构的异体。早在19世纪由康斯坦丁·斯泰雷和A·C·库扎组织的推行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社会革命—民粹主义的目标的运动充分利用这种状况并在大学生和农民中获得愈来愈多的追随者。在政治思想方面甚至人员方面，斯泰雷和库扎的这些民粹主义—反犹主义组织成为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先驱。

但是，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它的目的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少数民族问题和犹太人问题，而且也能利用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和危机现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罗马尼亚是一个在许多方面落后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

依赖外国资本的国家。1930年，还有80%的人生活在农村。只有7.2%的人在工业企业部门工作，而这些企业常常是属于外国企业的。石油开采尤其如此，有90%以上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尽管历届政府尽其努力也未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工业发展的落后局面和消除罗马尼亚经济对外国（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资本的依赖性。连1921年进行的土地改革也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受到土改影响的主要是非罗马尼亚民族的大地主，而虽然只占地主的5%，却在罗马尼亚本土占有60%土地的罗马尼亚大地主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损害。无论如何，最终约有60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140万农民。当然，新产生的农庄常常太小且无足够资金，不能改用机器和化肥提高农业生产。生产大多只能满足自家需要。由于生育率过高和工业内部就业可能性不足，所以，农村人口过剩问题也不能解决。由于正是在罗马尼亚这个农业国尤其敏感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30年代，这些结构上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格外尖锐化了，这些问题导致爆发危机，并最终摧毁了反正只是虚假议会制的政体。

依据1923年宪法，罗马尼亚是一个议会制君主国。当然，这位国王充分利用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并也加以扩大。由于他随时能解散议会，所以，政府的组成实际上掌握在他手中。另外，不是选举决定政府，相反，政府决定选举的结果。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非法的选举骗局，另一方面在于宪法上确保的这一条款，即获得所投票数40%以上的政党可得到不经直接选举分配的380个席位中的50%以上，以致它通常获得的席位远远超过70%。通过这一在当时欧洲罕见的规定，议会制

成了闹剧。它导致，如国王解散议会和任命新政府，那么，每一执政党在选举中可以大获全胜，以后也会一败涂地。这样就出现各个政党在政府里轮流执政，它们的社会组成，甚至一部分纲领，都几乎没有差别。少数民族政党和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在1924年被禁止，被打入地下达20年之久）虽然在这方面是例外，但一直极其脆弱，几乎不能干预虚假的议会生活。这样，约内尔·布拉蒂亚努的自由党人被茹柳·马纽的“民族党”和米哈拉凯的“农民党”合并而成的“民族农民党”所替代，这个党后来又 被若加斯和阿韦雷斯库的“民族人民党”所排挤。自1931年以来，自由党和“民族农民党”发生了多次分裂，因此，罗马尼亚的政党体系更加混乱了。

同时，议会微弱的影响被国王又进一步削减。国王卡罗尔二世于1930年6月从流亡中回国。他是由于自己同一名身份不相称的妇女再婚而不得不逃亡的。他从1937年12月20日选举以来只任命了完全依赖于他的这样一些政府首脑，因为他们在人民中很少得到拥护。后来在1938年2月间，迄今的宪法失效，而国王的地位又进一步加强。此外，选举年龄提高到30岁，公民权利则受到限制。1938年3月30日，所有政党在一次以预期的、获得几乎100%赞成票而告终的“公民投票”之后悉被解散了。被同时代人称谓“国王专政”的这一专制王国的建立并非对自由派和左派力量攻击的反应。转入地下的共产党的活动仅限于鼓动一些地方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卡罗尔二世的国王专政非常清楚地针对科德雷亚努的法西斯主义“铁卫队”的兴起。^③

科德雷亚努生于1899年，其父是布科维纳的一名罗马尼

亚民族主义者，他在泽莱亚把他的原名齐林斯基罗马尼亚化并附加了一个别名科德雷亚努。小科德雷亚努像他父亲一样最初加入了上述“库扎的”反犹—民族主义组织，但他1926年离开了这个组织，因为他觉得这个组织的战斗力和纪律性不足。1927年，他同其他一些大学生成立了“天使长米迦勒军团”，这个军团后来被称为“铁卫队”。

给一个政治运动取天使长米迦勒这一引人注目的宗教名称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这个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反共产主义、尤其是反犹主义的目标是通过神秘而模糊的因素表现出来的，但这些因素绝不能减弱它的好斗性。正是由于接受一定的宗教标志和表现形式，这些也常常自诩为“十字军参加者”的军团成员也在农村居民中发挥一种日益扩大的吸引力。这个铁卫队的积极分子核心由大学生、青年大学教师和为数极少的工人所组成，它积极争取农民的工作推进到俄国的纳罗达尼基附近。反之，它的斗争方法看来是从无政府主义分子那里学来的。事实上，许多敢于阻拦军团成员的人已在“铁卫队”的恐怖之下丧生。看来这些几乎不受法律惩办的暴力行动主要是冒犯了许多罗马尼亚人，从而引起他们的反感。不管怎样，“铁卫队”的成员大幅度地增加，它如今已在国内各地进行宣传活劫并大搞政治谋杀。

在一些较小的激进右翼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派别加入“铁卫队”后，它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5个席位并在1937年12月的选举中获得所投票数的16%以及总共390个议席中的66个席位。这一成就至少是国王卡罗尔二世此后遵循独裁专政路线的理由之一。这表现在上述把选举年龄提高到30岁，因为

军团成员如同一切初期阶段的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党员那样非常年轻，而且主要表现在取缔“铁卫队”上，在全面解散政党之前早就宣告了这一禁令。科德雷亚努同其他“铁卫队”领导人在1918年4月19日被捕，并判处10年强迫劳动。11月30日，他在“逃跑中被击毙”。但这种政治谋杀并不能制止这时由霍里亚·西玛领导的“铁卫队”继续兴起。这时，它得到了德、意法西斯政权的支持，而同这些政权的紧密联系早就由科德雷亚努建立了。最初，这个被禁止的、但绝未被摧垮的“铁卫队”从它信奉这一科德雷亚努也曾多次公开强调的法西斯主义模式中得到了好处。其原因在于外交形势日益不利于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法国结盟的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不仅容忍并吞苏台德区，而且对受到德国和苏联侵略的波兰也不予援助，尽管它对此负有条约义务。^④ 1940年5月27日，同德国签订了所谓“石油协定”，规定罗马尼亚有义务将全部国营石油生产提供德国。可是，罗马尼亚尽管对德国这样明显的亲近，也未能阻挡苏联依据德苏协议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国王卡罗尔二世屈从于1940年8月30日“第二次维也纳仲裁法庭的裁决”，即希特勒的决定，据此不得不将罗马尼亚通过巴黎和约所取得的特兰西瓦尼亚大片土地又交还给匈牙利，此后在人民内部就爆发了一场愤怒浪潮，导致卡罗尔二世把王位交给他的儿子而逃走了。

由此，国王专政时期也就结束了，因为这个国家从这时起不再由新的国王米哈伊，而是由伊翁·安东内斯库将军统治。这位将军同“铁卫队”结盟，建立了一个恐怖统治，它造成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犹太人死亡。1941年1月中旬，安东

内斯库和霍里亚·西玛为首的军团成员之间发生了公开的权力之争，军团成员的暴动遭到血腥镇压。霍里亚·西玛和“铁卫队”的其他领导人徒然地指望希特勒的支持，希特勒出于强权政治的原因决定支持安东内斯库，因为他把安东内斯库看作比激进的军团成员更为可靠的盟友。霍里亚·西玛同“铁卫队”其他领导人在保安处的斡旋下逃到了德国，但他们在那里被拘留了起来。于是，“铁卫队”的命运就注定了。它留在国内的成员受到了迫害和逮捕。这位使罗马尼亚站在德国一边卷入这场损失严重的对苏之战的安东内斯库在1944年8月26日下台了。在他下台后，霍里亚·西玛才从布痕瓦尔特集中营被释放出来，并由希特勒安排为罗马尼亚流亡政府首脑。这一决定已不再有政治意义了，因为罗马尼亚不久就被红军占领。

虽然“铁卫军”在这样一个非常落后的、产业工人很少、左派几乎不起作用的农业国产生，但是由于它在政治和思想上遵循法西斯主义模式并由于它树立了民族主义、极端反犹太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具有激进的灭绝意志的社会革命目标而属于法西斯主义运动这一范畴。在它拥有群众基础以后，它在1938年被卡罗尔二世的国王专政所取缔和迫害，后来才由实行独裁统治的安东内斯库吸收加入政府，最终又被他粉碎。但是，“铁卫队”同大多数其他法西斯主义运动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在议会制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因为这种议会制在罗马尼亚还根本没有得到完善。以这个国家多方面的落后性也可说明“铁卫军”的成员，除了来自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军官以及一些工人外，主要来自农村下层。这一点和这种显得特

别革命的空想—反动的纲领赋予它一种特殊的色彩。但是，“铁卫队”在这方面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而它在另一方面却表现了同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4节 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

奥匈帝国崩溃后，克罗地亚从外国统治下获得了解放，但是它被违背绝大多数居民的意志并入1918年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⑥克罗地亚人像斯洛文尼亚人一样信奉天主教，但他们并不是唯一感到自己受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压迫的人，由于民族和宗教对立而分裂的联邦有1200万居民，其中将近一半是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的内哥罗和马其顿的130万穆斯林也并不感到自己是“南部斯拉夫”人。原来的少数民族，50万德意志人、47万匈牙利人、44万阿尔巴尼亚人和23万罗马尼亚人，更不把南斯拉夫看作是“他们的”国家。但是，南斯拉夫政府通过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边界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少数民族的民族统一的要求。直到德国武装部队占领这个国家之前多数德意志人是奉公守法的。

主要问题是斯洛文尼亚人，首先是克罗地亚人，同这个被许多人视为大塞尔维亚并与之作斗争的联邦的和解。事实上，1920年11月28日选举中获得多数票的塞尔维亚各政党在一年以后通过了一项以法国为榜样而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宪法；它对各个民族并未赋予自治权和区域特权。共产党1920

年以58个席位成为第三大党，但后来被取缔。除它以外，由于所有其他政党并不由社会的或一般世界观的因素、而是由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因素决定的，所以，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呈根本没有一支政治力量能够并准备克服这些分离主义倾向。

1929年被取消并被亚历山大国王专政所代替的南斯拉夫议会制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彻底失败，但它在解决同样具有威胁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方面却取得了一些成就。这表现在国家帮助和由外国资本投资而推进的工业建设，但通过这一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工业化的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南部主要农业地区之间的差距未能得到消除。经过长期准备工作而在1922年5月20日公布的农业改革的成就也是有限的。改革规定，所有（按地区不同情况）超过100至500公顷的农场应予没收并给予补偿。把总共约250万公顷土地分为5公顷大小的地块分配给农民和新的移民。但是在1928年土改基本完成之后，总还有三分之一的农业企业的土地没有2公顷大，而另一个三分之一的农庄拥有的土地却超过最高限额5公顷。这些弱小企业是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持续上升的。反之，一些在自愿基础上成立的合作社生产比较经济。总的来说，经过土改，农村人口过剩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更何况发展中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很低。

1928年6月20日“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人斯特芬·拉迪奇同该党3名其他议员一起在贝尔格莱德议会上被枪杀之后，南斯拉夫议会制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农民党是由绝大多数克罗地亚人选举出来的，而且在议会里居于塞尔维亚民主党人之

后成为第二大的议会党团。在拉迪奇1923年夏徒然地企图争取英国和奥地利对其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计划的支持以后，“克罗地亚农民党”在他领导下于1924年6月参加了共产党操纵的农民国际。在其领导人被暗杀后，“克罗地亚农民党”更不愿意放弃它的分离主义的努力，尽管国王亚历山大在摧毁议会制后企图给予1929年10月3日才正式在南斯拉夫改名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以一种联邦制结构。通过建立新的行政区（州）应将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受民族和宗教因素影响的地方划予以铲除。1929年宣布禁止一切以民族和宗教为宗旨的政党（该禁令在1931年更加严厉）也成为一种类似的、旨在和解和团结的目标的基础。

但是，这一协调民族对抗的政策不仅遭到转入地下的政党的批评，而且首先也遭到1929年1月7日由阿格拉姆* 的律师安泰·巴维利奇所成立的“乌斯塔莎”（词义，起义者，反抗者）顽强地全力反抗。^②起先自称“Domobran”（相当于卫国军）的乌斯塔莎宣称为克罗地亚的独立进行无限制的斗争，在斗争中主要使用恐怖暴力和暴动方法。乌斯塔莎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接受匈牙利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在这两国内设有“乌斯塔莎”训练营，在这里训练其成员进行暴力恐怖活动。1932年8月，“乌斯塔莎”的一次暴动被军警镇压，而其恐怖分子在几次暗杀活动失败后于1934年10月9日在马赛把国王亚历山大杀死。这一谋杀虽然没有导致巴维利奇预期在克罗地亚举行的暴动，但却在政治上引起南斯拉夫国王专政

* 地名，即现在的萨格勒布。——译者注

的削弱，如今这一专政处于一个内部分崩离析的摄政参议统治之下，因为王位继承人尚未成年。至少新的国家领导还能够抵制“乌斯塔莎”的政治影响；“乌斯塔莎”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愈来愈以法西斯意大利为榜样，决不放弃他们使用暴力和恐怖方式为克罗地亚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但两者处在一种看来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意大利坚持其对属于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的领土要求。但是，这一点也受到“克罗地亚农民党”严正的驳斥。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利用民族主义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和以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方向的“乌斯塔莎”之间的这些矛盾，试图以更多的成就，通过答应给克罗地亚以广泛的自治权，而使农民党改变它的起阻碍作用的路线。

1936年9月26日颁布了免除农民债务法以后，世界经济危机对75%为农业地区的南斯拉夫的影响也得以消除。对此，德国起了重要作用，正在危机期间它乐意以部分高于世界的价格购买南斯拉夫的农产品。在签订了几个贸易协定后，德国1935年已在南斯拉夫进口中占16.2%，在出口中占18.7%。意大利在南斯拉夫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达到约10%时，英国和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就日益下降了。在“合并”奥地利和起先（1938年）部分地、后来全部并吞捷克斯洛伐克后，南斯拉夫同德国的对外贸易达到50%以上。德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政治合作随着经济合作而日益紧密，而英国和法国显然既无能力、又不愿意支持南斯拉夫反对意大利日益加强的外交压力。因此，南斯拉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巩固完全是在同第三帝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紧密合作的前提下

达到的。虽然南斯拉夫作为小协约国的成员国实际上同法国是结盟的，但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却持中立态度。1941年3月，南斯拉夫政府竟决定加入三国条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可是，这一决定在国家机关和军人集团中遭到激烈的批评，从而导致1941年3月27日的军事政变并推翻了政府。民族社会主义德国以此为藉口，于4月6日入侵南斯拉夫。这场战争以完全占领这个国家告终，参加这一占领的，除保加利亚外，还有意大利，它在这时并吞了长期想要取得的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由于“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马切克不愿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勾结，安泰·巴维利奇接受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委任在这个新成立的虚假“独立的克罗地亚”上了台。^④

“乌斯塔莎”借助其穿着制服和武装起来的队伍建立了几乎完整的恐怖政权，它以残暴和狂热的坚定性除对犹太人和（当然为数不多）共产党人外首先对在克罗地亚的200万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进行迫害。这个已成为唯一的国家政党的“乌斯塔莎”是由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少量的）工人组成的。它得到罗马一天主教教会方面的巨大而持续的支持，该教会对大屠杀和效法中世纪十字军对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进行集体洗礼却毫无反对举动。

“乌斯塔莎”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纯克罗地亚的，而且过去从未有过这一形式的民族国家。但是，“乌斯塔莎”的领导人认为自己“只”不过想要恢复在土耳其、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外族统治之前存在的状况。

“乌斯塔莎”由于这种空想的反动目标和自己激进和毫不

妥协的灭绝意志表现了同德国“激进法西斯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同时在许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反资本主义成分，而且它的纲领的反共成分显得很弱。“乌斯塔莎”的产生、社会结构和作用并不是由阶级斗争、而是首先由民族斗争决定的。在这一方面，“乌斯塔莎”同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正统法西斯主义”运动有较大的区别，另一方面，它正是由于其最初打上民族—宗教印记的目标却同罗马尼亚的“铁卫队”所表现的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克罗地亚“乌斯塔莎”国家的产生和结构一方面基于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另一方面基于使用无限度的恐怖。它的下场随着法西斯大国的崩溃就注定了，并且以恐怖手段结束了。在意大利背离之后，克罗地亚虽然收复了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但它站在德国占领军一边不得不为此而同铁托的游击队进行一场损失极为严重的斗争。克罗地亚部队随同德国武装部队撤退后，终于在克恩滕州向英军投降。巴维利奇得以安全逃到阿根廷，而英军俘虏的15万克罗地亚士兵被交给了铁托，其中4万人立即被枪决。“乌斯塔莎”的其他成员几千人后来或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在监狱和特种营里长期监禁。“乌斯塔莎”就被以这种方式摧毁和消灭了。尽管如此，一些以前的成员和新的追随者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南斯拉夫的斗争。在南斯拉夫本国，特别在国外，直到今天常常发生恐怖谋杀事件，对此，南斯拉夫秘密警察一再使用部分非法的恐怖方法予以回报。

第5节 长枪党和西班牙佛朗西斯主义

昔日的世界强国西班牙在20世纪初已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同东南欧的落后国家表现出很大的相似之处。西班牙在19世纪就把它的全部殖民帝国丧失殆尽。①只有在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才实现了工业化。将近70%的人口从事农业。在北方各省、巴斯克地区、阿斯图里亚斯和加泰罗尼亚的农业地区以及在纳瓦拉、巴伦西亚和穆尔西亚主要以中、小农经济为主，而在新老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埃什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几乎所有农业可耕地属于教会和少数几个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地主，但他们大多住在城市，他们的庄园由极为贫困的和几乎处于无权地位的雇工在经营。西班牙农业生产方式的来说很低。农村人口过剩在许多地区成为社会大问题，而且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山、巴斯克地区的钢铁业和加泰罗尼亚的纺织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大得足以接受这么多的过剩人口（西班牙1900年有1800万人，而1940年增加到2600万人②）。

19世纪这个国家在扭转西班牙的经济落后局面方面做的很少。基本设施（街道、铁路、运河等等）的扩建在很大程度上被耽误了。此外，马德里政府奉行一种只对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地主有利的自由贸易政策，而巴斯克地区的钢铁工业和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工业基本上要依赖保护关税。西班牙面向出口的农业地区和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工业化的各省之间的经济矛盾又由于人种差别而更加尖锐化了，这

种差别导致巴斯克人和加泰隆人日益坚持分离主义目标。也由于西班牙的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向两极分化方向发展，所以，它对解决社会和民族问题表现得无能为力。

19世纪内政纷争的特点是自由“进步派”力图使他们早在1812年宣布、但很快又被复辟王朝取消的卡迪斯自由派宪法生效。^④对此，“进步派”一方面遭到对温和的立宪帝制感到满意的保守“温和派”的抵制，另一方面也遭到极端反动的卡尔洛斯派原则性的反对；卡尔洛斯派致力于恢复源于中世纪的旧的等级和宗教特权（所谓司法裁判权）和重新设置宗教法庭。在三次因王朝争执问题为其外因而进行的损失异常惨重的内战（1834—1839年、1847—1849年和1872—1876年）中，卡尔洛斯派的政治要求遭到拒绝。尽管如此，他们还在20世纪拥有自己的党派，“王室正统者团体”，但它只限制在纳瓦拉省。20年代，这个党拥有一支以意大利为榜样的、由法西斯主义军官训练的民兵，被称为“义勇军”。西班牙卡尔洛斯分子由于他们极端反动的目标在19世纪的欧洲政党体系中享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地位。

西班牙军队在内政领域承担的角色和职能也是相当独特的。^⑤通过议会道路更迭政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各执政党在选举时大多弄虚作假；因此，站在反对派一边的政治力量，即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试图借助军队上台。然而，一些将军却并不满足于充当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帮凶这一角色，而是自己力图通过这种军事政变来夺取政权。经常性的政变使有计划地进行政府工作几乎成为不可能，为了避免政变，自由党领袖萨加斯塔和保守党领袖卡诺瓦斯·卡斯蒂略

在19世纪70年代达成谅解，由他们定期轮流执政。但是，这一在议会史上罕有的奇特措施也不能有助于减弱军队在内政方面的影响。因为军队被用来平息许多的、但大多是局限于地区性的农民暴动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西班牙军队总共有兵力20万至25万人，拥有2万名军官，其装备和组织是能在内政方面发挥作用的。

无政府主义者和1910年成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全国工会联合会”的相当强大的地位乃是西班牙政党体系的另一个特点。^⑤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安达卢西亚农业工人和加泰罗尼亚的工业无产阶级中拥有强大的追随者，他们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社会党人，后者在1877年成立的党（“社会民主党”）及其工会（“总工会”）长期以来由“西班牙的倍倍尔”帕布洛·伊格莱西亚斯领导。1922年3月间成立的“西班牙共产党”是由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两个派别融合产生的，直到内战仍相当弱小。1934年，一些共产党反对派为抗议西班牙共产党严格的亲苏路线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党”。这个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和其他时期受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共产党反对派支持的党受到过西班牙共产党人和苏联秘密警察的残酷迫害，因为他们认为它属于托洛茨基派。

但整个左派在数量上的强大同它在政治上所起的实际影响起初却成反比例，因为它不能团结一致采取共同行动，也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参加选举。尽管如此，在西班牙也出现了“红色的”，即“布尔什维克的”危险的神话。害怕导致西班牙政治生活进一步两极分化的外部原因是1917年夏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爆发的社会骚乱。企业主的利

润由于战争所带来的需求大大增长，而生活费用却大幅度提高了，因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联合会号召举行总罢工，这次罢工遭到血腥镇压。1919年夏在安达卢西亚爆发了同样由上述工会联合会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农业工人罢工运动；这次如同先前许多次爆发的、但一直是规模狭窄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动一样破坏和烧毁了许多庄园房舍和教堂。但是，专门执行这一任务的宪兵队很快也把这次暴动镇压下去了。然而，这些事件表明，震撼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风潮也席卷了未受战争损害的西班牙。在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组织日益持续地、强烈地要求取得遭到马德里中央政府拒绝的自治特权，通过这一事实，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在这一危机情况下，1923年9月13日爆发了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发动的政变，他独裁统治这个国家达7年之久，但未触动这个君主政体。共产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联合会遭到取缔，而社会党和它的工会依然保留了下来。普里莫·德里维拉力图通过国家支持和借助外国投资来推进工业化进程。像扩充交通路线、建立水库和整治河流等基本建设措施直接地、间接地促进了经济情况的好转。然而紧迫需要的农业改革和加泰隆人的自治愿望都未能实现。总的来看，普里莫·德里维拉政权乃是一种革新独裁，许多同时代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却把它误划为“法西斯主义的”。普里莫·德里维拉由于把军队总数从25万人裁减到20万人并把军官团削减10%因而受到势力一向很大的将领们的激烈攻击，从而在1930年1月26日下台。^⑦

这时在资产阶级一保守派阵营充满了混乱和意见分歧，

社会党人、共和党人和左倾的加泰隆人充分利用了这一情况，于1930年8月团结在所谓圣塞瓦斯蒂安协定中采取联合行动。他们在1931年4月乡镇选举中大胜右派和保皇派的力量，连军官团的多数人也承认这一胜利。紧接着国王阿方索十三世1931年4月13日决定放弃王位，逃到了国外。西班牙成为共和国。1931年6月28日的选举中，社会党人以117个席位成为最大的党。他们同获得80个席位的左翼共和党和宗教党派代表共同组织了以社会党人曼诺埃尔·阿萨纳为首政府。该政府立即开始实现广泛的改革计划。实施民事婚姻以及采取进一步的反教权主义措施，同时进行社会改良，首先造福于产业工人。反之，1932年9月通过的、规定继续无偿地剥夺大庄园主财产的农业法执行得很缓慢，而且不彻底。这就引起无产的农业工人的不满，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联合会号召他们举行罢工和起义。但这些暴力行动如同桑胡尔霍将军的军事政变在1932年8月18日24小时内崩溃一样受到了政府的反对。所以根本谈不上无政府主义状态，更谈不上一场临近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革命。

尽管如此，曾激烈批评过社会改革和1932年9月赋予加泰隆人的自治法规的西班牙右派感到极度不安。保守派政客霍塞·马里亚·希尔·罗布莱斯成功地把各右翼政党在他领导下团结在“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之内。由此就形成内政对抗的进一步尖锐化。右派在希尔·罗布莱斯领导下加强他们极端民族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鼓动宣传，并也不惜以赞美之词拥护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而左派和左翼自由党人则以一种相似的激烈性抵抗他们所称呼的罗布莱斯的“法西斯”

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毫无疑问,这样的定性是没有道理的,但却使西班牙原来已经处于对抗状态中的内政气氛更加激化,这被在这一主要由政治因素(并非由经济因素)引发的危机局势中产生的真正法西斯主义政党利用了。^②

这是指1931年2月由哲学系大学生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在马德里成立的法西斯主义党,自称是“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它的成员除大学生、军官和公务员外也有一些来自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工人。事实上,拉莫斯企图把民族主义目标同工团主义目标相结合。此外,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接受了“直接行动”、即个人恐怖的方法。这种方式的政治斗争很快造成头几批人的死亡。1931年6月由法学家奥内西莫·雷东多·奥尔特加在巴利阿多里德成立的第二个法西斯主义党具有另一种不如说是天主教—传统主义的特点。奥尔特加的“新老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诉讼委员会”于1931年10月同莱德斯马·拉莫斯的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联合在一起。这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分离主义者而使双方都作出牺牲的斗争持续地进行着。尽管如此,这个党也未能走出一个政治上无关紧要的小派别的默默无闻的圈子。

10月29日由独裁者之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创建的“西班牙长枪党”这第三个法西斯主义派别也是如此。由于该党领袖作为保皇党议员坐在议会里而且发表过一些政治哲学文章,已有点名气,所以该党在公众中已引起较大的重视。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成功地于1934年2月13日把这三个法西斯主义小党派联合成为“西班牙传统派长枪党和民族工团主义进攻会”。这个长枪党(大多数人

都这样称它)建立了一支穿着制服的、部分武装起来的党的民兵,并且在思想上也以法西斯意大利为榜样。这也表现在它的民族主义目标上,但这些目标更多地集中在内政方面,集中在反对巴斯克人和加泰隆人的分离主义倾向上;此外也表现在“左倾”纲领条款:如要求限制外国经济势力、建立经济企业联合组织、要求剥夺大企业主以及大地主根本没有或者并不充分利用的土地等等。但最后这一条对宣布剥夺整个大地主财产的拉莫斯来说不够激进。他就退出了这个党。尽管工团主义的要求已被削弱,原来在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中存在的反教权主义要求几乎被全部勾销,但属于长枪党的成员,除了知识分子、大学生、军官和公务员外,一直还有一些工人。总的来看,长枪党保留了一种宗派特点。②

因此,长枪党也不会被接纳到右派的选举联盟之内,右派在1933年11月19日的选举中以217个席位取得巨大胜利,因为左派政党只取得93个席位,中间派政党取得163个席位。长枪党连一个席位也没有得到。但它从西班牙政治生活进一步的两极分化中得到了好处。罢工和暴动接踵而至,如1934年在阿斯图里亚斯,经过长时间的血腥斗争之后被宪兵队和军队平息下去了。右派政府由于内部发生争吵而分崩离析之后,结成人民阵线的左派和自由派的政党得以在1936年2月16日的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右派只获得132个席位,中间派只获得32个席位,而人民阵线却获得277个席位。最强大的议会党团是有90名议员的社会党人,他们也提名阿萨尼亚为总理。共产党人有16名议员进入议会。

促成“人民阵线”的这次选举胜利的,首先是无政府主义

者决定放弃他们迄今所实施的抵制选举活动，以支持“人民阵线”进行其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但是，实际上能够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唯一派别是再次未得一个席位的长枪党。右派对所谓近在眼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那种惊惶失措的恐惧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不仅是最终当选为西班牙共和国总统的阿萨尼亚，而且总理卡萨雷斯·基罗加和常常被称为“西班牙的列宁”的社会部长拉尔戈·卡巴列罗都对社会改革有兴趣，而对革命却毫无兴趣。由于相互不信任，始终带有内政性质的危机进一步被煽动起来，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对西班牙的影响是相对微弱的。这种危机气氛首先被长枪党党徒利用了，他们以人民阵线追随者的各种罢工和暴力行动作为藉口，使用个人恐怖的方法来反对政府及其代表人物。法西斯主义分子谋杀了几位共和党政治家和警察官员之后，警察在1936年7月13日杀害了君主主义者的领导成员卡尔博·索特洛。一些将军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领导下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他们早已长期策划的，精心准备的军事政变。^⑨

这次军事政变是在1936年7月18日开始的，但并不到处都成功。共和国政府对全国大部地区得以控制并重新夺回，它也得到一些忠于共和国的军官，特别是空军的支持。对于发动政变的军人来说，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佛朗哥被人民阵线政府调驻加那利群岛。虽然他成功地到达了西班牙属摩洛哥，把驻守那里的摩洛哥部队和西班牙外籍军团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但是他不能把这些部队运往大陆，因为他并不掌握足够的飞机和船只。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请求法西斯意大利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政府给他输送飞机和其他装备物

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均表同意，最初派出飞机和运去武器，最终由于叛军的军事情况一直处于困境而又派出军队。由此，佛朗哥的军事政变成为一场由双方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标志下进行的内战。

几乎所有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奔赴西班牙，及保卫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共和国政府反对法西斯。值得称赞的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热情，他们在国际纵队里不怕牺牲，最初在反对佛朗哥的部队、反对意大利的师团以及德国“秃鹰军团”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但是，过去和现在难以解决的是这个论点，即西班牙内战何以成为“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之间全球性的争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向西班牙派出他们的陆、空军部队的主要目的绝不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从外部使这个国家“法西斯化”。军事方面的动机（考验新空军）、经济方面的动机（保障西班牙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以及一般的政治动机（削弱英法民主国家）比起在思想方面的动机重要得多。这首先指第三帝国的政策。德国大使福佩尔来自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企图在政治和组织方面加强长枪党，但未能如愿；当佛朗哥坚决反对福佩尔在内政—思想领域里的干预之后，这位大使就被一名“正规的”飞黄腾达的外交官接替了，这决不是偶然的。正是德国对西班牙的政策原来是根据军事、经济和政治目标而极少根据党派政治思想目标制定的；当然这一论断决非为德国政策辩护。秃鹰军团实施这场空战的方式方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这里只要回溯一下轰炸格尔尼卡就足够了，因为这次轰炸只是使平民百姓造成巨大伤亡。尽管德国对西班牙内战

的干涉(西方国家奉行日益明显的绥靖政策予以姑息)如此铤而走险和违反国际法,但是认为意大利和德国在西班牙内战中进行的干涉旨在把法西斯主义向西班牙输出的论断却又不恰当的。

西班牙内战成为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之间全球性争端的这一论点从另一个理由看也还有疑问的。军事政变之初,长枪党自然是相对无足轻重的小党。几乎共和党当局的整个领导集团同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一起被捕,不久被枪决。尽管如此,长枪党面对所有其他右翼政党拥有一种优势。它有一支党的民兵,立即加入了佛朗哥的政变部队。这支部队虽然只有4千人,但是,事实表明这场完全作为军事政变而策划的叛乱发展成为只有使用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才能取得胜利的內战以后,佛朗哥就委托党的民兵征募其他志愿士兵。长枪党充分利用这一意外的时机,扩充它的成员和追随者。在几个月之内,它就成为一支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力量。尽管没有具体数字,但可以肯定无疑的是,长枪党在內战爆发后成功地赢得了群众基础。所有保守党和保皇党,除了纳瓦拉省的卡尔洛斯派以外(它把自己的民兵,“义勇军”同样置于佛朗哥部队的统率之下),都已变得无关紧要的了,而长枪党却已发展成为佛朗哥在这场由共和国政府所号召的人民战争中赖以协同作战的政治力量了。^④

因此,同“义勇军”联合的佛朗哥的“西班牙传统派长枪党和民族工团主义进攻会”于1937年4月19日宣布为唯一的国家政党。已由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采用的党徽是从昔日西班牙天主教国王所用图徽中沿用的轭与捆扎的箭,这个党

徽成了新的国徽。许多文职人员和军官不得不“志愿”加入这个新的国家党由叛军总司令佛朗哥担任主席。这事遭到了许多自称“camisas viejas”（旧衫之意）的老长枪党分子的严厉批评。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继任者埃迪利亚成为长枪党“老战士”的这一抗议的代言人。因此他被佛朗哥撤职判以死刑。但是：由于上述德国大使福佩尔的干涉，这一判决并未实施。这些事情的发展过程表明，佛朗哥在军队和要求严厉驳斥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的反教权主义的教会支持下得以把长枪党在很大程度上一体化了。^⑥

就这点而言，西班牙的发展过程同德国迥然不同，那里的国家机器、教会和军队已基本上被希特勒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一体化了。但是，这些机构的差异并未被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所认识。长枪党伙同佛朗哥的部队对共产党、社会党和民主党派以及巴斯克人和加泰隆人少数民族政党成员采取了战斗行动，在此期间和以后所进行残酷无情的恐怖讨伐似乎证实了佛朗哥政权是法西斯专政这一看法。事实上，在当时有约250万居民的西班牙，内战所造成总共50万死亡者中的许多人是死于长枪党分子的反革命恐怖之中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革命的恐怖也造成了许多人死亡。不仅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员，而且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党员同样受到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和苏联秘密警察的无情迫害。但是，要确定佛朗哥西班牙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不仅要说明初期特别凶残并严厉采用恐怖活动，而且还要说明这个政权的内部结构。

当所有其他政党遭到取缔时，长枪党依然是正式的国家

党，它由被称为领袖的佛朗哥领导。而且他仍然是西班牙武装部队的统帅。他作为国家元首不仅采用源于法西斯模式的协作组合制，而且也在1942年6月17日宣布，西班牙国会“议员”不再由选举产生，而应由他和企业联合组织、乡镇、商会和科学机构任命。与完全排除国会同步进行的是取消资产阶级的特权和实行一种初期极为僵硬的新闻检查。政权以毫不容情的严厉态度反对社会主义力量和民主力量以及反对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企图。不顾老长枪党分子的批评，原来在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中存在的反资本主义纲领条款日益受到限制，没有反犹太主义的目标。不过受宗教法庭的驱逐之后，只有为数很少的犹太人又回到西班牙定居。尽管佛朗哥在德国战败法国后完全能够实现长枪党本来表达得非常克制的民族主义的和改变现状的要求，但他并未这样做。西班牙在1939年4月加入了反共公约，但佛朗哥在1940年拒绝了在昂代会晤中由希特勒最后通牒式地提出站在德国一边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要求。派出一个按长枪党制服颜色称为“蓝色师”的举动倒不如说具有一种象征性质。对德国战争经济至为重要的却是提供各种原料。德国的飞机工业依赖西班牙的钨矿。同样重要的是对德国的石油输出，这些石油产品是西班牙从美国进口的。

虽然佛朗哥西班牙没有被盟军占领，但它在1945年后被东方和西方一致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而且一直遭到抵制。1946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要求其成员国不承认佛朗哥政权，并撤回它们的大使。但后来在冷战时期又开始接近。1950年，联合国撤销了抵制声明。美国同西班牙签订了军事条约。

1953年，同梵蒂冈进行的政教条约的谈判顺利结束。1952年，西班牙被接纳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5年被接纳到联合国。在这些促使西班牙加入“自由世界”反共阵线的军事和政治协议之后，从50年代中期以来，同西方的经济合作日益紧密起来。这种合作大大促进了西班牙的兴盛，它在这时不仅消除了内战期间所造成的损失，而且还推进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由于国家干预这一进程格外得到促进。

随着经济上的繁荣，在内政领域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边界开放了，新闻检查放宽了。这种情况被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反对派以及一些分离主义派别所利用了。但是，在这一政权有史无前例的暴行反对巴斯克非法组织(ETA)*的恐怖暗杀时，它对地下活动中成立的新工会却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更何况这些反对派力量日益增多地也受到部分教会的支持。但是，这种当然是相对的迁就态度——非法的工人运动的许多成员和干部一直受到迫害，而且被判处很长时间的监禁——主要出于这一看法，过分的残暴和恐怖的措施将会损害经济繁荣，因为从这种繁荣中得到好处的除了工业界人士外也有本国的政界上层人士。佛朗哥政权所赖以支持的教会似乎也表示内政方针要有一定的适度，而军事领导集团对采取最坚决的残暴手段反对神职人员所支持的反对派行动持犹豫不决的态度。

这种相对克制的内政路线受到老长枪党分子的激烈批评，他们不得不看着，这个一般被称为“运动”的、有几百万

* ETA是西班牙语Euzkadi ta Askatasuna的缩写，意为自由中的巴斯克地区，系西班牙当时的非法组织。——译者注

人的国家党逐步丧失影响，而被他们一直用疑虑眼光注视的军队和教会的势力却未受损害。佛朗哥在1975年11月20日死后表明，这个数量上强大的、由成分非常复杂而且并不只是土生土长的法西斯主义分子所组成的佛朗西斯主义国家党实际上是多么脆弱。王子胡安·卡罗斯在佛朗哥死后两天被任命为国王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他允许各政党重新存在，推行逐步民主化政策，未受到前国家党的阻挠。1977年4月初，胡安·卡罗斯解散了这个“运动”，没有受到这个昔日貌似强大的国家党所拥有几百万党员和领导的严厉抵抗。

在此期间，虽然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这位政客得以把各种激进右翼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势力重新联合起来，但是他的“人民联盟”迄今不善于克服内部冲突并形成一個具有群众基础的新法西斯主义党的核心。另一方面，近年来西班牙内政方面跃进式的令人惊奇的发展表明，在这一方面作出任何一种预测都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连长枪党在1936年军事叛乱之前只是一个相对不很重要的法西斯小党。

正是由于军队表面上不愿放弃其内政上作为“正朔”因素的传统角色这一态度，这就难以把西班牙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视为巩固的制度，但在另一方面，佛朗西斯主义制度的迅速无疑的崩溃说明了这个政权一开始就被置身于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从这一回顾的角度，被确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根本上不过掩盖独裁政体结构的推断得到充分的证明。佛朗哥政权虽然在初期阶段推行一种极端反社会主义的、反民主的政策并且对待少数民族也怀有民族主义目标，但是这些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如同其他法西斯独裁专政中所遇到的

反资本主义纲领条款一样被削弱了，而反犹主义倾向却从未有过。从部分并非是原来的法西斯力量的联合中产生的佛朗西斯主义国家党，不仅被佛朗哥统一起来，而且它面对军人和教会的强大影响也始终不能稳固下来。部分教会对政权的独裁路线不赞成，而军人则持极大的消极态度，于是，常常被看作是政权第三支柱的国家党相当不适宜地利用必要的公民投票以取得对政权的赞同。这个数量上看来很强大的国家党还是不能保住由佛朗哥建立的并由他所代表的体制的独裁政体结构。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确非常普遍的课题，即这个“半法西斯主义的”佛朗哥专政退回到一个独裁政权，然后有步骤地、未经革命改造而实现了民主化。

“西班牙例子”再次强调，过去和现在出于科学和政治理由在法西斯主义（及其各种形式）和独裁政体之间进行区别是多么必要。在这方面，对于时间因素，即对于这一事实，法西斯主义或独裁政体也能向两种方向演变，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说，佛朗哥政权不顾一些倾向而不向法西斯专政发展，甚至逐步削弱独裁特征，那么，这也由于1945年后世界形势的大大改变。这种世界形势正如在所谓新法西斯主义这一章里将更详细叙述的那样，使法西斯独裁专政的条件和存在可能性变得困难起来了。

第6节 法国法西斯主义

墨索里尼夺权以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研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一再试图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法国拿破仑三

世的波拿巴主义统治所得的准则，以说明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结构^③。他们论证法西斯主义与波拿巴主义相似，法西斯主义也是在阶级力量均衡的情况下取得政权的，其时资产阶级不再能取得和维护政权，而无产阶级则证明还没有力量这样做。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政党和阶层为了能够更牢固地维护自己的社会力量，即对生产资料的支配，而放弃行使政治权力，这对行政机构是有利的。掌握这一政权后，被法西斯分子所控制的行政部门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并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

在这里不可能对以波拿巴主义理论为依据给法西斯主义所作多种解释进行深入研究。虽说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尔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地将法西斯主义同波拿巴主义等量齐观的做法应当坚决反对，但法西斯统治和波拿巴统治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却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怎么说，法兰西第一帝国，尤其是法兰西第二帝国，试图用貌似革命的手段阻止和镇压革命。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的波拿巴主义体系能够把广大群众，尤其是朴实单纯的群众统一起来，当作革命运动的平衡力量加以利用，而革命运动则被用既压制又协调的办法平定下去。正是拿破仑三世懂得实行社会改良，首先卓有成效地力求利用获得的外国赔偿转移国内社会问题，举行全民投票，并得到多数票赞成。他用这种方式准备并且达到了从农业群众社会向工业群众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虽然在法国开始较晚并渐渐消失，但通过它却避免了较大的社会动乱。后来的法西斯主义也运用这些使人既爱又恨的波拿巴主义发展和实施的恩威兼施的统治方法。虽然以波拿巴主义为标志的

反革命一再（1830年，1848年，1870年）被从下层发动的革命所消除，但在法国波拿巴主义的传统仍然保留着，有时成为革命传统的补充，有时就取而代之。

1887—1888年，布朗热将军在共和国的一次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恰恰在法国工业区的几次选举中获胜，那时他也采用了议会的公民表决的方法。^④ 布朗热危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已经把它看作是“波拿巴主义的第三个时期”的一次新危机）虽然没有导致共和国的灭亡，却向法国右派力量和君主主义力量表明，用那种因为来自革命对广大群众有特殊影响的思想意识反对他们如此憎恨的法国革命传统是多么重要并有成功希望。这一点适用于民族主义思想，一种后退和反动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尤其适用于反犹主义，恰恰在19世纪末期的德雷斯福案件*期间，反犹主义显示出它动员群众、制造对立的力量和作用。

1899年在德雷斯福案件的顶峰时期，一个组织接受并利用了这些思潮，除了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外，这个组织还追求一定的反资本主义的、甚至工联主义的目标。它叫“法兰西行动”，拥有爱尔·莫拉斯这样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并拥有一个“出售保王党报纸者”集团，这个集团甚至准备利用暴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就组织和思想意识方面而言，“法兰西行动”对这些后来使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出人头地的许多举动，当时就先已干过了^⑤。而且20年代以来在法国出现的法西斯

* 1894年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斯福被诬告将秘密军事文件出卖给德国，因此被判终身监禁。反动派借此掀起反犹运动，鼓吹对德战争。1899年德雷斯福被宣告无罪。——译者注

主义不仅显示了一种思想意识的连续性和亲合性，它们在现实历史方面，甚至在人事方面，同“法兰西行动”都有紧密联系；因此“法兰西行动”不单纯是法西斯主义的先驱。由于有这样一段历史，可以预料法西斯主义在法国会迅速而富有成果地兴起，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由1918年以后法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所决定的。

由于世界经济繁荣和仰赖德国的赔款，法国工业不久就能由战争和由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变所造成的损失中恢复元气^②，1920年工业生产只达到战前水平的67%，到1924年这个比例数上升到114%，而1930年终于达到133%。与此同时，生产方法现代化，经济内部的集中过程继续进行。然而农业生产的增长却缓慢得多。卢瓦尔以南地区潜伏的农业危机的征兆是不容忽视的。战后的通货膨胀（1926年才得克服）也表明法国经济体系的结构充满危机。因为德国赔款必须首先用于偿还法国欠英、美的战争贷款，所以不能用于法国工业和农业必需的、基本的现代化。

尤其是法国的社会状况也是危机四伏。恰恰在中部和南部地区，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还无人过问，更谈不上解决。产业工人的社会状况更加糟糕。虽然1918年还签订了集体劳动合同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社会保险法和工人的不扣工资的休假的要求都未能实现。同德国的社会立法相比相当落后的法国社会立法造成这一事实的结果：起初左派由于内部发生冲突，力量十分薄弱，而联合成“民族集团”的右翼政党在1918年11月的选举中能从613个议席中获得137个席位。

在这次选举中只获得68个议席的社会党1920年在其图尔

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左翼有三千名代表，党内反对派有一千名代表。占优势的左翼组成了这个新的“法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第三国际。少数派在莱昂·勃鲁姆的领导下组成一个新的社会党，不久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它的领导岗位。1932年选举中社会党人获得98个议席，而共产党人能送进议会的代表只有10名。尽管使用各种革命言词仍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法国总工会”面对由共产党的分裂形成的“法国统一总工会”也能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1936年两个工会组织（与它们对峙的还有基督教工会）在人民阵线路线的指引下又联合起来。

直到1932年（除1924—1925年赫里欧内阁时期外没有中断）右翼政党都参加组阁，它们能够在内政方面利用左派比较虚弱的地位，在外交方面利用“宿敌”德国不仅被打败而且已经一蹶不振这一事实。因此起初极右派的宣传没有什么结合点。“法兰西行动”1914年以前获得的重要地位丧失殆尽。为此教皇庇护十一世对“法兰西行动”及其宣布法国天主教会脱离罗马独立的法国教会自主思想的谴责是有权威性的。根据1926年宣布的这一禁令，“法兰西行动”不仅失去了法国教士的支持，而且也失去了许多拥护保守的天主教派的成员。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法兰西行动”的一如既往具有君主制特征思想和目标遭到一些把比较时髦、比较吸引人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奉为圭臬的个人和团体的反对^⑥。

乔治·瓦卢瓦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原是“法兰西行动”和有民族主义—工团主义色彩的“普鲁东社”的成员。1925年他退出“法兰西行动”，自己建立了一个斗争联盟，名为“东

棒”(Faisceau),这个组织不仅在名称上,而且在思想意识和政治实践上都以意大利的法西斯(Fasci)为榜样。瓦卢瓦主张前线战士同生产者民族社会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消除阶级斗争,战胜国际马克思主义。他也积极努力,在工人中为其介于一个斗争联盟和政党之间的组织争取支持者,但收效甚微。瓦卢瓦在赫里欧为首的左派政府短期执政期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而普恩加来领导的右派的又一次胜利直接和间接地导致“束棒”在一开始就遭到“法兰西行动”的“出售保王党报纸者”集团的强烈反对而失败。瓦卢瓦本人认识到他的运动不能同普恩加来的极右政策相抗衡,并由此得出结论,加强了其纲领的“左倾”特征。他把这一点同对法西斯主义的日益增长的批判结合起来(现在他谴责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动立场),同明确反对反犹主义结合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由法西斯主义者几乎变成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瓦卢瓦丧生于一个德国集中营中^⑥。

面对1924年选举中左派在短期内取得的胜利,法国资产阶级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这种恐惧心理被另一个斗争联盟所利用,不过它从一开始就比瓦卢瓦的“束棒”右得多。这就是1924年由工业家兼保守党议员皮埃尔·泰亭热创建的“爱国青年团”。“爱国青年团”比其他右派团体突出之处在于它不是集中到为右派议员宣传和竞选方面,而是维护自己的一个含糊不清的政治纲领,要求建立强大的国家和实行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爱国青年团”同其他右派团体一起与其说它们属于打上现代意大利榜样的烙印的法西斯主义新政党的范围,不如说它们具有法国因袭波拿巴主义的传统。

1927年由前线战士联盟产生的、德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团”也是如此。它本来只吸收因军功受奖的前线战士参加。这个“火十字团员”的联盟从1931年起组成一个以保守的社会改良为目标的独立的政党，估计有十五万党员的群众基础。然而由于它没有确立反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目标，由于它很少表现出消灭政敌的意志，与其说它属于法西斯主义范畴，还不如说它属于保守的波拿巴主义的范畴。不过，“火十字团员”的存在和它的群众队伍恰恰被左派视为他们的论点的证明，按照这一论点只有团结一致的人民阵线才能战胜面临的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然后这股反法西斯主义潮流的壮大又成了右派联盟重新增长和其他法西斯主义潮流产生的前提。影响30年代法国政治生活的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两者的增长又是一种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结果^④。

世界经济危机对法国的影响较晚，但其后果在法国持续的时间比在欧洲其他国家长久得多^⑤。1938年法国工业生产比1929年的水平还低25%。这一持久的经济危机还又在部分法国工业和农业中加剧了结构方面的危机现象。经济危机导致第三共和国前此也已暴露出来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尖锐化。无论是右派、中派还是左派政党都不能组成稳定的有行为能力的政府。从1932年5月到1934年2月，法国更换了不少于六届政府。由于一些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自的利益集团——工会、企业家、农民、纳税人联盟和老战士联盟——，它们不能作出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必不可少的让步。“火十字团员”和其他团体的群众性示威游行（1934年2月6日利用警察力量才阻止住他们冲击议会）以后，共产党人和

社会党人准备组织一个统一战线，阻止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即将取得的胜利。自由派激进社会党人在参加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同时也表示要以意大利和德国的民主没落的历史中吸取唯一正确的教训。

1936年5月的议会选举以人民阵线的巨大胜利宣告结束。社会党人由过去的97个议席上升到156个议席，共产党由过去的12个议席增加到72个议席。社会党人勃鲁姆同激进社会党人一起组成得到共产党人承认和支持的人民阵线政府。人民阵线政府试图通过就业措施、国家对谷物价格的保证和实行赤字开支等其他方法提高购买力，克服经济危机。然而这一政策收效极其有限，付给失业者的钱难以收回，而在5月和7月的罢工浪潮中，工人所争得的增长的工资大多被暴涨的物价所吞没，人民阵线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失败使它的拥护者大失所望（在勃鲁姆下台后也是如此），这一失败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归咎于那些企业主的阻挠政策，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或多或少公开资助新兴的法西斯运动。

首先要提到香料厂老板科蒂，他不仅资助几个极右翼团体，而且后来他本人也组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名为“法兰西团结”^④的法西斯党。相反，1933年由前“束棒”成员马塞尔·布卡尔建立的“法兰西联盟”却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它的成员从未超过一万。参加该组织的，除了手工业者、雇员和工商业无产阶级外，也有一些工人。布卡尔彻头彻尾仿效意大利法西斯，而1936年由雅克·多里奥建立的法国人民党虽然一开始就在其政策和纲领中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和思维形象，但却具有独立的地位，这种地位使他在法国和欧洲形

色色的法西斯主义的刻度盘上处于极左的边缘^④。

多里奥的法西斯主义“人民党”其实是由具有某种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目标的、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右派形成的。多里奥本人原来是圣丹尼斯的共产党市长，是法国共产党的头面人物之一。他不合时宜地，并违反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意愿，主张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之后他就被开除出党。虽然法国共产党在开除多里奥几个月以后放弃了它的极左路线，而实行多里奥以前所要求的上述人民阵线政策，但共产党同“叛徒”多里奥之间并未和解。这时多里奥不仅批判而且以日益激烈的形式毫不妥协地否定法国共产主义。

虽然一部分工业界人士把1936年6月28日建立的法兰西人民党当作反共的工具和民族团结运动加以欢迎和支持，但多里奥却能劝说许多从前的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加入他的党；从其表现形式和纲领来看，这个党带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性质。该党的报告说，它的成员有65%是工人，虽然这是不可信的，但毫无疑问，参加该党的工人确实不少。法兰西人民党除了反共产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目标外，起初还有一定的以生产的现代化和合理化为宗旨的社会改良目标，而多里奥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对共产党人的强烈憎恨终于导致他们或多或少无条件地同德国占领军相互勾结。这样多里奥和他的党就完全自暴自弃了。

其余的法西斯主义团体和一种文学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也不得不遭受这种命运。法国有布拉西拉赫、塞利纳、尤其是德里厄-拉-罗歇尔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艺术成就上远远超过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血统和乡土文人^⑤。所有这些力

量和人物都因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根本性质而遭到失败。尽管法西斯主义有其国际要求，但它是而且必须永远是一种具有深刻民族特色的运动。德国占领军主要由民族动机制定的政策不可避免地遭到法国民族主义的批判和反对。这就使得那些法国法西斯主义者又陷于孤立，他们不能、也不愿放弃他们对以意大利，尤其以德国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典范的赞赏。法国法西斯主义陷入这种困境，终于统统土崩瓦解，而这种发展并不是必然的。

法军惨败以后，贝当元帅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法国未被德军占领的地区试图使这个经济力量薄弱、社会和政治四分五裂地进入战争的国家重新团结一致^④。一方面由于德国残酷的强权政策，另一方面由于成为一种群众运动的法国抵抗运动的反对，这些努力遭到失败。在这以前，甚至共产党人也放弃了直到德军袭击苏联为止它所表现的克制态度。起初未受重视的伦敦流亡政府的领袖戴高乐将军终于在1943年5月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抵抗组织团结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之中。保守—宗法制特色多于法西斯主义特色的维希政权*日益处于守势，因为贝当充当民族的和资产阶级的法国领袖的企图不能掩盖这一事实：这个政权自愿和被迫地同德国人广泛勾结，甚至积极支持迫害法国抵抗运动和驱逐法国犹太人的行为。甚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法兰西也日益感到戴高乐领导的流亡政府是自己的代表。这个政府能够指导反对国内外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抵抗斗争，以此表明了自己的合

* 指法国傀儡政权，因其政府设在法国城市维希故名。——译者注

法身份。

虽然维希政权的性质是“法西斯主义的”这一说法很成问题，虽然抵抗运动的成就并不那么大（不管怎么说，有两万名抵抗战士被德国人枪杀，六万人被驱逐），但既有民族动机、又有反法西斯动机的抵抗斗争形成了团结所有党派的法国民主重建的基石。就这点而言，同法西斯主义失败后意大利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同战后德国的情况却有很大差异。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法国的一些法西斯主义运动虽然有群众基础，但既未能统一，也未能掌权。贝当卖国政权不属于法西斯专政之列。

第 5 章

规模较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派别和模棱两可的情况

第 1 节 划分问题

虽然没有更合适的选择（这一点在《综述》一章中还要详述），按照其规模划分和区别法西斯主义运动还是颇成问题的。“西班牙情况”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一种特殊形势下，佛朗哥在几个月之内能由一个法西斯小党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国内政治力量。虽然如此，在第 4 章中论述的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西班牙和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同下面将要分析的英国、芬兰、比利时与荷兰的法西斯主义之间仍然存在数量上的差异，同时也表明质量上的

不同。

后面提到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选举中最多只得到10%的选票，它们对该国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在如此结构各异的国家中，法西斯党的存在再次证实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普遍性。人们几乎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差别比具有长期巩固的民主传统的工业化的英国与刚刚在一场浴血的解放战争和内战中诞生的、以农业占主要地位的芬兰之间的差别更大的了。然而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有法西斯主义运动，但其结构、纲领和实践迥然不同。比利时和荷兰这两个邻国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它们也有差别很大的法西斯党。

观察这些规模较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不仅可以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普遍性，而且可以看到它变化多端。这种变化一方面取决于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状况，另一方面取决于在这里产生的法西斯党的纲领和目标。

最后还谈到了丹麦、瑞典和瑞士的法西斯党，它们仅是一个派别，提到它们并不是为了在观察欧洲法西斯主义史的概貌时做到点滴不遗。研究这些党时，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它们或多或少明确地把法西斯主义的样板奉为圭臬，而是它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较大的意义和群众基础。通过这一鲜明的对比，可以明白法西斯党崛起的必要条件。这是指其余“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能够获得和利用的先决条件和所谓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所具备的先决条件，因为丹麦、瑞典和瑞士在两次大战期间其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已经同战后时期在西方民主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

相反，挪威的法西斯主义史在很多方面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吉斯林的党遭到挪威坚强不屈的强大的民主党派的几乎是一致的反对，它在选举中从未获得多于3%的选票。就这点而言，“民族统一党”属于法西斯主义派别之列。然而在德军占领挪威之后，吉斯林却成功地攫取了权力。这个吉斯林政权或多或少依靠德国占领军，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不由自主的卖国政权，而不是独立的法西斯专政，应归入下面将要论述的“模棱两可的情况”之内。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斯洛伐克的附庸政权以及波兰和葡萄牙的暴力专政。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其他许多可比的统治形式一样，许多研究者误认为它们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

因此，在只作简略叙述的这一章中，再次说明和区分两次大战之间时期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普遍性和时间跨度，同时与其他政治现象划清界线。

第2节 英 国

英国是欧洲这样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它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好像几乎没有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影响^①。英国打赢了战争，依靠它幅员广袤和未受触动的绝对统治，能够很快弥补了受战争影响的经济损失（只丧失40%的船舶吨位）。由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差不多同样迅速完成并取得成效。在取消战时在经济领域里所采取的国家控制措施以及将一些工业部门和铁路重归私人所有方面也是如此。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英国已经丧失了它曾经占有的世界

经济领导地位，让位于美国。煤炭和钢铁工业及造船工业迫切需要的现代化却未实现。这些行业和纺织业以及采矿业中失业率相当高，这表明英国经济体系陷入结构危机之中，不过这一隐而未露的危机现象暂时还未导致较大的社会紧张状况，虽然1918年以后扩大了的社会保险制度几乎不能同当时的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相比。

第一次由所有21岁以上的男子和30岁以上的女子（这一歧视妇女的规定到1928年才修改）参加的、1918年12月14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以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明显胜利结束^②。然而，19世纪末才作为各种工会的首脑组织成立的工党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1922年的选举中就战胜了自由党。1920年创建的共产党仍然不起重要作用，而工党却提出一个明显的社会主义目标。它要求将铁路、煤矿、电厂等收归国有。保守党政府用让爱尔兰共和国独立的办法解决了爱尔兰问题——其他少数民族问题（还）不存在——现在它们感到自己面对的是工党和与它相结合的工会的权力欲望。工会举行了各种成果累累的罢工，而1924年1月21日社会党政治家拉姆赛·麦克唐纳组成了一个得到自由党承认的少数派政府。保守党方面发表了一封据说是季诺维也夫写的、包含一个颠覆计划的信以后，1924年10月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内阁就被迫下台。然而英国第一个法西斯党恰巧在这紧张的国内政治形势下产生，这是绝非偶然的。

据说该党1924年就拥有十万党员，它彻头彻尾地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成功的样板奉为圭臬^③。“不列颠法西斯蒂”这个党名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虽然在语言上无可指摘，但对

一个非意大利政党来说却是非常奇怪的。该党认为它的任务是，在反对“赤祸”的斗争中做保守党人的后备部队。1926年，保守党政府在此期间以其压倒优势战胜工党重又掌权，英国法西斯分子对它以暴力镇压一次总罢工提供帮助。可是保守党人拒绝了这项帮助。“不列颠法西斯蒂”同自称“帝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的第二个法西斯组织在无声无息中沉没。后来还留在这两个支离破碎的法西斯组织中的成员参加了1932年秋天由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建立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这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英国法西斯党的产生和暂时的兴旺直接和间接地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及其后果有关。

世界经济危机使英国经济体系业已存在在结构上的危机现象进一步激化。群众性的失业现象出现了，英国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因为它——同德国的布吕宁*相似——想借助一种严格的紧缩政策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负责执行这项经济政策的是社会党人麦克唐纳。他在1929年工党获胜后组成政府，1931年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也参加了这个政府。1931年10月的选举以工党的惨败（失去1929年获得的287个议席中的二百多个）结束后，麦克唐纳仍在这个“民族内阁”中担任首相。尽管经过这次选举，尽管党内批评日益尖锐，麦克唐纳到1935年为止仍担任这个其实由保守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的首相。因此他在共产国际内部的评论中，被作为一个

* 海因里希·布吕宁（1885—1970），中央党人，1930—1932年任德国总理。——译者注

“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特别可恶的典型受到攻击。可是另一个很有名的工党成员却成了法西斯主义者。

他是1890年出生于一个在英国贵族社会中很受尊敬的贵族家庭的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莫斯利曾当过军官，参加过战争，起初加入保守党，1920年转为工党议员，1930年1月他向麦克唐纳政府提出一个计划，通过提高购买力、加强国家在经济领域的监督措施和实行经济自给自足政策来克服危机和失业。莫斯利的计划既遭到麦克唐纳、也遭到1981年进入内阁的保守党专业部长们的坚决反对。然而1932年秋天，莫斯利为了实现他的经济政策设想，自己创建了一个党，他简直铁了心，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可行的。

不仅“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这个名称而且这个党的外部表现（拥有一支身穿黑色制服、部分配备武器的队伍）表明该党是把法西斯主义奉为楷模的。从一开始这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莫斯利的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标的经济政策计划日益被自己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目标所排挤。他号召加强不列颠帝国，重建它其实已经消失的伟业。这同他日益激烈而粗暴地攻击由于德国逃亡者的移居而增多的英国犹太少数民族一样，不能用经济政策考虑来进行辩解了。但莫斯利暂时取得的成就却归功于他合理的经济政策设想，而且也归功于他日益具有侵略性和荒谬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目标。

中产阶级中的党员（“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成员中58%来自中产阶级）对他克服失业的计划感到满意，那些参

加联盟的工人似乎主要被反犹太主义的目标和行动所感动。事实说明，工人以及许多犹太人居住的伦敦东区是莫斯利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的一个重点地区，1937年该盟在那里的地方选举中获得19%的选票。恰恰在伦敦的这个市区该盟举行了多次群众性示威和游行，这些行动受到德国冲锋队的英国配对物“法西斯主义保卫队”的保护。然而这种完全以法西斯方式进行的宣传活动不仅遭到反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把莫斯利看作是工人阶级事业的贵族叛徒的工党党员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而且也引起资产阶级—保守党圈子的不满。

在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策略，通过自己策划的骚乱制造恐惧和不安全的气氛，然后被“强人”希特勒加以利用，因为只有他能够恢复“安宁和秩序”。相反在英国，这一策略未能得逞。一个由社会党领导、同时得到保守党人支持的民主政府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单独对国家的安宁和秩序负责。加之，紧缩政策不久就取得了成效。1933年底达到1929年的经济生产指标。失业人数降到百万以下；但到1938年为止又上升到二百万。然而国家经济的巩固并不是“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的重要性逐步下降（战争爆发后遭到取缔和解散）的唯一原因。毋庸置疑，英国长期坚定的议会制民主传统对“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的兴旺起了遏制作用。不过，英国难以说清的民主潜力也避免了一次确实深刻的考验，因为这个联盟成立得相当晚，而主要由于英国存在巨大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能够较快地遏制经济危机。虽然有关档案资料还要封锁几十年，至今对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历史的研究很不充分，但是一切迹象表明，莫斯

利的运动不单纯是美国议会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插曲。

第 3 节 芬 兰

芬兰到1808年为止是属于瑞典的，后来成了俄国的相当独立的大公国^④。19世纪末期才产生了芬兰民族运动，它既反对到那时为止在芬兰占统治地位的瑞典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影响，也反对日益由民族主义俄罗斯因素所决定的沙皇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独立运动得到德国的支持，两千名芬兰志愿军在德军第27普鲁士狙击兵营参加了战争。这些“狙击兵”后来建立了芬兰军队，又得到了德国人的支持。

然而，1917年夏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受到了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同俄国相似，在芬兰也发生了激烈的罢工浪潮，使政治生活激进化。社会党人的“赤卫军”组成后，资产阶级力量成立了“白卫军”。在议会中占有108个席位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只获得92个议席的社会党之间的联合看来已不可能了。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1917年11月在芬兰爆发了总罢工，导致暴力冲突和人员伤亡。由古斯托夫·曼纳林中将指挥的资产阶级保卫团被宣布为正式的军队并得到扩充。这支军队解除了还滞留在芬兰的俄军的武装以后，芬兰“赤卫军”在1918年1月宣布成立一个革命政府。芬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变成了一场内战。经过几场血战，白军终于取得胜利。以曼纳林为首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报复同样可怕，赤卫军的据点塔姆佩雷被占领后，七万名赤卫军被俘，其中有八

千人被立即处死，还有一万二千人由于饥饿和疾病死于俘虏营。

内战及其后果成为新成立的芬兰共和国的沉重负担。这个仍以农业为主（芬兰60%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国家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土地改革得到解决。内战中大多参加白军的许多佃农现在可以购买他们耕种的土地。但是这些佃农和许多别的小农为了建设自己的农庄不得不借台高筑。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他们的境况特别危急。

在边界问题上达到很大程度的、但从未令人满意过的一致意见。1920年芬兰同苏联缔结了一个和平条约，规定佩萨莫地区归芬兰，而居民主要是芬兰人的东卡累利阿仍归苏联所有。然而这个条约并没有在芬兰和它的东方大邻国之间建立真正的、持久的和平。相反，1921年国际联盟把厄兰德群岛判给芬兰，但芬兰必须保证讲瑞典语的居民的自治。此后，芬兰同瑞典为厄兰德群岛的争端得到和平解决。瑞典承认国联的这一决断，并放弃在芬兰挑起和推动瑞典少数民族的领土收复主义行动。

然而占总人口11%的讲瑞典语的芬兰人感到自己受到强大的芬兰化运动的威胁。这个运动是由右派力量和自称“大学生卡累利阿协会”的芬兰最大的大学生组织发动的^⑥。语言问题终于通过协商得到解决，虽然没有达到双方完全满意的程度，因为瑞典人不仅住在西部闭塞的移民区，而且恰恰在瑞典的和瑞典化的资产阶级中和国内上层人士中也有很大势力，所以语言问题复杂而又棘手。这件事遭到许多芬兰人的批评，其中搀杂着民族的和社会的动机。国内的大学里发

生了激烈的论争。在图尔库分别建立了一个瑞典人的大学，一个芬兰人的大学，而赫尔辛基大学的芬兰化则有系统地继续进行。虽然这里25%的学生、50%的教授是瑞典血统。然而语言问题终于获得解决，没有发展成为年轻的芬兰国家内政方面持续不断的严重考验。但内战结束后，资产阶级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对立却没有能够消除。

韦纳·唐内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奉行改良主义政策，1920年就组成了一个少数派政府，首先得到“瑞典人民党”的承认，而一些对唐内的改良主义路线不满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党，这个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同流亡苏联期间由奥托·库西宁领导的芬兰共产党联合。在1920年的选举中，左派社会党人得到10%的选票。在芬兰公众眼里，他们是受莫斯科遥控的“第五纵队”。一旦在芬兰东北部的伐木工人中或赫尔辛基的码头工人中发生罢工，马上就有人估计这些劳工斗争是由苏联煽动的，它想危害芬兰的社会和平，增加它的木材出口。芬兰所有非社会党都很反对共产主义。“民族进步党”是如此，更右的“民族团结党”和1919年由几个农民党联合而成、发展成最强大的非社会党的“农民联盟”也是如此。

由于在资产阶级政党和大部分公众中存在反共情绪，1928年12月在东波的尼亚的拉普阿村发生了一件引起很大震惊和广泛同情的事件就不足为怪了。^④这里的农民袭击了青年共产主义者的一次集会，想用棍棒把他们赶出村庄。一个到那时为止鲜为人知的自称为“芬兰门锁”的小组织为了实现纲领性意图，接受了这个芬兰村庄的名称。事实上由维赫图

里·科索拉领导的“拉普阿运动”（按瑞典语名称也叫“拉波运动”）一开始就追求以民族主义和宗教为基础的极端反共的目标。这个新的群众运动的成员不仅把共产主义视为国内政治的威胁，也视为对芬兰人民的民族和宗教的完整性的危害。正由于它的宗教的、民族主义的、特别是反共产主义的目标，拉普阿运动得到（路德派）教会以及保守党和农民党的支持。

1930年政府在拉普阿运动的催逼下准备向议会提出国家保护法，规定解散和禁止国内所有共产主义党派。右翼政党在新选举中获得大胜以后，这个反共法案得到宪法要求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投票反对。但是拉普阿运动还不以此胜利为满足，它常常越过苏联边境，继续进行反共恐怖活动。甚至前芬兰总统斯塔尔贝格也遭到拉普阿运动成员的劫持。1932年2月，几千名拉普阿运动成员在赫尔辛基附近的门塞拉村集会，从那里开始向首都进军时，政府才采取了有力措施。由于保守党总统斯温胡武德态度坚决，以调动军队相威胁，拉普阿运动的这一政变企图宣告失败。它被解散，并入了1932年6月成立的“祖国人民运动”之中。

其实祖国人民运动不过是拉普阿运动的继续。许多成员，包括领导人维赫图里·科索拉和维尔霍·安纳拉，以前都是拉普阿运动的成员。然而这两个运动之间也有一些差别。祖国人民运动一开始就以政党的面目出现。首先是它的思想意识目标仍然是以民族主义和宗教为基础的反共产主义，但是它也拟定了一个有反资本主义色彩的纲领，显然是仿照意大利、德法西斯的模式行事的。它不仅努力争取受到世界

经济危机后果影响的农民，而且也想争取工人。为了这个目的，祖国人民运动提出了一个解决失业问题的计划，规定了农村垦荒措施和实施缩短劳动时间。然而看来这个运动没有能够争取到可起重要作用那样大的数量的工人。另一方面，该运动的有反资本主义色彩的要求引起保守党人的不信任，他们谴责祖国人民运动的“左”的倾向和以外国法西斯主义为榜样。然而这个运动不仅在农民中而且在城市中产阶级和大学师生中也得到支持。这一事实导致党的重点地区主要在赫尔辛基及其周围，而几乎完全受农民影响的拉普阿运动则在农业地区特别受人拥护。与在语言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的拉普阿运动不同，祖国人民运动支持大学生卡累利阿协会的芬兰化活动。这个运动除了同这个芬兰大学生组织密切合作外，也象拉普阿运动那样得到教会的支持。相反，强大的“农民联盟”却日益同祖国人民运动划清界线。保守党主席兼芬兰共和国总统帕西基维也告诫人们不要同祖国人民运动合作。

但这事发生在拥有十万名党员的祖国人民运动在1936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200个议席中的14席以后。从此这个运动被资产阶级政党和保守党视为必须认真对待的政敌而加以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多次有人谴责说，祖国人民运动依靠一种外国力量。这是指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尽管芬兰和德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但德国的政策在芬兰也受到批判。恰巧芬兰的虔诚派路德教会公开而激烈地转而反对“德国基督徒组织”的反基督教目标。祖国人民运动虽然赞成这一批评，却不能阻挡除保守党外，教会也日益同它疏远，因为教会反对

祖国人民运动日益明显地把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奉为楷模。此外，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祖国人民运动的党员在数量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已经下降。1938年11月22日，它甚至被内政部长乌尔霍·凯科宁取缔。不过，这一也是出于对西方列强和苏联的外交政策的考虑的禁令不久就被法院撤销了。祖国人民运动参加了1939年的议会选举，在总共200个议席中仅得8席。1941年到1943年，当芬兰站到德国一边对苏作战时，祖国人民运动的领导成员维尔霍·安纳拉甚至在政府中担任过交通部长。1944年同苏联签订停战条约后，该党最终被解散，虽然看来它从未得到纳粹国家的组织或纳粹党的公开支持。

总的看来，祖国人民运动，特别是其先驱拉普阿运动，在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芬兰性质，虽然祖国人民运动恰恰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以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民族社会主义为榜样，这是不容忽视的。尽管作为反共产主义的农民抗议运动产生的拉普阿运动有其独特的根源，但它，特别是其后继者祖国人民运动，属于未能获得群众基础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之列。祖国人民运动与其他法西斯主义运动所共有的反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较少量的反资本主义的目标，在一个国家最终没有获得什么成就，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气候虽然受到激烈的反共产主义的影响，但同时它又重视除了民族独立外也保持其民主一议会制的结构。语言问题和真正的或者只是想象的共产主义威胁未能决定性地触动的、芬兰人的民主和民族的一致表明它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是能够抵抗的。

第4节 比利时

比利时在20年代成功地恢复了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的经济以后^①，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的巨大影响。然而30年代导致比利时的政治体制也陷入严重危机的不只是或不主要是经济因素。比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重要得多的是语言问题。它导致比利时国内产生两种互相敌对的民族主义。这就是讲法语的瓦隆人的民族主义和佛拉芒人的民族主义。

佛拉芒民族主义者极力反对法语在比利时的文化、行政管理 and 军事中具有的重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同德国人互相勾结，德国人曾答应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佛兰德*。由于他们战后遭到官府的迫害和惩罚，现在他们对在比利时国家联合中的忠诚合作不感兴趣。连那些在比利时军队中对德作战的、为数多得多的佛拉芒人也不得不失望地确认，他们的忠诚态度没有通过语言问题上的让步得到报答。佛拉芒人要求在比利时行政管理和社会生活中较多地考虑他们的语言。然而，这一要求却遭到瓦隆民族主义者的严厉批判。直到1932年至1938年间，语言问题才得到佛拉芒人所广泛满意的解决。语言问题这么晚才得到只是临时的解决，其原因是比利时政党体系的分裂和两极化。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这个全为天主教徒所居住的地

* 旧地区名。位于今法国西北部和比利时西部。——译者注

区由强大的天主教党统治。然而1919年实行男子普遍选举法以后，该党失去了它的一统天下。1912年，它所得选票还占全部选票的51.5%，1919年的选举中只占38.8%，得到73个议席。相反，社会党的选票翻了一番，议席由原来的37个增加到70个。1925年的选举中，社会党又多得8个议席。自由党人在这几次选举中只得到16.6%的选票，终于被排挤到第三位。虽然1925年第一次把两个议员送进议会的共产党影响较小——它所得的票数从来没有超过总票数的6%——，但是在有必要组成天主教党和自由党或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时，总显得异常困难。这些联合政府往往很快就被推翻。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比利时的政府更迭达18次之多。

政治体系的这种不一致和不稳定的状况首先被佛拉芒民族主义运动所利用^④。他们的“佛拉芒阵线”或名为“阵线党”的政党在选举中得到5到10个议席。1939年达到顶峰，获得17个席位。“阵线党”是一个民主党，它的成员来自佛兰德的城市和农村的中产阶级。然而，1931年其领导成员若里斯·范·塞维伦退出该党，成立了“大尼德兰全国社会连带主义者联盟”。该联盟同其他佛拉芒小团体联合组成“佛拉芒民族联盟”。

分析这个联盟的性质是困难的，研究中争议很多。一部分成员一如既往拥护民主和议会制，甚至反对军国主义，而由若里斯·范·塞维伦领导的另一部分人则日益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首先名为“佛拉芒民族军”，后来称为“大尼德兰战斗团”（成员800人）的佛拉芒民族联盟的民兵组织就是这样。起初，在范·塞维伦宣传佛兰德的独立后，从1937年起

又提出“大比利时”方案。比利时应该成立一个以中世纪的勃艮第为榜样的大国的核心国，这个大国除比利时外还包括荷兰、卢森堡和法属佛兰德以及勃艮第。不过，许多佛拉芒民族主义者不同意范·塞维伦的这个帝国主义的幻想计划。他们离开了这个在选举中毫无成就的党。1940年5月间，范·塞维伦被法军杀害，这时佛拉芒民族联盟和佛拉芒“阵线党”成员不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在这方面得到的痛苦教训，又甘心同德国占领军相勾结，因为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达到建立一个独立的佛兰德的目标。这样佛拉芒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大丢其脸，但还不是决定性的。

在瓦隆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对法西斯主义的样板也很重视。首先1924年建立的，以明显反民主、反布尔什维克、反社会主义和反佛拉芒人为目标的名为“民族行动”的派别组织就是如此。此外，它还鼓吹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意大利为榜样实行组合制。给这个民族运动分类也是一件难事，它有一个青年组织叫“民族青年”，它的成员中约有三千名中学生。相应，“民族军团”明显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民族行动党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这个组织，少数为天主教党所吸收。“民族军团”本来由比利时的老兵组成，在思想和组织方面日益受法西斯主义样板的影响。身穿制服、部分佩戴武器的名叫“青年军”的民兵组织更是如此。德军占领比利时后，法西斯主义的“民族军团”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抵抗运动。它的领袖奥纳埃1944年死于德国集中营。

相反，次于佛拉芒民族联盟（及其核心大尼德兰全国社会连带主义者联盟）和瓦隆人的民族军团的第三个、也是比

比利时最重要的法西斯党的发展却是另一种情况。它于1935年由大学生莱昂·德格雷尔以“人民阵线”为名创建，但一般按照“天主教行动”的出版社的名称，叫它“雷克斯运动”。*

同佛拉芒民族联盟（或者大尼德兰全国社会连带主义者联盟）的领袖范·塞维伦相似，德格雷尔也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在他担任一份大学生杂志的编辑而有了一点名声以后，1930年他担任了上述天主教出版社的社长。这家出版社以基督一君王一礼拜为名，从20年代起在比利时受到天主教会的照顾，而天主教会以其民族主义、激烈反共的态度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样板的影响。比利时天主教会的半军事组织“青年联盟”尤其如此。1932年，德格雷尔受天主教党委托组织即将到来的竞选。看来他大力加强了天主教党和天主教普通教徒运动内部的民族主义路线和反共路线。当他的这条路线遭到反抗时，他就公开而激烈地反对天主教党。他指控领导该党的政治家贪污腐化，天主教党就断绝了同他的一切关系。德格雷尔并不就此罢休，他同天主教党和天主教普通教徒运动的其他领导成员一起建立了自己的党，即雷克斯运动。

这个运动要求彻底废除被视为堕落、软弱的议会制度，限制同德格雷尔的精英观念和等级观念不相容的普遍选举权；虽然雷克斯运动也提出解决失业问题的纲领（其中要求减少在比利时的外国劳动者的数量），但它的目标的性质主

* 雷克斯(Rex)是古罗马君王称号。这家出版社叫雷克斯出版社，德格雷尔任社长并编辑出版一种月刊，也叫《雷克斯》，因此人把他所领导的运动为“雷克斯运动”。——译者注

要是保守的、天主教的，而不是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的。由于德格雷尔得到一些比利时财团的支持，他能够进行激烈而费钱的竞选。效果是有的，1936年议会选举时，雷克斯运动一举获得11.5%的选票，21个议席。这样它几乎能把自由党从第三把交椅上挤走。虽然德格雷尔在语言问题上没有采取坚决反对佛拉芒的态度，但他的党恰恰在瓦隆尼亚的农村地区得到特别有力的支持（它在那里得到总票数25%以上的选票）。在佛拉芒人和瓦隆人居住的布鲁塞尔及其周围地区，该党得票数在15%到20%之间。相反，在佛兰德大多数地区，他所得票数的比例只有5%左右。同雷克斯运动成员的成份相似，它的选举人也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和官吏。其中大多数人过去都支持天主教党。

选举获胜后，德格雷尔一直试图制造政治事端，他迫使进行各种补缺选举，其所以必欲这样做，是因为雷克斯运动的议员放弃了他们的议席。德格雷尔在雷克斯运动中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他想把这些补选变成公民表决。然而，其他政党认识到这种危险，接受了这一挑战。在布鲁塞尔的一次被迫举行的补缺选举中，年轻有为的首相保罗·范·泽兰同德格雷尔进行了较量。由于范·泽兰不仅得到他自己的党、天主教党的支持，而且也得到社会党、自由党、甚至共产党的支持，获得75%的选票，而德格雷尔只得到不到19%的选票。一般把1937年4月的这次补缺选举看作是德格雷尔的重大失败。从那时起，雷克斯运动的影响明显下降。它的成员，包括领导成员，脱离了这个党。

对雷克斯运动的衰落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还有这一事

实：即天主教会明显同德格雷尔疏远，而他原来以为他肯定会得到天主教会支持的。马林内斯大主教公开宣称雷克斯运动对国家和天主教会是一种危险。比利时的这位主教显然从在德国进行的教会斗争中吸取了教训：同法西斯主义过分密切的合作并不像同法西斯意大利（1929年）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1933年）缔结政教协定后起初所设想的那样有利。

德格雷尔对天主教党和天主教会的抗拒的回答是，更加露骨地把法西斯意大利奉为楷模。雷克斯分子找机会同他们的政敌进行暴力斗争。然而，由于采取这些行动，雷克斯运动不断缩小的政治影响（1938年10月的地方选举已经预示）不能再保持了。1939年的议会选举中，雷克斯运动只得到4.4%的选票和4个议席。这样它就成了一个政治上完全没有影响的小党派。退党活动继续进行，因为现在德格雷尔也提出了公开的反犹主义目标，但在比利时很少得到响应，连大尼德兰全国社会连带主义者联盟和民族军团也没有奉行反犹主义。然而，现在德格雷尔继续公开颂扬希特勒，以前他赞颂法西斯意大利榜样，现在他日益把希特勒的党奉为楷模。在德格雷尔对德军袭击波兰、丹麦和挪威表示赞赏以后，他的运动在比利时几乎完全陷于孤立并受到了蔑视，但这没有阻止德格雷尔和少数还留在党内的党员在比利时被占领后同德国占领军相互勾结。同几个别的雷克斯分子（其中也有1940年以后才参加这个运动的比较年轻的人）一起，德格雷尔在武装党卫队中参加了反苏战争。

比利时的三个法西斯运动没有一个建成法西斯政党。大尼德兰全国社会连带主义者联盟和佛拉芒民族联盟是由非法

西斯主义的佛拉芒民族运动产生的。后来在若里斯·范·塞维伦的领导下，这个起初纯属民族主义的运动才日益明显地“法西斯化”。“民族行动”党内的瓦隆人的民族主义者的发展与此相似，他们在参加“民族军团”这个老兵联盟以后，就在思想和组织方面日益使这个组织与法西斯榜样相适应。

相反，雷克斯运动起先以极端保守的天主教党的面目出现，然而后来它使其民族主义、反民主、反共，最后反犹太主义的目标日益激化。甚至在组织方面也与法西斯主义，最后与民族社会主义样板相适应。然而，恰恰这一点大大加速了雷克斯运动的灭亡。所有政党，包括天主教党，都视它为外国法西斯势力的支持者而加以反对。“民族军团”（其成员在比利时反对德国人的抵抗运动中进行斗争）的命运表明，一种法西斯主义倾向不一定导致叛国。

根据不充分的文件资料可以确定，比利时的所有这三个法西斯主义团体或多或少得到佛拉芒人和瓦隆人中的中产阶层的支持，投他们的票。虽然至少雷克斯运动从比利时工商界得到资助，但是在所有法西斯主义团体的纲领中居于主导地位，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民族问题。

第 5 节 荷 兰

根本没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损害的荷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两次大战期间已经得到很大进展^①。1930年从业人员中只有26%以上的人从事农业劳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较晚，但却严重，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农业遭到了损

失，因为以前农业就已发生了结构危机。

党派体系既复杂又稳定。与大罗马天主教国家党对峙的是两个新教的党，其中一个受保守党影响，另一个则受自由党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自由党日益失去影响。1918年，它们还获得20%的选票，而1939年只得到10%的选票。“社会民主工党”在实行普选法以后成为国内第二大党，但到1939年才参加联合政府。撇开无足轻重的共产党不谈，最后还有其他几个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和地方性的小党。

同德国情况相似，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徒不仅组成政党，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会、联合会、社会设施，甚至还有自己的广播电台和学校。与德国不同，荷兰的政治和社会体系的这种“环节”也包括新教阵营。新教也有自己的党派、联合会和其他组织。只有两个自由党未能创造可以相比的“环境”。当然，政治和社会体系的这些环节给组成因党派多样而成为必要的联合政府增加了困难。加之，新政党很难突破牢固结合环节，从社会民主党或天主教和新教的“阵营”中获得选民。唯一较有影响的荷兰法西斯党也必然有这种体验。

这是指1931年9月14日在乌得勒支由A·穆塞特和C·范·格尔克肯建立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①。穆塞特和范·格尔克肯出身自由党，但以前就同荷兰的法西斯主义和右翼激进派的几个小党派有所接触。后来这些党都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组织和思想意识方面，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受德国样板的影响。它追求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议会制的目标，要求建立一种组合的经济制度。反之，反犹太主义倾向几乎完全没有。该党在国内较大的城市中得到第一

批拥护者，这些成员主要来自中产阶层的上层，如官吏、商人、军官、大学教师、领年金者等。该党显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差不多所有其他法西斯党中，青年人点的比重都较大，而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却不是这样。

起初，该党没有参加议会选举，集中力量扩充党的机器。据说1934年1月，这个运动已经拥有21000名成员，1936年1月甚至达到47000人。如果考虑到，强大的天主教党和社会民主党当时只有不到十万党员，就明白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短时间内已经达到了相当强大的地位。这在1934年的地方选举、特别是1935年的议会选举中显示了效果。它一举获得8%的选票。鉴于荷兰牢固结合的政党体系，对这一显著成就连当时荷兰公众也感到惊异。

尽管如此，比较精确的选举分析表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没有能够闯入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党和新教党的领地。该党所得的选票几乎全是从自由党和几个小反对党手中夺来的。一如既往，这个在社会方面仍然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党的重点地区是在大城市。在与德国边境接壤的几个农业省，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获得的选票也不少。甚至在天主教徒居住的林堡省也是如此。这个运动在那里继承了几个短命的反对派运动的遗产。天主教的“堡垒”在那里建造得不十分牢固。在其他地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显然从依然持续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好处。也许近邻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能够较早克服经济危机这一事实在这一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然而，后来德国的榜样对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继续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正是反对教会和迫害犹太人的举动在荷兰

公众中引起极坏的反响。加之，由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政策，荷兰向德国的出口日渐减少。然而，对民族社会主义运动1935年选举胜利后不久开始衰落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天主教党、新教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抗活动。这几个党的党员不仅表现出有能力抵制民族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而且建立了种种防止面临的法西斯主义危险的组织。教会和国家机关也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1934年政府就曾颁布命令，禁止国家官员参加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激进党派），现在又坚决将这禁令付诸实施。因此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退党，而在部里工作的穆塞特和范·格罗克肯两人明确表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虽然穆塞特一再强调，他的党严格遵守法令，但他不能阻止德国冲锋队的荷兰配对象“防卫队”被取缔和解散。最后由于克服了经济危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活动就失去了基础。

德军占领荷兰以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重新得势。它从德国占领军的决定中得到了好处，继取缔左翼政党和自由党之后，德军终于决定也取缔右翼政党。穆塞特虽然没有像吉斯林那样当上总理，但荷兰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参加了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并以这种身份参与了党卫队志愿军的建设。即使他们甘心这样干，但他们也未能阻止驱逐荷兰的犹太人和把荷兰人送到德国去当劳工。他们成了卖国贼，受到所有政治力量和教会的彻底孤立和蔑视，还受到荷兰抵抗运动的强烈反抗。荷兰解放后，穆塞特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由于紧跟民族社会主义这一榜样得到

了暂时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衰亡。它失败于牢固结合的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党和新教党的反抗和防御意志。它从来没有能够侵入这些政党的“阵营”。由于这一原因，它也没有形成荷兰民主政治体系的威胁。由于同纳粹德国建立思想、组织乃至政治上的联系，它在荷兰人民中威信扫地，以致完全失去了意义，终于甘心充当叛国的内奸。

第6节 丹麦、瑞典和瑞士的 法西斯主义派别

在丹麦，1930年成立的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始终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在1935年的议会选举中，它以16300票占总票数的1%弱。1939年以31000票占总票数2%弱，但总还能把3名议员送进了议会。甚至在1943年德军占领丹麦以后举行的选举中，该党又只能获得3个议席^①。

从一开始，它就以德国纳粹党的既简单又可笑的模仿者的面目出现，这一事实对它的彻底失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不仅是由于穿褐色制服、用卐字作党徽、建立冲锋队，而且还由于党的纲领几乎是逐字逐句从纳粹党的二十五条纲领翻译过来的。甚至官方的党歌也是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的丹麦版。

由于这样简直是奴颜婢膝地尊奉德国样板，丹麦民族社会主义者不仅遭到1924年起同左派自由党（“激进自由党”）

* 纳粹德国的国歌。——译者注

一起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而且也遭到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保守党人和右派自由党人的坚决反对。对此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反纳粹和反德的动机。1864年，丹麦进行的最后一次反对德国（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终于以失败告终。当时被并吞的北石勒苏益格根据1920年的凡尔塞条约规定又归还丹麦，但许多丹麦民族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丹麦终于同意承认在弗伦斯堡和中石勒苏益格举行的、明显有利于德国的民意投票的结果；然而人们一如既往对南部的强大邻国很不信任。民族社会主义恰恰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已经提早取得了成就，它的兴盛更加强了对德国的这种充满恐惧和不信任的消极态度。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恰恰是1920年的民意投票以后归丹麦所有的石勒苏益格北部成了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重点地区。1935年的议会选举中，该党在这里获得4.4%的选票，1939年获得4.7%的选票。这一当然是相对的成果可以归因于这一事实：即恰恰在这个农业地区，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特别强烈。加之，在这里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可以利用当地农民党之间的争端从中渔利。然而最重要的是，该党领袖弗里茨·克劳森医生就是北石勒苏益格人。

1933年克劳森强迫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建人和第一位领导人前军官卡于·伦布克下台。然而嗜酒成癖的克劳森从来没有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他根本没有超凡的素质和能力。德军占领期间，许多丹麦人对此用讽刺挖苦的语调说：“愿上帝保佑国王和弗里茨·克劳森！”就连德国占领军也没有感到克劳森有什么足够的本领和力量来扮演丹麦的

吉斯林的角色。他的党几乎没有参与国家的管理和统治。这一点并不妨碍丹麦人恰恰在德军占领期间对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十分蔑视。在农村和小城市，丹麦民族社会主义者也受到邻人和同乡无情的、坚决的抵制。有些人甚至被丹麦抵抗运动处死。

1940年以后，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中妇女占25%，这个百分比相当高。对一个法西斯党来说，这也是一件令人惊异的、罕见的事实，它可以归因于该党在丹麦人民中几乎完全孤立。女党员所占百分比的增加是那些有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家庭受社会抵制的结果。这导致一些妇女出于一种对抗反应，同她们参加了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或者自愿报名参加党卫队的父亲、兄弟或儿子采取一致行动。相反，有些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员试图从农村或小城市迁往首都以逃避社会抵制和同乡的蔑视，因为他们希望，在首都可以隐姓埋名，不受打扰地生活。1940年以后，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哥本哈根和其他大城市的力量比在农村较强。然而，党的地区重点的转移必然同经济状况发生联系。1940年以后，城市的失业率特别高，因为丹麦工业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被切断了，而农业的情况却较好，因为农产品能够而且必须向德国出口。

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化的丹麦——400万丹麦人中有250万住在城市——虽然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后果的严重影响（因为占丹麦出口75%至80%的农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暴跌），但是没有从经济危机发展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否则丹麦的法西斯党就可以加以利用了。虽然1932年总共有20

万丹麦人和三分之一的有组织的工人失业。但是丹麦社会民主党还能在这年举行的选举中明显获胜，并同左派自由党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通过对经济生活的统制干预，解决失业问题。政府的强大干涉的方针虽然遭到在野的保守党人和右派自由党人的尖锐批评，然而这些内政和经济方面的争论没有导致政治体制的不可克服的分化。

丹麦共产党始终软弱，无足轻重，而社会民主党人和左派自由党人同在野的保守党和右派自由党在坚决反对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党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它们的动机有所不同。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反社会主义、反民主的目标，以及它把德国纳粹党奉为楷模的行动都受到坚决批判。一直被看作是一支“第五纵队”的丹麦民族社会主义者公开同德国占领军勾结以后，他们就遭到丹麦各阶层民众的坚决孤立、抵制和强烈反对。

瑞典的各法西斯主义政党也同丹麦党相似，始终是一些完全无足轻重的小集团。它们受到绝大多数人民出于民主的和民族的动机的坚决反对^①。瑞典的法西斯政党既不能在竞选中取得胜利——它们从没有得到超过1%的选票——，也不能克服它们各党之间存在的个人和思想方面的分歧。

瑞典的第一个法西斯党是1924年4月由弗勒戈德三兄弟（比尔耶、贡纳尔和西耶尔）创建的“瑞典民族社会主义自由同盟”。贡纳尔·弗勒戈德医生1916年至1918年曾受红十字会的委托在俄国呆过。他回来时成了坚定的反共和反犹太分子，因为他获得了这种印象：布尔什维克革命基本上是犹太

人搞的。1923年秋天开始，他和他的兄弟西耶尔同鲁登道夫、希特勒以及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其他领导人如约瑟夫·特尔波文、格奥尔格·施特拉塞、海因里希·希姆来和尤利乌斯·施特勒歇尔保持接触。瑞典民族社会主义自由同盟明显受到纳粹党榜样的影响。它树立了反社会主义、反犹太主义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反对所谓“劣等种族”，特别是犹太人迁入瑞典。该党为其追随者、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要求获得经济支持。虽然该党把党名改为“瑞典民族社会主义农工党”，但它很难争取到工人。有一件事对该党的兴旺产生了不利影响，那就是20年代还有两个法西斯主义团体诞生，它们同终于由比耶尔·弗勒戈德领导的党进行竞争。

其中之一是1925年由埃洛弗·埃里克松创建的“民族统一运动”。埃里克松不仅要求更积极地向瑞典北部地区移民，而且坚决反对所谓犹太人对瑞典经济和政府的重大影响。在埃里克松公然诋毁在瑞典经济界确实很有影响的有犹太血统的瓦伦贝格家族以后，1935年秋由他编辑出版的报纸被政府取缔。接着他的法西斯主义团体也宣告解散。

1926年终于建立了第三个法西斯党，它先是称为“瑞典法西斯主义战斗组织”，1930年起改名为“瑞典民族社会主义党”。从改名上可以看出，他先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榜样，后来则把纳粹党奉为楷模。参加该党的主要是为数不多的雇员和前军官及军士，这些军人同该党创建者斯文·黑登格伦和斯文—奥洛弗·林德霍姆一样，是由于1925年社会民主党人国防部长佩尔·阿尔宾·汉松推行军事改革而离开瑞典军队的。这个得到一个名叫阿维德·赫格曼的银行家所支持

的党在林登霍尔姆的领导下首先反对马克思主义，并把有改良主义倾向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也算作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据估计，1929年在希特勒的倡议下，弗勒戈德和林登霍尔姆的两个党派合并起来。新党称为“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党”，明确地把德国纳粹党作为自己的榜样。可是，1932年由于党内发生激烈斗争，林登霍尔姆被开除出党，于是他又建立了一个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林登霍尔姆的新党不仅试图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结果未能得逞），而且还确立了诸如银行国有化、工人参加分配企业主的利润和实行一种组合制等明显反资本主义的目标。反之，受反犹太主义影响，要求将瑞典犹太人置于外国人法的管束之下。林登霍尔姆的新党同样是无足轻重的，但他成功地将自己的竞争者比耶尔·弗勒戈德排挤出去。1937年弗勒戈德被自己的党员免去了职务，他的后任马丁·埃克斯特勒姆斯上校试图把几个法西斯党派联合成为一个“民族社会主义集团”却未能成功，后来这个法西斯小党尚有为数不多的党员就加入了林登霍尔姆的党。

1938年起，林登霍尔姆谨小慎微地力图避免过分明显地追随德国样板。他给自己的党起了一个听来并不怀疑的新名称：“瑞典社会主义统一党”，废除原来的卐字党徽，改用“瓶十字”党徽。林登霍尔姆的党员相互之间也不再用“胜利万岁”作为问候语了，而改用“瑞典为了瑞典人”。然而，鉴于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日益具有侵略性，瑞典选民十分认真地接受了这个口号，并且比过去更加回避瑞典民族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把这些人看作是一种外国的、也可能是敌对势力的代

理人。德军袭击挪威后，瑞典法西斯党的影响下降到零。但直到1946年颁布反诽谤法，它们才最终遭到取缔。

同丹麦和荷兰相似，瑞典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表明它们对法西斯的吸引力也是有抵抗力的。在国际有名的、甚至受到政敌尊敬的赫亚马尔·布兰廷和佩尔·阿尔宾·汉松的领导下，从1920年起除很少几次中断外而一直执政的、有改良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成功地采取国家干预的手段，把经济危机的影响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了农民联盟党的支持。政党之间的这种合作是以工农之间的牢固联盟为基础的。这样就防止了一种以反议会制和反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农民抗议运动的产生和激化。如果考虑到瑞典的工业化和城市化——1940年居民中有35.7%的人从事工业劳动，只有32%的人从事农业劳动——在两次大战期间发展特别迅速，那么就会明白产业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这种协调是多么重要和必需，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瑞典法西斯主义者没有能够利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不同利益，也没有能够利用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党派对立。

由于从前的强国瑞典在和平解决奥兰群岛冲突*后，没有改变现状的企图，瑞典法西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宣传鼓动也就落了空。瑞典也不存在少数民族问题，因为萨阿米人（拉普人）当时还没有发现自己的民族特性，而瑞典只有很少而

* 奥兰群岛（芬兰人称阿维南马群岛）位于波罗的海芬兰和瑞典之间，原属瑞典，1809年同芬兰一起割让给俄国。1917年芬兰独立后，芬兰和瑞典两国为此发生争执。1921年经国际联盟调处，确定群岛领土主权归属芬兰。——译者注

且已完全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尽管如此，法西斯分子所进行的反犹太人宣传鼓动并非完全不起作用。

1929年以来，在大学城市中发生了多起示威游行，参加的人大多是大学生，每次平均12000人至15000人。这些大学生要求大大限制外国人——1933年以后——特别是那些有犹太血统、想在瑞典大学里工作的人迁入瑞典。这些本来是由法西斯分子提出的敌视外国人的、反犹太主义口号，现在也被保守党的青年组织——瑞典民族青年联盟所接受了。不仅如此，该组织还要求取缔所有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一个强大的按组合制组织的国家。

尽管并非所有出于反犹太主义的和经济上的原因反对接收来自德国的犹太人逃亡者的大学生都选择了法西斯政党。保守党的青年组织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信奉法西斯榜样，它也没有成为法西斯主义组织，然而这些事件说明，在瑞典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显然比法西斯党的党员和选民人数所显示的力量要强大。瑞典党派和社会团体之间存在的民主协调一直是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但是瑞典不仅愿意同第三帝国进行频繁的、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而且在迁入瑞典的问题上也采取限制的态度。第三帝国在同瑞典（还有瑞士）当局进行外交谈判后，于1938年10月6日收回了德国犹太人的出国旅行护照，在上面写上一个红色的“J”字。瑞典为了在内政上保持民主协调并有效地防御法西斯分子的挑衅，不得不在外交上付出很高的、在道义上很成问题的代价。

• 德语Jude（犹太人）的第一个字母。——译者注

瑞士的情况与此类似。它也同意与第三帝国合作，允许德军运输物资从自己的国境通过，并执行日益严厉的限制迁入政策，主要是对付犹太人逃亡者，其中一部分被送回德国^⑤。这种局部顺应的政策又同瑞典相似，也是出于内政方面的考虑。但在执行这一政策的同时，着手扩充瑞士军队，准备抵抗令人担忧的德军的进攻，保卫国家。人们试图以此来对付瑞士法西斯分子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宣传鼓动。瑞士政府采取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坚强而有效地限制了法西斯分子的影响。总的说来，既古老、又坚固的瑞士民主体制没有由于法西斯主义团体的存在，也没有由于上述抵制措施而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被视为欧洲自由与民主的宝地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也能找到追随者。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瑞士也深受其害，1936年1月失业人数达到高峰——124000人，这里也发生了对民主的体制和传统的批判。但是在使用多种语言的瑞士，少数民族问题和民族问题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相反，1938年经过一次公民投票，宣布瑞托罗马语成为第四种官方语言。由于提契诺（特辛）州的意大利人的语言和文化的特权同时得到扩大和保护，瑞士有理由夸耀自己成为一个用和睦而模范的方式解决了语言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个欧洲国家。在瑞士，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始终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之间的对立也不像别的国家那样明显。尽管国内相对安宁，但如上所述，在瑞士也讨论过，是否能够和应该采用独裁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危机问题。

不管怎样，从1930年起汇聚在一个名为“新阵线”的讨论

会中的苏黎世大学的各方面师生得出这一结果。为了把这些认识化为政治实践并使其成为现实，1930年秋天，“新阵线”的一个成员汉斯·冯威建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叫“民族阵线”，出版自己的具有民族主义、反民主和反犹太主义倾向和目标的刊物。从在这份名为《铁扫帚》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可以明白，“民族阵线”的成员日益受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33年春在瑞士说德语的其他城市也成立了各种阵线以后，1933年4月，“新阵线”和“民族阵线”就联合成为一个政党，该党在思想意识和组织方面都明显表现出受到民族社会主义这一样板的影响。

瑞士的阵线主义树立了一种反布尔什维主义、反犹太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民主的目标，把被视为辉煌和值得恢复的中世纪时期奉为楷模，以狂热而反动的方式颂扬民族、家乡、等级和土地的概念和价值。在阵线运动的组织建设，人们也按照德国的范例行事。各阵线都有穿着制服的队伍，名叫“前卫军”，其成员必须有“雅利安人”血统，成员间用古瑞士语“Haarua”招呼。甚至在各企业建立基层组织设立了党的法庭。尽管公开宣布了领袖原则，但按地方小组和大区分部划分的党没有能够克服和消除党领导层之间一再出现的冲突。最初该党甚至由3名领袖，其中两人是“新阵线”的，另一人是“民族阵线”的。

在宣传方面，他们也采用法西斯方式。这表现在有时由“大区党代会”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以及对政敌进行暴力斗争。这些宣传活动起初取得了一定的、但只是相对的成果。1933年9月在苏黎世地方选举中，“民族阵线”在市议会的

125个议席中获得10个。1935年4月，在苏黎世州选举中从总共180个议席中获得6个。这时据说“民族阵线”有一万名成员，绝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如果考虑到在1935年秋天选举中成为国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的瑞士社会民主党拥有约五万党员，那么就可以明白，阵线党已经成为一种必须认真对待的政治运动了。

然而，从1935年夏天开始，显然出现了一种下降趋势。在讲德语的瑞士的几个城市的工人区发生了各种暴力斗争之后，警方就果断地对“新阵线”进行干预了。政府取缔了青年组织和“前卫军”穿制服，包括运动所用的灰色衬衫。1934年2月，德国冲锋队的瑞士配对物在苏黎世州甚至全部被取缔和解散。瑞士公众也对阵线主义采取一种日益否定的态度，把它看作是“非瑞士的”、从外国输入的现象。阵线党徒然地试图阻挡清晰可见的下降趋势。它们进一步抓紧组织建设，同在瑞士法语区活动的法西斯“民族联盟”达成协议，双方承担义务只在瑞士德语区活动。然而，一切划定界线和重新组织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在1935年国民院选举中，阵线党只在苏黎世得到唯一的一个议席。在1938年3月苏黎世的地方选举和1939年3月的州选举中，“民族阵线”失去了至今获得的所有议席。此外，1936年起，党内发生十分激烈的斗争，导致分裂为一个温和的“联邦社会工人党”和一个激进的“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忠诚弟兄同盟”。然而，这两个组织仍然不起任何作用。1940年2月间，在此期间取得阵线运动的一个并非公认的领导地位的罗伯特·托布勒被捕以后，这个党就基本上解散了。两个后继的组织——“联邦统一党”和

“民族共同体”始终是无足轻重的小组织，最多只有3000名党员。不管怎么说，“民族共同体”也能争取到一些工人，这是阵线党从来没有能做到的。阵线运动的后继小组织于1943年秋天最终被政府取缔和解散了。

1933年，许多观察家所期望和担心的“阵线党的春天”没有到来。阵线党可能出现的兴旺被民主力量，特别是被社会民主党和政府的坚决抵抗扼杀了。政府还颁布了制服和集会禁令，对瑞士法西斯分子的宣传进行了干预。法西斯分子在瑞士公众中也遭到日益激烈的批判。这时，除了民主动机外，民族动机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人们主要谴责阵线党“非瑞士”地模仿外国的样板。两次大战期间欧洲其余更加无足轻重的法西斯运动也遭到类似的命运。

第7节 居于派别和叛国党之间的 挪威民族统一党

挪威的法西斯党在选举中所得票数从未超过总票数的2%^①。直到德军袭击挪威时为止，“民族统一党”始终是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法西斯主义派别。1940年9月25日，当德国“国家专员”特尔波文宣布“民族统一党”为挪威唯一合法的政党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维德昆·吉斯林领导下，当时有57000名党员——这个数字多于该党任何时候所争取到的选民数——的“民族统一党”成为挪威居于领导地位的叛国党，始终依赖德国占领军。因此，挪威的“民族统一党”既可以算作法西斯主义派别，也可以算作“模棱两可的情况”，下

一节将对这种特别难以区分的“情况”加以叙述。

其他大多数法西斯主义运动是由在该国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名望的人物——墨索里尼、普里莫·德里维拉、多里奥和莫斯利在这方面是例外——建立的，而维德昆·吉斯林在创立他的法西斯主义统一运动时已是一位著名而又有争议的政治家。吉斯林在俄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先任挪威武官，后来从事红十字会的救济工作，任南森*的助手。他回挪威后参加了1921年建立的“农民党”。1931年5月至1933年3月，“农民党”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时，吉斯林出任国防部长。但1933年挪威工人党在选举中获胜后，这个政府不得不下台。

于是，先前就猛烈攻击工人党的吉斯林试图争取“农民党”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做自己的民族统一党的基础。但是，这一企图没有得逞。“农民党”反而同工人党接近，终于在1935年同工人党组成政府，吉斯林又试图争取“民族自由党人”和受法西斯意大利榜样影响的、极右的“祖国同盟”，也遭到失败。在同“农民援助组织”的谈判也没有取得成果之后，吉斯林只能把三个较小的法西斯团体（其成员几乎全是大学生）吸收到他的民族统一党里来。这样，吉斯林建立反社会主义的大统一运动的企图就没有得逞。

吉斯林的思想特征是不可思议地力图把民主、民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糅合在一起，后来也很少有人赞同他的这种设想。虽然吉斯林不知疲倦地宣传他喜爱的思想（“没有共产

* 弗理德希奥夫·南森（1861—1930年），挪威北极探险家、政治活动家，1920年起为挪威驻国联代表团团长，后长期从事遣返和救济难民工作。——译者注

主义的苏维埃”），但是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倚仗日益明显：民族统一党按照德国模式建立了一个准军事组织名叫希尔德（Hird）* 和一个青年组织“青年希尔德”。在企业建立支部的计划未能实现，尤其是因为民族统一党基本上放弃了假社会主义的要求。然而，尽管树立了民族主义、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和——起初温和的——反犹太主义的目标，民族统一党在争取选民方面仍几乎没有取得成就。

在1933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该党得到2.2%的选票，连一个议席所需的百分比都没有达到。1934年10月间的地方选举只得1.5%的选票，1936年的议会选举获得1.8%的选票。在1937年的地方选举中，选票百分比下降到0.06%。

更仔细分析一下1933年的选举（民族统一党曾在29个选区中的17个选区竞选）得知，该党在北部，与苏联交界的北部地区和挪威东部农业地区的力量特别“强大”。在挪威东部的这种相对的竞选胜利可以用这一事实进行解释：在这些农民的文化传统基本上未被削弱的地区，纳粹德国的血统和土地思想的挪威表达方式（挪威文，“heim og oett”，意为乡土和家庭）得到了一定的响应。加之，经济危机在这个多少靠出口生活的地区的影响很大。此外，民族统一党在这里还可以利用富农和小农以及农业工人之间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导致受共产党影响的、力量相当强大的工会的活动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相反，民族统一党在挪威西部的力量很弱，在部分地区根本没有什么支持者，因为这里没有较大的社会

* 和睦、友爱之意。——译者注

矛盾，分散居住的农民笃信宗教，对民族统一党的民族主义宣传（诺曼人*崇拜）视为异端而予以拒绝。此外，由于传统的原因并且受到民主思想影响，他们终于害怕外国势力通过奥斯陆中央政府日渐增强，这种恐惧导致吉斯林的大多出生在奥斯陆地区的使者遭到强烈的反对。

总的说来，民族统一党及其种族主义思想遭到严重失败的原因可以归之于下述因素：1905年，挪威虽然才脱离了同瑞典的联盟获得独立，但是尽管很晚建立民族国家，并没有产生一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否则吉斯林就可以利用他的宣传同这种民族主义挂上钩，同瑞典的边界问题和同丹麦围绕统治格陵兰岛问题的争端就可能很快得到解决。不存在少数民族问题的原因是，拉普人（萨阿米人）还没有产生特殊的民族意识。由于1930年整个挪威只有1359名犹太人，到1940年为止只接收了500名犹太逃亡者，所以民族统一党的反犹太主义也找不到市场。与此类似，挪威法西斯党的反民主目标也找不到接触点。19世纪80年代挪威就开始实行议会制。1898年挪威实行男子的普遍选举权，1913年妇女也获得选举权。

挪威的工人党也已成为受到普遍赞颂的议会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0年代初期，挪威的社会主义者还很激进，因而参加了共产国际。可是1927年，占多数的左派和人数少的右派（他们1921年创立了一个挪威社会民主党）实行了联合。重新联合的挪威工人党推行明显的改良主义政策，

* 公元8至11世纪期间自北欧日德兰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原居地向欧洲大陆各国进行掠夺性和商业性远征的日耳曼人。——译者注

而共产党仍然很小，无足轻重。1928年，挪威工人党就曾组成政府，1931年又被推翻。如上所述，1935年，工人党与农民党结成联盟。这一联合成功地克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42%有组织的工人失业——同时开始建设一个社会福利国家。虽然这样做必须增加税收，但是在野的保守党一如既往，不愿与吉斯林合作。

在挪威被德军占领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相反，同德国占领军勾结的民族统一党遭到了绝大多数挪威人民几乎一致的反对，尽管这个法西斯党还是能够网罗了占挪威人口1.8%的57000名党员，有些雇员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参加该党是出于物质原因，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入党是因为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德国人完全控制这个国家，然而在这个1940年以前纯粹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党内，工人的比例也上升到30%以上，因此在德军占领时期，民族统一党发展成为一个各阶级的党。可是，社会结构和党员人数（1943年开始明显减少）并不能充分说明民族统一党的性质。它成了德国占领军的一个傀儡机构。因此出现了这一问题：这个1940年以后在政治职能方面发生了基本变化的党究竟还能不能归入那些拥有独立地位的法西斯政党之列？一个基本上独立的法西斯党和一个“叛国党”之间的区分同道义上的评价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即使“只”涉及到一个叛国党，对1945年被处死的吉斯林和被判长期监禁的他的同党的任何同情都是不恰当的。对下面一节论述的“模棱两可的情况”的判断与此类似。在这里不可把必要的区分理解为企图用某种方式“提高这些政权的价值”。

第8节 模棱两可的情况：斯洛伐克、 波兰和葡萄牙

当代许多观察家和一些研究人员把1939年3月成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德国“保护”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称之为“教会—法西斯主义”专政，并把它与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政权或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国家等量齐观并进行比较^④。为了考查这一论点的真实成分，简单地探讨一下1918年以后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以及它的斯洛伐克部分的历史是可取的。

1918年10月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和波兰人几个少数民族以外，斯洛伐克也对中央政府持反对态度，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自己所要求的自治权。然而，1918年12月由天主教神父安德烈·赫林卡建立的、由半数以上的斯洛伐克人选举和支持的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党”于1926年参加了一个所谓“全民族的联合政府”，参加这个联合政府的除捷克的政党以外，还有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政党。

但是，在“斯洛伐克人民党”的领导成员、曾建立准军事组织“卫国军”的沃特赫·图卡由于叛国罪被判5年徒刑后，“斯洛伐克人民党”又退出了这个“全民族联合政府”。1933年8月，赫林卡神父在举行庆祝斯洛伐克皈依基督教1100周年（比捷克人早100年！）的活动时，坚决主张斯洛伐克自治，此后捷克政党就不再打算妥协了。但是看来捷克的领导政党——民族民主党人和大地主——对1925年由加伊达将军所

创建的“法西斯主义者团体”有所顾忌，这个组织树立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德和反犹太的目标，但它在选举中最多只获得过6个议席。

后来“斯洛伐克人民党”和“苏台德德意志人党”间接和直接地走到一起来了，后者原名“苏台德德意志人祖国阵线”，在康拉德·亨莱因领导下事实上已经成了德国纳粹党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台德区被第三帝国吞并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同意和解，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改组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只有外交、国防和财政三方面的政策由布拉格中央政府操纵，而接替1938年去世的赫林卡的职位的约瑟夫·蒂索实际上以独立自主的斯洛伐克总理的身份对该地区进行统治。1939年3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命令蒂索政府下台，解散接替“卫国军”的所谓“赫林卡卫队”。于是，蒂索被召往柏林，受希特勒怂恿，宣布斯洛伐克独立，接着就是所谓“摧毁捷克的剩余部分”，1939年3月16日宣布成立“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而靠希特勒的恩典成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则必须于1939年3月18日同德国缔结一项保护条约。虽然有一些国家，其中也包括瑞士、波兰和苏联承认这个新“国家”，但斯洛伐克共和国始终是一个依附于德国的卫星国，起先它虽未被德军占领，但它的外交和内政基本上受希特勒和德国“顾问”的影响并由他们决定。仍为国家元首的蒂索虽然比吉斯林有较多的权力，但斯洛伐克严重依赖于德国，因此难以把现在建立的独裁政权看作是独立的“教会法西斯主义”专政。而且还有其它一些内政因素也表明它不具备这种性质。

在该国所有其他政党被取缔和解散以后，图卡和萨诺·马赫领导的“赫林卡卫队”是唯一的政治组织，它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这是没有争议的。参加这个组织的，除了斯洛伐克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失意潦倒者以外，还有一些年轻的神职人员，他们追求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目标。在他们的宣传部长萨诺·马赫的推动下，1939年4月18日就以德国为榜样，颁布了一个具有很大限制性的反犹太人法，但没有把这项法律用于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虽然图卡终于当上总理，马赫当上内政部长，但是蒂索可以以总统的身分施加温和的影响。他在内政方面依靠对教育和立法影响很大的天主教会。激进的“赫林卡卫队”一再反对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影响，对此还得到党卫队的支持，但是希特勒出于强权政治的动机抓住蒂索不放，后者奉行一种严厉的独裁政策，除遭到迫害、甚至驱逐的犹太人外，新教徒、东正教徒和基督教派的信徒也深受其害。“赫林卡卫队”的影响很大，但最终并未掌权，所以蒂索政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受教会影响的专制独裁，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德国。

因此不能把斯洛伐克的附属政权称之为法西斯专政并把它与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国家等量齐观。在克罗地亚，法西斯党得到德国和天主教会的同意，进行统治，而蒂索却能在天主教会和第三帝国的支持下，基本上阻止法西斯主义的“赫林卡卫队”掌权。

1944年8月28日爆发、同年10月28日由于德军干涉才结束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失败以后，斯洛伐克成了一个被德国占领并完全由德国统治的国家。尽管有两万名士兵和2500名

游击队员参加了起义，但斯洛伐克人终于没有能够在没有外国支持的情况下推翻蒂索的独裁的附庸政权。

波兰的毕苏斯基政权也被一些研究者和许多同时代人列为法西斯政权^⑧。在这个判断上，共产国际的研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同托洛茨基、像塔尔海默尔这样的反对派共产党人、甚至同博尔克瑙和古尔兰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是一致的，虽然共产党人同时也用毕苏斯基政权来说明他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点，因为这个“法西斯分子”原先是社会党人、在1926年5月的政变中曾得到波兰社会党人的支持。1945年以后，无论在苏联还是在波兰都没有修正党这方面的正式解释，而是简单地不声不响。但是这一事实还起作用，即这个被确定为法西斯党的波兰政党的领导人在1945年以后却在波兰党和国家机关担任一个重要职位。这是指忠于毕苏斯基政权的天主教和平组织领导人博莱斯拉夫·皮阿塞茨基。但是在对他和他的“民族激进阵营波兰加”探讨之前，应首先考证一下是否真能把毕苏斯基政权纳入法西斯政权。

1918年10月16日，即德国还未最终失败以前宣布成立的波兰共和国的存在应该归功于一种“机遇”，即瓜分波兰的三个强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都卷入了一场使他们遭到失败的战争。新波兰国家的边界不仅由凡尔赛和平会议确定，因为在1919年6月28日签订凡尔赛条约之前和以后，新成立的波兰军队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制造了既成事实。不仅对1920年10月21日波兰三次起义后被分开的上西里西亚来说是如此（虽然在1920年3月20日的公民投票时，60%的上西里西亚人赞成德国），而且对在东部并吞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和取得1921年3月18日苏联在里加和约中放弃的乌克兰和白鲁特尼亚的领土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之前发生了俄波战争，它于1920年4月以波兰军队挺进基辅开始、以1920年8月兵临华沙城下的红军的彻底失败告终。

这一胜利是约瑟夫·毕苏斯基的业绩，他于1919年2月20日担任军队的总司令和国家元首。在他的竞争者罗曼·德莫夫斯基的“民族民主党”在1922年11月5日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以后，毕苏斯基暂时退出政坛。然而，波兰的不稳定的议会制度——1921年9月至1922年12月之间至少有过四届政府——表明不能解决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经济和内政问题。其中首推没有得到解决的、迫切的农业问题，已经宣布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只在波兰中央和西部地区实行，而没有在东部地区实行，因为在东部没有剥夺统治乌克兰和白鲁特尼亚农民的波兰大地主的财产。其原因主要在于波兰的民族纠纷，波兰居民中有31%（也许有40%）以上不是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白鲁特尼亚人占总人口的25%，犹太人占12%，德意志人占3%。虽然波兰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承担了保证每个民族按规定得到保护的义务，但它对德意志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和白鲁特尼亚人却采取日益激烈的波兰化政策。

1926年5月12日，毕苏斯基发动政变。这一政变造成许多人伤亡，但却得到波兰社会党人的支持，并得到弱小的波兰共产党的默认。毕苏斯基提出了“整顿”波兰民主制度的要求，因为这一制度由于个别党派采取不肯谅解的态度不再能够发挥作用。毕苏斯基建立了起初还算温和的“道义专政”。各党派没有被取缔，1928年还举行了自由选举，以民族民主

党的惨败而告终。它只得到37个议席（以前是100个议席），而农民党得了21席（以前是53席），社会党的议席由41个增加到63个。1929年10月，左派和中派政党结成联盟（中央党），该联盟拥有180个议席在斯埃姆*中为多数派。毕苏斯基总共逮捕了这个联盟的88名议员，投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这些人在那里受到折磨和刑讯。毕苏斯基就用这种办法结束了政府同反对党控制的议会之间发生的斗争。这种恐吓政策取得了效果。在1930年11月16日举行的“选举”中，许多反对派议员没有当上候选人或者其活动受到限制，因此政府同盟从总共444个议席获得243席。1935年1月终于颁布了一个新宪法，议会民主制被彻底废除，代之以完全由毕苏斯基个人独裁的，但并非是法西斯主义的军人专政。

这种情况在1935年5月12日毕苏斯基去世后也未改变。不过，至今的政府同盟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实际上已经解散了。替代它的是亚当·科茨上校创建的“民族团结阵营”，它在思想和组织方面明显受法西斯主义样板影响。然而“民族团结阵营”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党和统一党，而遭到另一个法西斯党的激烈反对。

这是指上面已经提到的“民族激进阵营法兰加”，它是在博莱斯拉夫·皮阿塞茨基领导下由民族民主党的青年组织建成的。在毕苏斯基政变前民族民主党就已经明显地把法西斯意大利奉为楷模，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政治甚至物质方面的支持。皮阿塞茨基的“民族激进阵营法兰加”的宗旨是极端民族

* 波兰议会。——译者注

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特殊的教权主义。其成员主要是大学生，对波兰的犹太公民进行种种侵害。然而皮阿塞茨基的党遭到独裁的最高国家领导和“民族团结阵营”的迫害和反对。

虽然“民族激进阵营法兰加”和亚当·科茨的“民族团结阵营”在思想和组织方面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但是这两个法西斯党的领导成员并没有同德国占领军相互勾结。纳粹分子几乎没有发现（尽管他们想这样）波兰内奸，碰到的却是被用极端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的日益激烈的人民的反抗。总共三千万波兰人中有五百万人成了具有政治倾向和种族主义倾向的民族社会主义恐怖行动的牺牲品。

由毕苏斯基及其后继者建立的统治制度，同西班牙的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政权和南斯拉夫及罗马尼亚的国王专政相似，不属于法西斯专政之列，因为它不依靠一个群众性的法西斯党，与其说追求特殊的法西斯目的，还不如说以独裁为宗旨。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诸国的专政与此相似，一些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著作家也把它们划为法西斯专政。在这方面，苏联的外交动机和利益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主权国在1940年夏天根据希特勒—斯大林协定被强制并入苏联以前，只得到苏联勉强承认。

在所有三个共和国，原先建立的议会制被独裁政权所代替^①。立陶宛开了个头，1926年12月17日立陶宛发生政变。在这之前无论是至今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还是人民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都不能组成一个能执政的联合政府。1927年4月12日，迄今的立陶宛总统斯梅托纳宣布自己是“国家领

袖”并最终解散了议会。斯梅托纳几乎完全依靠军人，而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民族党”没有被吸收参加国家管理。斯梅托纳自己创建的、名为“铁狼”的激进民族基干组织也没有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党，因为它的党员人数很少，而且没有一种统一的思想意识。斯梅托纳利用恐怖手段统治这个国家，但在人民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因此，他既不能阻止德国于1939年3月并吞梅梅尔，也不能阻止苏联军队于1940年6月占领这个国家。

在拉脱维亚，议会制是在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才被取消的。前总理乌尔马尼斯建立了独裁政权，它也没有一个群众性的法西斯党。

爱沙尼亚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里“自由战士同盟”发展成为一个反议会的和极端反共的群众性组织，它受到芬兰拉普阿运动的强烈影响。1933年10月，“自由战士”在一次公民投票时提出的新的独裁宪法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72.7%的人投票赞成“自由战士”，反对保留至今的也保证少数民族权利的议会制。但是，由于佩茨总理得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支持而于1934年3月12日宣布紧急状态后，也就没有发生过“自由战士同盟”的“夺权”。不久以后，这个受法西斯样板强烈影响的组织遭到解散和取缔。佩茨获得独裁的全权，并且在没有一个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支持下统治了这个国家。

保加利亚也不像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中所断言的那样，建立了一个“军事法西斯政权”^④。保加利亚与其邻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不同，它无须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由于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它也没有较大的社会问题。尽管如此，

属于占有优势的农民联盟并得到相当强大的共产党宽容的斯塔姆鲍利斯基总产在1920年不仅实行义务劳动制，而且还于1921年5月下令没收所有私人拥有30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的地产。这种农业社会主义在软弱的资产阶级中和军队里激起反抗。1923年6月1日，斯塔姆鲍利斯基被军人发动的政变所推翻，而且不久遭到谋杀。到1934年为止，这个国家由得到农民联盟默认为、资产阶级势力的联合政府统治。这个政府在1923年9月血腥镇压了一次共产党的暴动，但在1934年5月19日被发动政变的军官所推翻。基蒙·格奥尔基埃夫上校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权，但于1935年1月22日又被国王鲍里斯三世的专政所取代。这位实行个人统治的保加利亚国王残酷无情地迫害他在共产党和马其顿的恐怖组织（“国内马其顿革命组织”）队伍里的政敌，但是，因为在保加利亚根本不存在法西斯政党，所以就不能把国王专政看作是法西斯专政。

葡萄牙的情况有所不同，同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相比，它更多地像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那样必须算作“模棱两可的情况”^④。由于葡萄牙的萨拉查政权不同于其他在两次大战期间产生的专政，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时代”结束后仍然存在，因此理应受到特别重视。与邻近的佛朗哥政权不同，甚至在它的创始人死后，这个政权还存在着八年，因为1971年马塞洛·卡埃塔诺能够继承已故萨拉查的事业，直到1974年4月25日军人政变推翻了由他实行的、只得到少数秘密警察支持的专政。

1910年宣布成立的葡萄牙共和国，未能建立一种稳固的

议会制度。1926年5月，戈梅斯·达·科斯塔将军发动政变彻底废除了议会制。军人政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克服由于国家落后的经济结构和十分困难的国家财政而显露出来的经济危机。科莫布拉大学的经济学和财政学教授奥利韦拉·萨拉查承担了此项任务，他被赋予独断独行的全权，于1928年4月担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由于采取严厉的节约措施，他确实把财政在一定程度上理顺。1932年，萨拉查当上总理，1936年他又兼任了内政、外交、国防三个部的部长。

萨拉查的“新国家”不仅依靠军人，而且也依靠一个名叫“国民同盟”的统一党，该党创建了一个准军事的“葡萄牙军团”和一个青年组织。由鲁劳·普雷托创立的、树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工团主义目标的“完整主义”党的成员必须参加萨拉查的新国家党。普雷托本人已于1934年被捕，流亡国外。“国民同盟”内部的葡萄牙真正的法西斯党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比长枪党的影响还小。虽然萨拉查在30年代也实行协作体组合制（也由采用了完整主义者的一些标记和组织形式的“国民同盟”掌握），但是萨拉查政权几乎完全没有在法西斯国家所见到的那种激进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因素。而且葡萄牙外交政策的特征不是要达到侵略的民族主义目标，而是要达到保守的目标。萨拉查虽然举行了几次公民投票，但是参加的人数大多不到人口的10%，他更多地依靠官僚政治机器和军队的权威，而不是依靠公民投票的赞同。他的目的不是按法西斯

• 天主教的一种极权主义运动，要求一切生活领域都被教会的尺度进行安排。——译者注

主义精神动员民众，而是使民众涣散。因为葡萄牙没有少数民族，共产党又很弱小，萨拉查在执行以缓慢改善经济为目标的独裁政策时，起初几乎没有碰到政敌。

同西班牙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葡萄牙起初也遭到西方世界的孤立和抵制。但1949年，葡萄牙就因它的战略地位被接纳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内。1955年它成了联合国的会员国。由于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进行殖民地战争，葡萄牙在联合国遭到猛烈攻击，而萨拉查及其后继者卡埃塔诺在内政方面日益肃清了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的特征。这个政权终于只依靠官僚和军人中的少数精英，还依靠秘密警察。1974年4月25日，这个初期在思想和组织方面采纳了一些法西斯主义因素的独裁政权就彻底崩溃了。

第 6 章

结束语：在政治和论战中间的新法西斯主义

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权崩溃，“法西斯主义时代”告一结束，但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并未终结^①。依然存在的或者新建的法西斯党中还没有一个能够获得群众基础，或者甚至取得权力。如上所述，1946年以前建立的佛朗哥和萨拉查的政权应该归入独裁政权一类。为了阻止帕潘兹雷乌的左派“中央联盟”在选举中获得所期望的胜利，1967年4月接受任命的希腊最高政权也是如此，据估计发动政变的希腊军官曾得到美国特务机关的支持^②。希腊的军人政务委员会（不久帕帕佐普洛斯在其中得到一个领导职

务)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权。政党被取缔,宪法失效,反对派遭到军人和秘密警察的迫害,对出版物进行严格审查。该政权对外国资本采取热情友好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对希腊经济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帕帕佐普洛斯虽然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领袖思想的因素,但没有建设一个法西斯群众组织。因此,不能把希腊的军人专政看作是法西斯专政。由这个政权支持的一次塞浦路斯政变导致土耳其军队入侵并吞并了土耳其人居住的部分领土,由此可见,这个政权其实是多么虚弱。最高政权不能也不愿决定进行军事干涉,1974年被推翻。

战后时期欧洲的所有法西斯党至今仍然是无足轻重的小党。但是不可低估几乎在西欧所有国家都存在的这些党的意义,因为它们1945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中也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还因为它们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当紧密的接触。然而关于存在和活动着一个“法西斯国际”的报道却是过甚其词。可以肯定,各国的法西斯主义派别在政治和物质方面互相支持,并能非常巧妙地利用这一事实,即各国对散布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观念的处罚规定是大不相同的。因此,例如德国的法西斯分子可以从外国,特别是美国和阿根廷得到很多在联邦德国不允许制作和散布的宣传材料。有的国家已经明令禁止成立法西斯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的组织,但这些法西斯主义派别大多根据法律规定,试图掩盖它们把“典型”法西斯主义奉为楷模的行为。

因此,应该被视为很成问题的“新法西斯主义”概念被新闻界和科学界采用。事实上,战后时期的法西斯党同1945年

以前成立的法西斯党没有什么区别。假如真是这样：假如这些党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显示出新的要素，那就应该为它们尽可能使用另一个新的名称。因为上面已经多次说过，法西斯主义概念是打上历史印记的，受历史限制的，所以只能把那些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明显相似的党看作是法西斯党。如果不考虑这种历史烙印和时间限制，滥用法西斯主义概念，就很容易把这一概念用作单纯的、而且可以替换的咒骂语，这样就会减少和抹煞法西斯主义的特殊的性质和危险性^④。两次大战期间的“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已经为此提供了许多可恶的、政治上有害的例证。

遗憾的是，在范围很广、但大多有政论倾向的文献中许多论述所谓新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在使用法西斯主义概念时，却不加区分，而且没有足够的历史限制。此外，政治上的约束往往导致科学上所必需的客观性的不足。因为不管怎样所谓新法西斯党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只应归入“派别”之列，所以下面只对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重要的组织的历史和结构作简要叙述。

德国抵抗运动虽然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推翻民族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对解放德国人民作出贡献，但是并不是普遍感到战胜希特勒德国就是失败和崩溃。显然广大人民并没有参与第三帝国的已知和到那时还不知道的罪行。然而这种基本的否定态度与其说表现在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上，还不如说表现在“决不再打仗！决不再要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上。与意大利和法国不同，德国没有产生一种广泛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一致性。主要是苏联占领军和由它安插和支

持的共产党的政策对此起了促进作用。共产党日益利用反法西斯主义这个鼓动性的概念,使其政党的、绝非都有反法西斯内容的目标合法化。一方面虽然并非所有有关的地主和工业主都是法西斯分子,却把剥夺大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说成是“反法西斯的”,另一方面,由于纯强权政治的原因排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取消民主权利,在许多德国人眼里,反法西斯主义这一政治斗争概念完全变成了共产党的宣传用语。民主德国占有并肆无忌惮地利用所谓“反法西斯遗产”,这些行动通过把围墙妄誉为“反法西斯壁垒”的既愚蠢又野蛮的尝试而达到了顶峰^④。

然而,西方占领军的政策也促使起初肯定存在的反法西斯基本潮流日益退居到无关紧要的地位。这表现在取缔超然于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外的、自动产生的“反法西斯委员会”,还表现在在美、英占领区用官僚主义的、但不见得恰当和有效的方法实行非纳粹化^⑤。绝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在纽伦堡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给第三帝国罪恶的主要责任者处以适当的刑罚是完全合理的行动,而法庭和非纳粹化委员会的、伴随着告密和刺探的活动却日益遭到许多德国人的批评,他们不无道理地想起了“放走大盗,吊死喽啰”这样一句谚语^⑥。尽管如此,对事实上分裂德国的这种不满和失望情绪并不表现为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的意识。

194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几个较小的右派激进党(其中“德国右翼党”在思想意识方面明显有法西斯主义倾向)总共只获得总票数的5.7%。相反,一个从“德国右翼党”分裂出来、1949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却能在1951年下萨克森

州议会选举中获11%的选票，在不来梅市议会选举中得7.7%的选票。该党几乎完全由前民族社会主义者组成，他们对非纳粹化措施感到愤恨，不愿改变自己至今的政治立场。“社会主义国家党”因其反民主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称之为“人民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目标，明显受到民族社会主义样板的影响，并且还从那里接受了领袖原则。1952年10月23日，已经面临解散的“社会主义国家党”被联邦宪法法院取缔。

这一判决促使所有其他右派政党尽可能避免过分明显地效法民族社会主义。其中1949年改称“德国国家党”的“德国右翼党”尤其如此。该党纲领规定建立一种协作体组合的社会制度，它虽然也受到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和反民主思想影响，但却避免激烈反对议会制和使用明显反犹太主义的语言。然而，在得过高级勋章的空军军官鲁德尔的领导下，该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栏架。它获得的票数1953年为1.1%，1957年为1%，1961年只有0.8%。不过，它的代表一度进入下萨克森州议会，同自由民主党和“被驱逐者和被剥夺权利者同盟”一起组成一个党团。

德国国家党的彻底失败表明，50年代联邦德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出奇地巩固。同时迅速而有效的经济建设以及下列事实也起了良好作用，即尽管开始困难重重，却能够极快地而且意外顺利地把逃亡者融为一体。政党方面也是如此，因为极端右倾的、但并非法西斯主义的“被驱逐者和被剥夺权利者同盟”只能把逃亡者选票的极小部分争取到自己这边来，而且不久就减少到微不足道的程度。然而，1964年作为各右派团体和相当明显的民族社会主义团体的联合组织而建立的

“德国民族民主党”却能在很短时间内由完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升，并在选举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67年该党就有党员28000人。1966年至1968年之间在黑森的州议会选举中得7.9%的选票，在巴伐利亚得7.4%，莱茵兰-法尔茨得6.9%，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得5.8%，下萨克森得7%，不来梅得8.8%，在巴登-符腾堡甚至获得9.8%的选票。1969年的联邦议会选举时，德国民族民主党出于意外地未能获得5%以上的选票——只得到第二轮选票的4.3%——，此后该党的影响迅速下降。1970年它只剩下21000名党员，1976年又降为9700名。1970年和1971年的州议会选举中，它最多只得到所投票数的3%。1972年联邦议会选举时，它得票的份额已经又降到0.6%^①。

德国民族民主党的暂时兴旺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使人担心历史重演，担心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必须为经济问题作斗争的联邦德国可能经受与魏玛共和国相似的命运。这种担忧不仅决定了坚决反对德国民族民主党并与之作斗争的民主党派的态度，而且也决定了许多对该党结构和纲领的政论性和科学性的论述。同时有一点常常被人忽略了，那就是德国民族民主党想方设法尽可能把自己的反民主和亲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伪装起来，因为它想绝对防止党被取缔。虽然它表示拥护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但是不能也不愿放弃民族主义的、独裁的见解。反之：在它的评述中几乎看不到它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另一方面，它坚决反对“外籍工人”继续移居和滞留，在这件事上敌视外国的和甚至种族主义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总起来说，这个党（它的全部领导人和

半数党员是从前的纳粹党员)虽然口头上拥护民主,而在思想意识方面受到民族社会主义样板的强烈影响。然而,法西斯党的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领袖原则却基本上没有实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党内经常争论,终于导致从来没有争议的党的主席阿道夫·冯·塔登于1971年引退。然而,他的继任者也不能遏制党的衰落进程。其结果是,德国民族民主党分裂成几个小党,并成立了几个新组织,这些新组织比德国民族民主党更明显地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而在德国民族民主党内,这一点一直是有争议的。

这些组织有:1972年由德国民族民主党巴伐利亚州主席西格弗里德·珀尔曼创立的“新右派行动”,后来这个党又分裂为更小的组织,到1983年,这些组织显然已经解散了^⑥。与德国民族民主党不同,这些在人数上无足轻重的小党的党员主要是青年一代人。他们大多来自德国民族民主党的青年组织“青年民族民主党人”和各种青年团体,如1948年就已建立的“诺曼青年”、“爱国青年同盟”、“汉撒自由团”等等,它们明显地把第三帝国奉为楷模,特别信奉希特勒青年团。与德国民族民主党不同,所谓新右派的组织的成员也准备在同政敌斗争中使用暴力。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右派同有中立主义和民族革命倾向的团体保持接触,这些团体有些在40年代和50年代就已成立,但未引起公众的重视。

属于上述组织的还有1956年由奥托·施特拉塞创立的“德意志社会联盟”,施特拉塞从逃亡中回来后,又在他1930年停止活动的地方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宣传所谓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还有1949年就由奥古斯特·豪斯莱特尔建立的

“德意志共同体”除了民族主义和反民主思想外也追求某种假社会主义和中立主义的思想^⑧。豪斯莱特尔在第三帝国就因发表宣传民族社会主义的文章而出人头地，1945年以后暂时参加了基督教社会联盟。此外，他与奥托·施特拉塞相似，同保守革命，特别是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但并不是民族社会主义的“青年德意志骑士团”的思想意识有了联系。豪斯莱特尔正是从“青年德意志骑士团”接受了所谓“邻里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国家和社会不应自政党和社会团体，而是应以可以洞察的小“邻里”的形式组织。1966年，豪斯莱特尔把他的“德意志共同体”和其他更小的右派团体合并为“独立德意志人行动联盟”，70年代，由于公民的主动积极性提高，他认为自己的“邻里思想”得到了证实。他试图同环境保护人员和绿党党员发生接触，结果如愿以偿。1979年他带着“独立德意志人行动联盟”参加了“绿党”，并任该党的第一副主席，直到他退出为止。

豪斯莱特尔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在一些州的绿党领导机关（尤其在下萨克森）里有一些人是过去的纳粹党、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其他受民族社会主义影响的组织的成员^⑨。当然，这些“褐色斑点”不足以把绿党挤进右角（在论战中常有这种意图）。不管怎样，绿党的领导成员肆无忌惮地同那些明显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个人和团体在思想甚至组织上保持接触，总是令人惊愕和值得注意的。这首先是指一度担任绿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主席的巴尔杜·施普林格曼，他至少短时间同论所谓“奥斯威辛谎言”的煽动性文章的作者蒂斯·克里斯托费森在事务上和政治上进行合作。再重复一遍，

当然不可把这种不久就结束的绿党和“褐党”之间的接触视为联邦共和国的新反对党的一种法西斯主义定向的证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些圈子里，对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和作用方式提出了应认真看待的、效果很大的批评。罗伯特·容克认为，新发展的原子技术多少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制度的灭亡或兴起。这一论点令人不愉快地想起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关于“西方的没落”的想象，这种言论使魏玛共和国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损害。相反，起初担任过绿党领导工作的赫伯特·格鲁尔公开发表这种论点：只有一个独裁国家才能解决环境问题^①。

对民主的这种老的和新的批评，公众不甚重视，而几个战斗的法西斯小团体的行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虽然这些小团体通常只有二、三百个成员^②。这是指曼弗雷德·勒德尔律师（在此期间被捕判刑）的“德国市民促进会”、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蒂斯·克里斯托费森的“市民和农民促进会”、埃尔温·舍恩博恩的“德国士兵战斗同盟”、米夏埃尔·屈能（在此期间受到法律上有效的判决）的“民族社会主义者行动阵线”、“霍夫曼国防体育组织”（在此期间被解散和取缔）和其他类似小团体。这些和另一些像雨后春笋一样滋生出来的团体在人数方面完全无足轻重。在国内外受到重视的“民族社会主义者行动阵线”的成员也不到20名。然而由于有两方面的原因，它们是值得重视的，而且也是危险的。第一，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几乎专门从战后一代中，尤其是从青年人中招募党员；第二，因为它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恐怖手段，同时它们显然受到外国法西斯小党的训练，并得到它们

的支持。

一些外国的法西斯主义党派和团体甚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活动。依然存在的“乌斯塔莎”的成员就是这样。它在联邦共和国内或从联邦共和国出发，进行反对南斯拉夫国家的恐怖斗争，而南斯拉夫的特工人员也在联邦共和国内对“乌斯塔莎”成员采取恐怖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党”及其恐怖组织“灰狼”的行动。该党是1969年由阿尔帕斯兰·蒂尔凯什（真名：侯赛因·费伊祖拉）建立的，因其极端民族主义（大土耳其主义）、反民主、反共和伪装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反犹太主义目标被明确认为是法西斯主义政党。1975年至1977年蒂尔凯什在代米雷尔政府中任部长，1977年甚至担任了副总理。在1977年6月的选举中，民族主义运动党获所投票数的6.4%，议员人数由4名增加到16名。起初代米雷尔能够组织一个又有民族主义运动党参加的政府。然而，在社会民主党人比伦特·埃杰维特于1978年初接管政府以后，“灰狼”于1978年11月在土耳其遭到取缔。但这并不妨碍“灰狼”在土耳其建立现在的军人专政以前，继续对其左派政敌和库尔德少数民族进行恐怖行动。在联邦共和国的土耳其工人中也有民族主义运动党的党员和拥护者。在“灰狼”——在土耳其已被取缔！——暂时能够完全公开地举行党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以后，一段时间以来他们试图采取建立土耳其文化协会或渗透现有的协会的办法，把自己导致与倾向左派的土耳其人发生种种冲突的行动伪装起来。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的这个外国法西斯党的人数的具体报告做不出来，因为到目前为止负责的政治家和宪法保卫部门还没有

提供。关于国内外法西斯分子进行接触的报道也未能得到证实^④。

法西斯主义的“灰狼”分子同倾向左派的土耳其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争斗值得重视而且也很危险，因为这样就加深了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已被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宣传所利用的外国人问题是否会促进至今在人数上和政治上都无足轻重的法西斯派别的发展，今天还不能断言。虽然关于激进右派和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概念大多没有明显区分）的潜力的各种民意调查的结果应该被看作是有问题的，但是毫无疑问，新的少数民族——从前的“外籍工人”确实变成了移民——引起了敌视外国人的情绪，这种情绪发展成为对联邦共和国至今起稳定作用的民主协调的威胁^⑤。

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党也未能再次获得群众基础^⑥。不过，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比他们的德国同志强大和危险。如上所述，虽然意大利的抵抗运动比德国的抵抗运动取得的成效大得多，而且意大利有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但是1945年就已经产生了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抗议运动。这是指作家古列莫·贾尼尼的所谓“不关心政治主义”，贾尼尼出版一份报纸，名叫《每个人》，他的短命的抗议运动就是按照这份报纸命名的。这个运动主要在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南部开展，主要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

1946年12月由萨洛共和国*前副国务秘书焦尔·焦·阿尔

* 指1943年9月墨索里尼被德国伞兵劫走后，在意大利北部的萨洛建立的所谓“社会共和国”。——译者注

米朗泰建立的法西斯统一党与“典型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它的重点地区也是在意大利南部。参加“意大利社会运动”的主要是前墨索里尼的党徒。这一点以及不加批判地颂扬法西斯政权、特别是萨洛共和国表明了这个运动具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性质。尽管遭到官方取缔，但该党并未解散。在选举中它只得到6%的选票，能把24名议员送进了议会。60年代初，甚至有许多迹象表明，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可能不顾自己的反法西斯传统和宣言准备接受“意大利社会运动”加入政府，以阻止一个左派的联合。然而，终于形成了一种虽不稳固、但在经济方面却有成效的“中左政策”。因此“意大利社会运动”仍然无足轻重，虽然它经常占有议席。

从在议会范围内采取行动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分裂出像“新社团”这样的非法法西斯恐怖组织，它们追求“紧张的战略”，同时它们想利用恐怖袭击制造一种恐惧和恫吓的气氛，后来这种气氛被“议会法西斯主义”所利用。70年代头几年，这一策略似乎取得了成果。在进行了种种恐怖行动以及1970年在勒佐·卡拉布里亚发生了真正的人民起义以后，“意大利社会运动”在1972年选举中得到总票数的8.9%和55个议席。虽然国内政治气氛由于来自右和左两方面的其他恐怖活动而升温，但是“意大利社会运动”在1976年选举中得票份额却下降到总票数的6.1%，只有35名新法西斯主义者进入议会。这次“失败”导致1976年分裂出一个自称为右派保守的团体，严格反对议会外法西斯主义的恐怖活动。但是，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过去和现在都还没有就此而结束。

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也成立了“新法西斯主义”派别，虽然或者正因为法国人对卖国贼和法西斯分子进行了非常残酷的、直至动用私刑的审判^⑩。仍然存在的法西斯小团体起初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在法国由于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陷入严重政治危机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危机首先被1953年就已建立的“保卫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所利用，人们大多按照这个由抗税产生的运动的创始人普热德的名字称它的成员为普热德分子。他们的议员几乎全都来自法国南部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在1958年的选举中总还获得52个议席。除了中产阶级的特殊要求以外，它还具有民族主义、反议会、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倾向。尽管如此，普热德主义的核心仍然是不久就又瓦解的反现代主义的抗议运动。

与基本上放弃使用暴力的普热德分子不同，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的一些组织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恐怖主义性质。其中主要有“秘密军队组织”，该组织不久不仅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而且也反对一些法国政治家，它谴责这些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太好说话。虽然“秘密军队组织”保留着恐怖组织的性质，但它因其极端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民主的目标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同法西斯主义一致。但是它在政治和议会方面没有得到重要地位，因为它遭到1958年掌权的戴高乐的强烈反对，最终被粉碎。

由1966年5月以来聚集在“考察研究组织”中的一些人是否会组成一个法西斯党，今天还不得而知。得到《费加罗报》的老板罗贝尔·埃尔桑支持的这个集团是有趣的，值得重视

的，因为这里的学习班和研究班试图以一种新的、“机智科学”的方式论证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思想，并使之登上大雅之堂。

在美国，起初莫斯利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似乎被战争和“大屠杀”的经验全盘否定了^①。但是这里也有一些法西斯主义的小团体，1967年联合成为“民族阵线”。“民族阵线”倡导一种显然以法西斯主义样板为增模的，所谓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它具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的宣传鼓动的中心是要求立即停止联邦有色人种成员的迁入。据它论证，只有立刻强迫尽可能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黑人移民再次流亡，不列颠的白人文化才能得到维护。1969年的选举中，“民族阵线”获得19万张选票，只占总票数的0.6%。但在几个工业地区，特别在伦敦东区，它的选票份额几乎达到20%。它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投票和支持，其中工人和受教育不多的青年人占了很大比重。虽然“民族阵线”从1979—1980年以来似乎又分裂成几个更小的组织，但是，它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的排外要求也被当时颇有声望的保守党议员伊诺克·鲍威尔所接受，他也要求立即停止有色人种移居英国。看来 英国的排外活动是一个问题，其政治危害性是不可低估的。

关于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所谓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结构的概况表明，到目前为止，这些法西斯政党中还没有一个党能够拥有群众基础。关于法西斯主义恰恰在当今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在这期间英国的失业人数超过30年代达到的最高峰——出现的种种警告是没有道理的。英

国、法国乃至意大利和德国的民主制度确实或者看来比之两次大战期间更为稳定和巩固。然而也不可低估这些“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危险。

综述：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

正如种种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和结构的概览所示，开头提出的问题：能否坚持一种普遍的法西斯主义概念？应该作一个有限制的肯定回答。在表现形式、思想意识、目标和政治策略方面，它们有很多共同点。

分析法西斯党显示出一种可比的表现形式。它们按领袖原则划分等级，拥有身穿制服、配备武器的队伍，使用一种当时新鲜而特殊的政治方式。这是指群众大会、群众列队行进、强调党的男子汉和青年的性质、某种世俗化的宗教虔诚（如在授旗典礼、悼念死者和在唱歌和庆祝活动中表现出来），最后特别指在政治争论中，在地地道道的竞选斗争中毫不含糊地被

成和运用暴力。

法西斯政党遵循可以比较的思想意识，追求以根本的矛盾心理为特征的目标。法西斯主义思想不只是单纯掩盖着的、工具主义化的宣传和手腕，而是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反现代主义和特别现代的因素、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和倾向于跨国的因素。但是，这种矛盾关系并不是所有的法西斯主义都以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各法西斯主义之间和一个法西斯党的历史之内有量的差别，但没有质的差异。

意大利的民族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把纲领中大多故意表述得模糊不清的反资本主义要点推向后面。在匈牙利的“箭十字党”、罗马尼亚的“铁卫军”、长枪党的一部分、多里奥的法国人民党和“合并”以前的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中反资本主义条款比较明显。相反，在奥地利的护国军、挪威的“民族统一党”、比利时的雷克斯、其余的法国法西斯党的一部分和荷兰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同盟那里则表现得比较含糊。

在法西斯主义思想意识中的反现代主义和特别现代的因素方面也有类似情况。在德国纳粹党、“铁卫军”和“乌斯塔莎”那里可以发现极端反现代主义的目标。然而，这些运动也决不放弃使用特别现代的宣传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工具和方法。因此，既不能把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一般地描绘成专门反现代主义的，也不能把它说成是“对现代性的冲击”甚至是“社会革命”。

所有法西斯党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大多以各自民族史的某些“光荣”时代为指针。尽管如此，恰恰是较小的法西斯

主义运动，不管它愿不愿意，必须适当考虑其他法西斯主义运动特别是法西斯政权的民族利益。正因为它们把一个外国的、即法西斯主义的样板奉为楷模，所以这些党不仅遭到左派而且也遭到极端民族主义的右派力量的反对。这就给它们的发展造成很大困难。有些较小的法西斯党是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权已经稳固并且推行一种大大损害同法西斯“兄弟党”的团结的民族政策的时刻成立的，它们的发展尤其困难。一般可以这么说，法西斯政党的民族导向与超越国界的（法西斯主义）导向和联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模式建立一个“法西斯国际”的企图几乎毫无意义，这件事绝非偶然。另一方面，正是第三帝国懂得，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是一件超越国界的任务。全欧洲的许多法西斯分子在党卫队的队伍中参加了消灭苏联的斗争。正是由民族社会主义大力强调的种族主义部分也显示出某种超越国界的色彩，导致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一些法西斯主义分子支持第三帝国制定的目标，旨在按照种族标准建立欧洲新秩序。然而，关于第三帝国的“欧洲任务”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未能掩盖这一事实。即在反共产主义和超越国界的种族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斗争其实是为德国帝国主义的目的效劳的。

此外，所有法西斯政党都显示出一种坚决地、毫不妥协地消灭政敌和（一部分是随意选出的）少数民族的意志。它们既无情地反对，同时又拉拢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保守党中的对手（这点也是法西斯主义基本上自相矛盾的又一标志）。几乎所有的法西斯党都特别激烈反对各自的犹

犹太人少数民族。这种反犹太主义以宗教的、社会的，特别是种族的因素作为“依据”。意大利的民族法西斯党、西班牙的长枪党、芬兰的拉普阿运动、挪威的“民族团结党”和荷兰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同盟在这方面都是例外，因为它们或者根本没有确立、或者只是相当温和地规定了反犹太主义目标。这有种种原因。有些法西斯党，例如荷兰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同盟显然出于策略上的原因避免使用露骨的反犹太主义的语言，因为这样做会遭到大部分民众的批评。相反在另一些国家，反犹太主义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如在挪威）几乎没有犹太人，或者因为（如西班牙）人们认为其他少数民族比少数犹太人危险得多。意大利也是如此，它相当晚才颁布反犹太主义的法令，但是在这以前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南蒂罗尔人等少数民族已经遭到迫害，这一点今天被忽视了。

同样被忽略的还有这一事实：民族社会主义者除了犹太人以外，也残酷迫害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吉卜赛人和波兰人）。然而，应该考虑到，民族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灭绝意志的强烈程度和残忍性方面虽然同其他法西斯主义不见得有根本的差别——只要想一想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和罗马尼亚的“铁卫军”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采取的恐怖措施就知道了——但是在把思想意识上的目标化为采用工厂方式来大量屠杀犹太人的实践方面，官僚机构的完备乃是德国“激进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特征。如果说民族社会主义能够不为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算计所迷惑，毫不妥协地实现种族培育和种族灭绝的乌托邦的反动目标，那么其原因也在于民族社会主义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相比具有其不同的发展和结构。

1922年，当民族法西斯党参加政府时，它在意大利议会总数 535 个议席中只占有 35 个席位。它是依靠史无前例的恐怖活动掌权的，先是从村庄到村庄，然后从城市到城市，最后从省到省，对政敌进行恐吓、殴打、拷问和谋杀，破坏敌对政党的据点。德国的纳粹党则相反，它在 1928 年的“向柏林进军”失败后，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恐怖行动，但从根本上看它追求这样的目标，即以议会最大的党的身分来夺取政权，然后从内部摧毁议会制。1932 年 7 月选举中，它得了 37.2% 的选票，在国会 608 个议席中得到 230 个席位。尽管在 1932 年 11 月的选举中，它不得不忍受损失，但它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仍然是德国最强大的政党。因此纳粹党能够在不到 4 个月的时间里把它的政敌排除出去并迫使保守党盟友同它保持一致。墨索里尼为此花费了大约 6 年时间，而且始终依靠其盟友——官僚、军人、工业界和教会——的支持。虽然在第三帝国多头掌权的特征也不容忽视，但是纳粹德国比意大利的“极权国家”极权得多。

在其他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只有奥地利的护国军、罗马尼亚的“铁卫军”和西班牙很弱的长枪党能够不靠外国的帮助进入了政府。但同德国和意大利不同，在这里实现了包围保守党盟友的计划。1936 年只有 35600 多名党员的西班牙长枪党不过是 1937 年成立的法西斯统一党的一个部分，这个统一党从一开始就由佛朗哥操纵，后来也没有能够压制军人、工业界和教会的决定性的影响。奥地利的护国军 1930 年有成员 15 万人，但选举中得票只占总票数的 6%，它的影响被独裁政府的首脑陶尔斐斯和许士尼格逐步压制下去，最后完全丧

失了独立地位。罗马尼亚的“铁卫军”在1937年的选举中曾获得16%的选票和300个议席中的66个席位，虽然也被安东尼斯库接纳参加政府，但后来在一次血腥的恐怖行动中却被消灭了。

匈牙利的箭十字党人在1935年的选举中获得25%的选票，它同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和在人数上几乎无足轻重的“民族统一党”（在1933年的议会选举中只得2.8%的选票）一样，仅仅依靠外国法西斯势力，特别是第三帝国的支持才得以掌握政权，并或多或少依赖德国的保护及占领的力量。

在其他法西斯主义派别中，只有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获得了群众基础。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芬兰、比利时和荷兰的法西斯党，它们曾获得一定的、但暂时的政治影响，而丹麦和瑞典的法西斯党始终是无足轻重的派别，它们只有几千名成员。相反，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保加利亚和葡萄牙的政权与其说是法西斯专政，还不如说是独裁政权。

如果试图从地理角度划分各法西斯主义，那就看不出相互间的明确联系了。在北欧和西欧，除了比较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法国和有一定差距的英国、比利时和芬兰——之外，也有很弱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瑞典、丹麦和荷兰。在中欧和南欧也有类似情况。与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不同，在瑞士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力量很小的法西斯党。在东欧和东南欧，克罗地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而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保加利亚和希腊，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规模很小，甚至就没有出现。在西

班牙，特别在葡萄牙原有的相当弱小的法西斯政党被并入各自的国家党并被剥夺了权力。

如果试图按照一种社会经济原则划分，那就会碰到似乎不可解决的更大的难题。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同农业社会一样都有强大和弱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那些一般地把法西斯主义同资本主义或现代化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作某种联系的理论是不恰当的。

因为在两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党产生于社会经济方面大不相同的国家，所以各法西斯党的社会基础也有明显的差别。然而应该指出这一问题的比较研究还不很发达。往往缺乏有关各法西斯党的领袖、积极分子、成员和选民的社会出身的可靠和可比的报告。加之，法西斯党的社会成分随着地区和时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里可举德国纳粹党为例。起初它几乎完全由旧中产阶级成员组成，但后来在一些地区也争取到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员。一些法西斯主义派别同初期的法西斯党一样主要由大学生、军官、职员以及一些工人和农民组成——由于数量很小不能进行具体的社会分类——，除这些法西斯主义派别外，在其余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奥地利的护国军、法国的几个法西斯团体、比利时的雷克斯运动和芬兰的拉普阿运动以及较小的荷兰民族社会主义者同盟都更具有中产阶级性质。然而就是在这里，老中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小工商业主——和新中产阶级——职员和公务人员——之间的比例也大不相同。主要受农业影响的，除了拉普阿运动外，还有奥地利的护国军，而荷兰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中心则在城市，工人党员比例较高的

是匈牙利的箭十字党（估计工人占41%）、法国的法国人民党和（有一定差距的）英国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长枪党（在初期）。匈牙利的箭十字党、罗马尼亚的“铁卫军”和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完全可以看作是下层人民的党。然而，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的现有水平不容许作出法西斯主义一般地可视为中产阶层的党或人民党的结论。

尽管对整个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的进一步研究十分重要，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职能问题不仅给社会基础问题作了补充，而且甚至使它部分地具有相对的局限性。最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决非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且也以工业界、农业界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为基础。不过，在这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人从中得利”的问题不能开展。只有由法国香水厂主科蒂建立和资助的“法兰西团结党”符合共产党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为一般法西斯主义描绘的图象。他们一再断言，法西斯党从一开始就得到工业界权势集团的资助和领导，然而至今的研究不是证实而是驳斥了这一论断。不过，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缺陷特别大。除了初期曾得到地主的重要的财政和政治支持的民族法西斯党以外，对奥地利的护国军、芬兰的拉普阿运动和比利时的霍克斯的资助也是有据可查的。就是德国纳粹党也从工业界和农业界方面得到过物质援助。不过，在纳粹党成为群众党以后，资助者才付出较大的数额。最后，民族法西斯党和纳粹党从工农业巨头以及从保守党的政治力量那里获得的政治支持比财政支持更为重要。然而，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党与工

业、农业和保守党的政治力量之间结成“联盟”，而在其他存在有群众基础的法西斯党的国家却不是这种情况。

至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西斯党的兴起基于哪些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这一问题上，而几乎所有法西斯党都对相当年轻的人能予特别大的吸引力这一事实虽然已经证实，但至今只得到令人很不满意的解释。一种对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的比较研究刚刚开始。人们至今还不知道，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大多数年轻的而且几乎全是男性的追随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某些精神特征（如恐惧、好斗和其他独断专横的性质）。

相反，几乎所有法西斯主义理论家都赞同的，法西斯党能在发生危机的局势下产生和兴起的论点却得到了证实。不过，这一点不仅取决于经济危机的规模，而且主要取决于经济危机是否导致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危机。这里有种种阻碍的和促进的因素。根据目前的研究水平还不能确立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和规模与其他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稳定关系。

对保持民主制和防御法西斯主义来说特别重要的首先是在资产阶级党、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达成妥协的意愿。在瑞典和挪威，正是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默认的社会民主党和农民党之间的联盟大大使得瑞典和挪威的法西斯党始终是没有影响的派别。荷兰的例子表明，一个牢固结合的天主教、社会民主党和新教的环境或“阵营”的存在也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受到阻挠。魏玛共和国的天主教选民以及社会民主党选民也表明是有类似的抵抗力的，只是后者不如前者。相反，少数民族和信仰宗教的少数派的存在大多导致民主制的分

化，从而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这方面瑞士是一个例外，因为在这里模范地解决了语言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没有被法西斯党的宣传所利用。有几个国家（丹麦、瑞典、挪威），国家干预的和遵循赤字开支原则的经济政策有助于迅速克服失业现象，因此各法西斯党未能利用经济形势为自己作宣传。然而总的看来，还必须再次指出，今天还说不出，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经受过的经济危机的哪些形式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在一些国家里，19世纪就已确立了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目标的反议会制群众运动的存在对法西斯党的产生和兴起起了有利的影响。这是指奥地利和德国的泛德意志运动以及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协会”，尤其是“法兰西行动”。然而是否能把这些运动划为“早期法西斯主义”一事还有争议。这个概念同“亲法西斯主义”的概念一样是一种单纯的辅助结构。相反，“新法西斯主义”这一表达方式的运用是成问题的，甚至是应该反对的，因为1945年以后产生的法西斯党在思想和组织方面明显受“典型”法西斯主义样板的影响。假如它们真正展示出新的成分，那就应该给它们找一个别的、新的名称。

总的说来，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具有某种的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把德国的“激进法西斯主义”同意大利的“标准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法西斯运动区别开来。然而人们至少可以按启迪学的精神坚持一种普遍的、但有细微差别的法西斯主义概念。安杰洛·塔斯卡的警告说：“给法西斯主义下定义，必须先写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就是今天丝毫也没有丧

失它基本的正确性。然而，正如塔斯卡本人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杰作所证明的那样，这并不是说，人们在对各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时，应该放弃30年国际法西斯主义讨论的理论开端、论点和假设。应该把它们当作“中等有效范围的理论”集中起来，因为只有一种根据的解解释和总结的理论既不能正确评价法西斯主义的“多样性”，也不能正确评价个别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的这一事实。看来在目前寻求一种包罗一切和解解释一切的全盘理论是没有好处的，这样做只会导致为概念进行没有结果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争论。比较重要和有效的办法是去推动根据经验并以多种方法所进行的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

注 释

导 言

-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汉堡，1922年，第310页。
- ② 同上，第57页。
- ③ E·诺尔特，《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法西斯主义》、《法兰西行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慕尼黑，1963年，常引书。

第 1 章

- ① F·舍特赫费尔，《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思想和现实》，法兰克福，1924年，第84页。
-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彼得格勒/莫斯科，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汉堡，1923年，第731页。
- ③ J·布劳恩塔尔，《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暴动》，载于《斗争》，第15章，1922年，第320至323页；A·雅各布森：《法西斯主义》，载于《国际》，第5期，1922年，第301—304页。
- ④ 参阅以下著作，W·维佩曼，《论法西斯主义的分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理论（1921—1945年）》，法兰克福，1961年，第59页及以下几页。
- ⑤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论点和决议》，汉堡，1924年，第121页。
- ⑥ J·W·斯大林，《论国际形势》，载于同上作者文集第8卷，柏林，1952年，第252页及下一页，《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

- 汉堡，1924年，第65和67页。
- ⑦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记录》(非编略本)，第1卷，埃朗根，1974年，第724页及下一页。
- ⑧ 参阅W·维佩曼：上引书《法西斯主义理论》，《论当前讨论的水平》，达姆施塔特，1980年第4版，第19页及下几页；同上作者，《战后德国左派和法西斯主义》，载于《现代史杂志》第2期，1976年，第185—220页。
- ⑨ D·艾希霍尔夫和K·格斯魏勒编，《法西斯主义研究。地位、问题、争论》，柏林，1980年，第15页。
- ⑩ 《法西斯主义和欧洲，1969年8月18—29日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2卷本，布拉格，1970年；M·拉科，《中东欧法西斯主义》，对一般法西斯主义定义的一篇论文，载于《现代史季刊》，第21期，1973年，第39—51页；M·欧尔莫什和M·尼茨译，《欧洲法西斯政权(1919—1939年)》，布达佩斯，1976年。对此还有A·达什米特的详细谈话《1919—1939年欧洲法西斯政权》，一篇匈牙利论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文章，载于1978年第1—2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作组公报，第77—99页；F·雷什卡：《特殊国家的制度》，弗罗茨瓦夫，1984年；《1918—1939年中东欧的独裁专政》，布雷斯拉夫，1974年。
- ⑪ C·兰道尔和H·霍内格尔编，《国际法西斯主义。关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性质和状况以及运动领导思想和动力的起源》，卡尔斯鲁厄，1928年。
- ⑫ G·帕克尔，《第一步》，载于1930年《社会》第7/I期，第97—103页。
- ⑬ A·席夫林：《欧洲的反革命》，载于1931年《社会》第8/I期，第1—21页。
- ⑭ A·古兰德，《无产阶级行动的今日。阶级斗争中的障碍和变化》，柏林，1931年。
- ⑮ 参阅同上，第111和112页。

- ⑩ F·博尔肯瑙：《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学》，载于E·诺尔特编，《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科隆，1967年，第156—161页。
- ⑪ 古兰德，第114页及下几页。
- ⑫ 参阅W·维佩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波拿巴主义理论》，斯图加特，1983年，第201页及下几页。
- ⑬ 参阅K·P·赫普克，《德国右派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一篇论德国右派集团的自我理解和政策的论文，杜塞尔多夫，1969年；M·米茨埃利斯，《希特勒上台前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关系》（1922—1933年），载于《意大利历史杂志》，第85期，1973年第544—600页。
- ⑭ 诺尔特，引上书《法西斯主义》，同一作者，《法西斯主义运动。自由主义体制的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慕尼黑，1966年。
- ⑮ 参阅维佩曼，上引书《法西斯主义理论》，第77页及下几页。
- ⑯ 诺尔特，上引书《法西斯主义》，第515页及下几页。
- ⑰ 诺尔特，上引书《危机》，第234页。
- ⑱ W·席德尔编，《法西斯主义作为社会运动。德国和意大利的比较》，汉堡，1976年。
- ⑲ H·罗格和E·韦伯编，《欧洲的右派。一个历史的侧面》，斯图加特，1965年；W·拉克和C·L·莫斯编，《国际法西斯主义》，慕尼黑，1966年；F·L·卡斯滕，《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法兰克福，1968年；St·J·伍尔夫编，《欧洲法西斯主义》，伦敦，1968年；Ch·F·德泽尔编，《地中海地区法西斯主义（1919—1945年）》，纽约，1970年；P·休格编，《战胜国本国的法西斯主义（1919—1945年）》，圣巴巴拉，1971年；H·卢巴斯编，《法西斯主义：三个主要政权》，纽约，1973年；W·拉克编，《法西斯主义：读者指南》，伦敦，1976年；St·U·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主义分子？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根源》，贝尔根，1966年。
- ⑳ H·-U·塔默尔和W·维佩曼：《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经验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研究问题》，达姆施塔特，1977年；St·G·佩

- 恩：《法西斯主义。比较和定义》，麦迪逊，1980年。
- ⑳ K·D·布拉赫尔：《现代史争论。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民主制问题》，慕尼黑，1976年，第13页及下几页；同一作者：《历史中开字锁的号码》，杜塞尔多夫，1978年，第119页及下几页；同一作者：《1917年至1975年的欧洲危机》，柏林，1976年，第34页及下几页。
- ㉑ R·德费利切：《法西斯主义。M·A·勒德昂的谈话。附有J·珀泰桑的跋》，斯图加特，1977年。
- ㉒ A·J·格雷戈尔：《激进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派》，普林斯顿，1974年。
- ㉓ H·A·特纳：《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槽丁根，1972年，第157页及下几页。
- ㉔ G·阿勒代斯：《什么样的法西斯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对一种概念收缩的思想》，载于《美国历史评论》第84期，1979年，第367—368页。
- ㉕ K·希尔德布兰特：《第三帝国》，慕尼黑，1979年，第123页及下几页。
- ㉖ B·马丁：《论法西斯主义延伸概念的适用性。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比较》，载于《现代史季刊》，第29期，1981年第48—73页。
- ㉗ 对这些观点的批判有：塔默尔和维佩曼上引书，第1页及下几页。
- ㉘ 特纳：上引书，第7页。
- ㉙ 最好的概括有：W·施兰根：《极权主义理论。发展和问题》，斯图加特，1976年。
- ㉚ 布拉赫尔上引书：《开字锁的号码》。
- ㉛ R·科泽勒克：《序言》，载于O·布龙纳等编：《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百科》，第1卷，斯图加特，1972年，第Ⅴ—XⅩ页。

- ② 参阅维佩曼：《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
- ③ 参阅维佩曼：《法西斯主义理论》，第11页及下几页；同一作者：《战后德国的左派》。
- ④ 这一论点的最著名代表是，S·M·利普泽特：《“法西斯主义”、左派、右派和中间派》，载于诺尔特编：《理论》，第449页及下几页。
- ⑤ 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作独特解释的例子有，A·拉布廖拉：《反法西斯主义的争论》，那不勒斯，1925年；H·黑勒：《欧洲和法西斯主义》，柏林，1931年。对民族社会主义作独特解释的例子有，W·M·麦戈文：《从路德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史》，伦敦，1946年；R·D·O·巴特勒：《1783—1933年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源》，伦敦，1942年；M·弗里德贝格：《波兰和德国的文化。中世纪波兰宪法和文化中的本国因素和德意志的影响》，波森，1946年；J·费尔德曼：《历史上的波德问题》，卡托维兹，1943年；F·哈岑多夫：《这么发生的。德国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歧路》，莫斯科，1946年，第2版；A·阿布施《一个民族的歧途。理解德国史的一篇论文》，柏林，1946年。对这方面的阐述还有，W·维佩曼：《“德国的灾难”还是“金融资本的独裁”？对第三帝国的解说史》，载于H·登克索和K·普吕姆编：《第三帝国的德国文学》，斯图加特，1976年，第9—43页。
- ⑥ D·E·阿普特：《现代化方针》，芝加哥，1963年；C·A·布萊克：《现代化的动力》，纽约，1966年；A·F·K·奥根斯基：《政治发展的阶段》，纽约，1966年。
- ⑦ 首先对此作“经典”研究的有，E·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苏黎世，1945年；W·赖希：《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哥本哈根，1933年。多方面令人感兴趣的有，K·特韦莱特：《男人的想象力》，2卷本，法兰克福，1977/78年。
- ⑧ 这一论点最著名的代表是，F·迈因内克：《德国的灾难。观察和回忆》，威斯巴登，1946年；参阅W·维佩曼：《F·迈因内克著《德

国的灾难》——掌握德国过去的一次尝试》，载于M·埃尔贝编：《今日F·迈因内克》，柏林，1981年，第101—121页。

- ④ 对此有，希尔德布兰特：上引书，第126和132页及下几页。
- ⑤ H·-U·韦勒尔，《历史社会科学史》，法兰克福，1973年，第31页。
- ⑥ M·霍克海默尔，《犹太人和欧洲》，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8期，1939/40年，第115页。
- ⑦ E·布洛赫，《法西斯主义作为非同时出现的形式》，载于诺尔特编：上引书，《理论》，第187—204页。
- ⑧ A·塔斯卡：《信念、服从、斗争。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维也纳，1969年，第374页；《给法西斯主义下定义，首先要写法西斯主义史》。

第 2 章

- ① 除属于“经典”研究的塔斯卡，《信念》外，E·冯·贝克拉特：《法西斯国家的本质和形成》，柏林，1927年；P·南尼：《六年内战》，巴黎，1938年；G·萨尔韦米尼：《法西斯主义问题文集》，2卷本，米兰，1963年，第3版；下列著作作了全面叙述：L·萨尔瓦托雷利和G·米拉：《法西斯时代的意大利史》，都灵，1964年，第4版；D·L·杰尔米诺：《意大利法西斯党的上台。极权主义统治的研究》，明尼阿波利斯，1959年；G·卡罗奇：《法西斯主义史》，米兰，1963年，第3版；F·卡塔拉塔：《意大利从专制独裁走向民主政体——1919至1948年》，米兰，1962年；诺尔特，《法西斯主义》；E·圣雷利：《法西斯运动与法西斯政权史》，2卷本，罗马，1967年；A·卡斯尔，《法西斯意大利》，伦敦，1969年；G·夸扎编，《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社会》，都灵，1973年；A·阿夸罗内和M·韦尔纳萨：《法西斯政权》，2卷本，米兰，1974年；E·德费利奇，《墨索里尼传》，1—3卷，都灵，1965—1974年；塔默尔和佩佩曼：上引书《运动》，第166页及下几页；E·坦南鲍

解：《法西斯主义经历。1922—1945年意大利社会和文化》，纽约，1972年；R·萨尔蒂编：《中间的这把斧。行动中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纽约，1974年；E·诺尔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18—1960年共和国最初的10年》，载于Th·席德尔编：《欧洲史手册》，第7卷，斯图加特，1979年，第619—650页；席德尔编：上引书《法西斯主义》。

- ② 关于法西斯主义之前意大利的社会和经济史有，S·克拉夫：《近现代意大利经济史》，纽约，1964年；R·罗梅：《意大利大工业简史》，罗卡·圣卡西亚诺1963年，第2版；P·卡拉乔拉编：《工业意大利的形成》，巴厘，1963年；K·普里斯特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经济和思想基础》，科隆，1972年。
- ③ 关于意大利直至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政治史有，Ch·塞顿-沃森：《1870—1925年从自由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伦敦，1967年；E·诺尔特：《从成立民族国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1870—1916年）》，载于Th·席德尔：《欧洲史手册》，第6卷，斯图加特，1969年，第401—432页。
- ④ 关于意大利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F·加埃塔：《意大利民族主义》，那不勒斯，1965年；W·阿尔弗：《1910年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协会》，载于同一作者：《法西斯主义概念和对现代史的其他文章》，法兰克福，1971年；W·席德尔：《1914年前的意大利帝国主义方面》，载于W·H·蒙森编：《现代帝国主义》，斯图加特，1971年，第140—171页；普里斯特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第53页及下几页。
- ⑤ 关于墨索里尼的传记有，德费利奇：《墨索里尼传——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者》，第1卷；诺尔特：《法西斯主义》，第200页及下几页。
- ⑥ E·R·罗森：《1915年意大利参战是焦利蒂时代的内政问题》，载于《历史杂志》，第187期，1959年，第289页及下几页。
- ⑦ 特别有下列著作，R·维瓦雷利：《战后意大利与法西斯主义的兴

起(1918—1922年)》，那不勒斯，1967年。

- ⑧ 罗密欧，《简史》，第124页及下几页；克拉夫，《经济史》，第197页及下一页；普里斯特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第133页及下几页。
- ⑨ P·斯普里亚诺，《1920年9月占领工厂》，都灵，1964年；M·阿布拉特，《1906—1926年意大利工业化时期的工会斗争》，都灵，1967年；维瓦雷利，《战后时期》，第71页及下几页；诺尔特，上引书《法西斯主义》，第249页及下几页。
- ⑩ 维瓦雷利，《战后时期》，第242页及下几页；Ch·迈尔，《重新瓜分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年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稳定》，普林斯顿，1975年，第310—313页；区域范围内的具体叙述，P·科纳，《费拉拉的法西斯主义(1915—1925年)》，牛津，1975年。
- ⑪ 关于邓南遮行动及其对法西斯主义的意义，维瓦雷利，《战后时期》，第500—530页；诺尔特，《法西斯主义》，第240—243页。
- ⑫ 对此和以下，塔斯卡：上引书《信念》，第117页及下几页；诺尔特，上引书《法西斯主义》，第253页及下几页；A·利特尔顿：《夺取政权。1919—1929年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纽约，1973年。
- ⑬ 对此综合叙述的有，W·席福尔，《意大利法西斯党在统治稳固阶段中的结构变化》，载于同一作者编：《法西斯主义》，第69—98页；J·佩特森，《1919—1928年间意大利的选民态度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载于同上第119—156页。
- ⑭ A·雷帕奇，《向罗马进军》，米兰，1972年；德费利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282页及下几页。
- ⑮ 特别是利特尔顿，《夺取政权》，第121—135页。
- ⑯ 对此并对工业界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E·罗西：《蒸汽机的主人》，巴里，1955年，上述版本，《蒸汽机的主人与法西斯主义》，巴里，1965年；P·梅洛格拉尼，《企业家与墨索里尼。工业家联合会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米兰，1972年；R·瓜尔涅里：《两次大

战间的经济战》，2卷本，米兰，1953年，R·萨尔蒂：《1919—1940年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工业界领导。对法西斯主义领导下的私人权力的扩张研究》，伯克利，1971年；J·佩特森：《1919—1929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工业界》，载于《社会。马克思理论论文集》，第7篇，法兰克福，1976年，第139—189页；E·诺尔特：《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和法西斯主义》，载于W·席德尔编：《法西斯主义》，第183—204页。

- ⑭ 对此并特别是以下：德费利奇：《墨索里尼传》，第2卷，利特尔顿：《夺权》，第176页及下几页；A·阿夸罗内：《极权国家的组织机构》，都灵，1965年，第15页及下几页。
- ⑮ G·罗恰特：《陆军与法西斯主义》，载于夸扎编：《法西斯主义》，第69—124页；G·米科利：《教会与法西斯主义》，载于同上，第182—208页；A·林特：《极权主义时代。政治教世说和尘世的觉醒》，斯图加特，1981年，第50—78页。
- ⑯ P·C·迈耶—塔施：《社团主义和独裁主义。对社会职业等级法学和政治学思想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法兰克福，1971年，阿夸罗内：《组织机构》，第82—87页；萨尔蒂：《法西斯主义》，第75页及下几页。
- ⑰ 参阅注释⑭提到的文献，特别是萨尔蒂：《法西斯主义》，第100页及下几页；德费利奇：《墨索里尼传》，第2篇，第222页及下几页，和第3卷，第56页及下几页；罗密欧：《简史》，第167页及下几页；St·J·伍尔夫：《存在法西斯主义经济体系吗？》，载于同一作者编：《法西斯主义的性质》，伦敦，1968年，第119—151页。
- ⑱ 对法西斯意大利对外政策的全面叙述有：R·德费利奇：《对墨索里尼对外政策的评述》，载于《Saeculum》第24期，1973年，第314—327页；同一作者：《墨索里尼传》，第3卷，第923—633页；J·佩特森：《法西斯意大利对外政策中的社会体制、思想和利益》，载于《意大利档案和图书馆资料和研究》第54期，1974年，第428—470页；同一作者：《法西斯意大利对外政策的历史编纂问

题》，载于《现代史季刊》第22期，1974年，第417—457页。

- ② 对法西斯主义社会政策的一体化所起的作用有：德费利奇：《墨索里尼传》，第3卷，第32页及下几页；坦纳鲍姆：《法西斯主义的经历》，第108页及下几页；C·范农特利：《1920—1939年意大利工人的生活水平》，载于萨尔蒂编：《斧》，第163页及下几页。
- ③ 特别是以下著作：J·佩德森：《希特勒—墨索里尼。1933—1936年柏林—罗马轴心的产生》，落宾根，1973年；④ 注释所引资料。
- ④ 关于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和抵抗运动史，A·加罗希：《意大利侨民史》，巴里，1953年；P·阿拉特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主义》，罗马，1965年；R·巴塔利亚：《意大利抵抗运动史（1943年9月8日—1946年4月25日）》，都灵，1964年，第2版；Ch·F·德尔泽尔：《墨索里尼的敌人。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普林斯顿，1961年；《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教训与证据》，1—2卷，米兰，1962年。
- ⑤ 对此有：F·W·迪金：《残忍的友谊。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没落》，科隆，1962年。

第 3 章

- ① 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比较：W·席德尔：《法西斯主义作为社会运动。全面论述魏玛共和国史》，A·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史》，科隆，1924年，第16版；E·艾克：《魏玛共和国史》，2卷本，苏黎世，1974年，第4版；K·德德凯：《1817—1933年的帝国和共和国》，斯图加特，1969年；W·托尔明：《魏玛共和国》，汉诺威，1975年，第10版；W·普格：《1917—1933年的德国》，柏林（东），1974年，第2版；H·海贝尔：《魏玛共和国》，慕尼黑，1974年，第7版；G·舒尔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德国（1918—1945年）》，格丁根，1976年；K·D·布拉赫尔：《1917—1975年欧洲危机》，柏林，1976年。
- ② 全面论述纳粹党史，W·舍费尔：《纳粹党。第三帝国国家党的发

展和结构》，汉诺威，1956年；O·奥洛夫：《纳粹党史》，2卷本，匹兹堡，1969—1973年；G·舒尔茨：《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德国的危机和革命》，柏林，1975年；K·佩措尔德和M·魏斯贝克尔：《1920—1945年纳粹党史》，科隆，1981年。论述纳粹党早期史；G·弗朗茨-维林：《希特勒运动。1919—1922年它的起源》，汉堡，1962年；W·马泽尔：《纳粹党早期史。希特勒直到1924年所走的道路》，法兰克福，1965年；A·蒂雷尔：《从吹鼓手到领袖。希特勒1919至1924年间自我理解的转变和纳粹党的发展》，慕尼黑，1975年；U·洛哈尔姆：《民族激进主义。1919—1923年的德意志民族攻守同盟》，汉堡，1970年；D·施特格曼：《在镇压和操纵之间。1910—1918年保守派权势集团与工人和雇员运动。对德国工人党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早期史的一篇论文》，载于《社会史档案资料》，第12期，1972年；K·格斯魏勒：《资本、国防军和纳粹党（1919—1924年）》，柏林，1982年。

- ③ M·H·卡特尔：《早期纳粹党的社会结构研究》，载于《现代史季刊》，第19期，1971年，第124—159页。
- ④ 关于纳粹党的思想；诺尔特：《法西斯主义》，第348至355页和第398—408页；J·费斯特：《希特勒。一本传记》，柏林，1973年；M·普勒夫尼亚：《在走向希特勒的道路上。“民族”政论作者D·埃卡特》，不来梅，1970年。全面论述思想背景；K·宗特海默尔：《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慕尼黑，1958年；A·莫勒：《1918—1922年德国保守派革命》，达姆施塔特，1972年，第2版；J·佩措尔德：《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保守理论家。魏玛共和国青年保守派思想作为法西斯独裁的精神开拓者》，柏林，1978年。
- ⑤ H·贝内克：《希特勒和冲锋队》，慕尼黑，1962年。
- ⑥ 参阅下列著作；H·H·霍夫曼：《希特勒暴动》，慕尼黑，1951年；E·多伊尔莱因：《希特勒暴动》，斯图加特，1962年；H·J·戈登：《1923年希特勒暴动。1923—1924年巴伐利亚的权力之争》，法兰克福，1971年，格斯魏勒，第413页及下几页。

- ⑦ G·席尔特，《西北部工作组，1925—1926年纳粹党史探讨》，哲学博士论文，弗赖堡，1964年；R·屈恩尔：《1925—1930年民族社会主义左派》，迈森海姆，1966年；U·韦茨：《纲领和领袖原则。纳粹党内施特拉塞集团问题》，哲学博士论文，埃尔兰根，1966年；M·H·凯莱：《纳粹分子和工人》，查佩尔·希尔，1972年；W·霍恩：《领袖思想和纳粹党内的党组织（1919—1933年）》，杜塞尔多夫，1981年，第2版；P·许隆贝格尔：《纳粹党大区领袖。对纳粹党内权力变化的研究》，斯图加特，1969年。
- ⑧ 对此有：H·赫内：《佩骷标志集团。党卫队史》，法兰克福，1969年，第69页及下几页。
- ⑨ 卡特尔：《早期纳粹党的社会结构研究》；同一作者：《民族社会主义夺权过程中纳粹党内的社会变化》，载于W·席德尔编：《法西斯主义》，第25—68页；H·A·温克勒尔：《中产阶级运动，还是人民党？论纳粹党的社会基础》，载于同上第97—118页；R·曼编：《民族社会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分析》，斯图加特，1980年；P·H·默克尔：《阿贝尔集团的纳粹分子。他们为什么加入纳粹党？》，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主义分子》，第268—282页，参阅下面注释⑫。
- ⑩ A·福斯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合会。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和民族社会主义》，杜塞尔多夫，1973年；M·H·卡特尔：《1918—1933年德国的学生和右翼激进主义》，汉堡，1975年。
- ⑪ 对此还有下述参考资料：H·蒙森等编：《魏玛共和国的工业体系和政治发展》，杜塞尔多夫，1973年，常引书。
- ⑫ 以下同时代著作对研究民族社会主义选民的社会成分有指导性意义，Th·盖格尔：《中产阶级的恐惧》，载于《作品》第7期，1930年，第637—663页；H·奈泽尔：《选举结果的社会统计分析》，载于同上第655—659页；S·黑默尔：《中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策》，载于同上第9期，1932年，第265—272页；C·米伦道夫：《什么是民族社会主义？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地志学》，载于《社会主义

新刊物》第2期，1931年，第149—154页；T·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形成》，斯图加特，1932年；R·希伯利：《从民主主义到纳粹主义》，巴吞鲁日，1946年；同一作者：《农村居民和民族社会主义》，斯图加特，1963年。最新研究的综合著作，D·H·奇尔德斯，《民族社会主义投票的社会基础》，载于《现代史杂志》，第11期，1976年，第17—42页；J·W·法尔特，《谁帮助纳粹党取得胜利？对1924—1933年纳粹党选民的党派政治和社会背景的最新研究成果》，载于《政治和现代史》，第28/29期，第8—21页；同一作者：《1924—1933年走向纳粹党的选民运动。方法问题——以经验为保障的认识——公开的问题》，载于O·比施编，《欧洲史上的选民运动》，柏林，1980年，第159—202页。

⑭

除注释⑫所提到的盖格尔、奈泽尔、米伦道夫等同时代著作外，特别还有，A·施魏策尔，《中产阶级的纳粹化》，斯图加特，1970年；H·A·温克勒尔，《中产阶级、民主和民族社会主义。魏玛共和国手工业和小商业者的政治发展》，科隆，1972年；同一作者：《从抗议到惊恐。魏玛共和国的中产阶层工商业者》，载于蒙森等编，《工业体制》，第778—791页；E·格雷宾，《法西斯主义、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载于IWK第12期，1976年，第443—460页；H·施派尔，《民族社会主义的职员》，赫丁根，1977年。

⑮

对这一论点的分歧意见有：维佩曼，《法西斯主义理论》，第11—56页和第138—148页。此外有，R·扎格，《法西斯主义理论》，慕尼黑，1976年；E·亨宁，《1933—1938年德国社会和经济史的论点》，法兰克福，1977年；同一作者，《德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和法西斯主义》，法兰克福，1977年；D·斯特格曼，《论1930—1933年大工业界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关系》，载于《社会史档案资料》，第13期，1973年，第399—482页；同一作者：《1929—1933年德国的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初期军备经济繁荣期间大工业优先地位恢复的论点和材料》，载于《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第6期，法兰克福，1978年，第19—91页；R·内贝：《1830—1933

年大工业界和纳粹党》，格丁根，1981年。

- ⑬ H·马策拉特和H·A·图尔纳尔：《1930—1932年纳粹党的自筹资金》，载于《历史和社会》，第3期，1977年，第93—108页。
- ⑭ 参阅以下著作：维佩曼：上引书《分析》，第9页及下几页。
- ⑮ S·巴内：《德国共产党和魏玛的终结。1932—1935年一项政策的失败》，法兰克福，1976年，第2版；O·K·弗勒希特海姆：《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共产党》，法兰克福，1969年，第2版；Th·魏因加特纳：《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崛起。1922—1934年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对德政策》，柏林，1970年；K·-E·勒内：《挑衅的法西斯主义。1920—1935年《红旗》和《前进》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争论》，科隆，1981年。
- ⑯ R·M·亨特：《1918—193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纽黑文，1964年；E·蒙森：《防守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静止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载于同一作者编：《阶级运动和人民党之间的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1974年，第106—133页；W·韦特：《以选票反对法西斯主义。魏玛共和国最后阶段中社会民主党反法西斯主义的困境》，载于W·胡贝尔和J·施韦特登格编：《和平，暴力，社会主义》，斯图加特，1976年，第358—403页；B·黑贝尔—孔策：《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论1932—1935年社会民主党政治和组织的发展》，法兰克福，1977年；H·黑尔：《党派斗争中止还是阶级斗争。论1930—1933年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政策》，请伊维德，1973年；E·马蒂亚斯：《德国社会民主党》，载于他同R·莫尔赛合编：《1933年党派的终结》，杜塞尔多夫，1960年，第101—278页；K·罗赫：《黑红黄国旗队，对魏玛共和国政治战斗组织的类型学的一篇论文》，杜塞尔多夫，1966年。
- ⑰ K·D·布拉赫尔等：《民族社会主义的夺权。对德国1933—1934年建立极权主义统治体制的研究》，科隆，1962年，第2版；

全面论述第三帝国史，诺尔特：《法西斯主义》，第419页及下几页；M·布洛萨特：《希特勒国家。其内部精神状态的基础和 发展》，慕尼黑，1975年，第5版；K·D·布拉赫尔：《德国的独裁。民族社会主义的产生、结构和后果》，科隆，1978年，第5版；W·费希尔等：《1933—1939年的德国》，柏林，1969年；W·布罗萨特等：《1939—1945年的德国》，柏林，1969年；W·舒曼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第1—4卷，柏林，1974—1981年；W·戴斯特等：《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斯图加特，1975年；希尔德布兰德：《第三帝国》。

- ④ M·梅塞施米特：《纳粹国家的武装部队。思想影响的时期》，汉堡，1969年；K·J·米勒：《陆军和希特勒。1933—1940年的军队和纳粹政权》，斯图加特，1969年；J·迪尔费尔：《魏玛、希特勒和海军。1920—1939年的德国政策和海军建设》，杜塞尔多夫，1973年；R·阿布佐隆：《第三帝国的武装部队》，1—3卷，博帕德，1969—1975年。
- ⑤ F·齐普费尔：《1933—1945年在德国的教会斗争。纳粹时期的宗教迫害和教会的自我保持》，柏林，1965年；G·森曼：《天主教会和第三帝国》，慕尼黑，1965年；J·S·康瓦：《1933—1945年纳粹教会政策。它的目标、矛盾和挫折》，慕尼黑，1969年；K·朔尔德尔：《教会和第三帝国》，第1卷，柏林，1977年。
- ⑥ 关于第三帝国的多头政治性质的论点有：E·弗伦克尔：《双重国家》，法兰克福，1974年（1940年纽约初版）；F·诺伊曼：《庞然大物。1933—1944年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实践》，法兰克福，1977年（1942/44年纽约初版），还有其他论著：H·蒙森：《第三帝国的官员》，斯图加特，1967年；赫内：上引书《奥团》；P·迪尔-蒂勒：《第三帝国的党和国家。1933—1945年纳粹党和一般国家内部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探索》，慕尼黑，1969年；布罗萨特：《希特勒国家》；R·博尔穆斯：《罗森贝格和他的对手》，斯图加特，1970年。综合著作有：P·许滕贝克尔：《纳粹的多头政

治》，载于《历史和社会》，第2期，1976年，第417—442页。这一问题的争论著作：G·希施费尔德和L·克滕纳克编，《“领袖国家”，神话和现实。对第三帝国结构和政策的研究》，斯图加特，1981年。

- ⑤ 对纳粹恐怖体系的论著：赫内；上引书《集团》；齐普费尔：《教会斗争》；同一作者：《盖世太保和保安处》，柏林，1960年；H·布赫海姆等：《剖视党卫队国家》，2卷本，弗赖堡，1965年；S·阿龙宗：《海德里希和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初期（1931—1935年）》，柏林，1962年；J·德拉吕：《盖世太保史》，杜塞尔多夫，1964年；M·布洛萨特编：《集中营史研究》，斯图加特，1970年；F·平格尔：《党卫队统治下的囚徒。集中营里的反抗、自身保持和灭绝》，汉堡，1978年。
- ⑥ H·朔尔恩：《作为强权政治手段的民族社会主义法制》，法兰克福，1963年；G·布赫海特：《穿着红色法衣的法官。弗赖施勒尔——人民法庭庭长》，慕尼黑，1968年；W·瓦格纳：《纳粹国家的人民法庭》，斯图加特，1974年；H·罗宾宗：《司法—政治迫害。1936—1943年汉堡邦法院对“种族迫害案件”的判决》，斯图加特，1977年。
- ⑦ G·赖特林格尔：《最后解决。1933—1945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试验》，柏林，1956年；W·舍夫勒：《1933—1945年第三帝国的反犹迫害》，柏林，1960年；R·希尔伯：《灭绝欧洲犹太人》，芝加哥，1961年；G·舍恩贝尔纳：《黄星。1933—1945年欧洲的反犹迫害》，汉堡，1960年；布哈海姆等编：《解剖》，2卷本，第283—448页；U·D·亚当：《第三帝国的反犹政策》，杜塞尔多夫，1972年；K·德罗比施等：《卐字旗下的犹太人。1933—1945年德国犹太人的迫害与灭绝》，柏林，1973年；K·佩措尔德：《法西斯主义、种族狂、反犹迫害。对法西斯的德国帝国主义政治战略和策略的研究（1933—1945年）》，柏林，1975年；H·G·阿德勒：《被统治的人。从德国驱赶犹太人》，蒂宾根，1974年。

- ④ H·布哈海姆：《1940年5月驱赶吉卜赛人》，载于《现代史研究所的鉴定》，慕尼黑，1968年，第51—61页；H·-J·德林：《纳粹德国的吉卜赛人》，汉堡，1964年；F·韦尔夫林：《论纳粹主义统治下对德国中部吉卜赛人的迫害和灭绝》，载于《哈雷—符腾堡马丁·路德大学学报》，第14期，1965年，第501—508页；S·施泰因梅茨：《在纳粹国家里的奥地利吉卜赛人》，维也纳，1966年；J·S·霍曼：《德国迫害吉卜赛人史》，法兰克福，1981年。
- ⑤ Ch·克勒斯曼：《1870—1945年鲁尔区的波兰矿工。德国工业协会中一个少数民族的社会一体化和民族文化》，格丁根，1978年；H·普法尔曼：《1939—1945年德国战争经济中的外籍工人和战俘》，达姆施塔特，1968年；平格尔：《囚徒》；Ch·施特赖特：《非伙伴。1941—1945年的武装部队和苏联战俘》，斯图加特，1974年；E·泽贝尔：《法西斯战争经济中的强迫劳工》，柏林，1964年；D·马耶尔：《第三帝国的外来人》，博帕德，1981年。
- ⑥ 除注释⑤所列全面介绍第三帝国史外，还有下列著作论述纳粹社会和经济政策：A·S·米尔瓦尔德：《1939—1945年德国战争经济》，斯图加特，1966年；D·佩青那：《第三帝国的多头政治。纳粹四年计划》，斯图加特，1962年；同一作者：《两次大战期间的德国经济》，威斯特巴登，1977年；D·艾希霍尔夫：《1939—1945年德国战争经济史》，第1卷，柏林，1969年；W·菲舍尔：《1918—1945年德国经济政策》，奥普拉登，1968年，第3版；F·福斯特迈埃尔和H·-E·福尔克曼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经济和军备》，杜塞尔多夫，1977年；T·W·梅森编：《工人阶级和民族共同体》，奥普拉登，1975年；同一作者：《第三帝国内的社会政策》，1977年；D·舍恩鲍姆：《褐色革命》，科隆，1968年。
- ⑦ 论述第三帝国对外政策的有：H·-A·雅各布森：《1933—1936年纳粹对外政策》，法兰克福，1958年；K·希尔德布兰德：《1933—1945年德国对外政策。估计还是教条？》，斯图加特，1975年，第3版；A·库恩：《希特勒的对外政策纲领。1919—1939年的产生和

发展》，斯图加特，1970年；A·希尔格鲁贝尔：《19和20世纪的德国大国政策和世界政策》，杜塞尔多夫，1977年；M·冯克编：《希特勒，德国和大国。第三帝国对外政策资料》，杜塞尔多夫，1976年；W·米哈尔卡编：《纳粹对外政策》，达姆施塔特，1978年；G·尼德哈特编：《1939年的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与爆发》，达姆施塔特，1976年；E·福德兰等编：《民族社会主义威胁下的对内对外政策。实例研究历史中国际关系的进程表》，奥普拉登，1977年；舒曼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戴斯特等：《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 ⑧ 对此的论著首先有：希尔德布兰德：上引书《估计》，第114页及下几页；同一作者：《普鲁士—德国民族国家史中希特勒的位置》，载于《历史杂志》，第217期；1973年，第584—632页；A·希尔格鲁贝尔：《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德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和间歇性》，杜塞尔多夫，1983年。
- ⑨ 对第三帝国反抗运动的全面概述，H·罗特费尔斯：《反希特勒的德国反对派》，法兰克福，1964年；G·魏森堡编：《无声的起义。1933—1945年德国抵抗运动的报告》，法兰克福，1974年，第4版；W·施米特亨纳尔和H·布哈海姆编：《德国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科隆，1966年；G·普卢姆：《抵抗运动》，载于《苏维埃体制和民主社会》，第6卷，弗赖堡，1972年，第961—983页；G·冯·罗恩：《第三帝国的抵抗运动》，慕尼黑，1978年；P·霍夫曼：《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颠覆的问题》，慕尼黑，1977年；Ch·克勒斯曼和F·平格勒编：《民族社会主义的对手。探索历史实际的学者和抵抗战士》，法兰克福，1980年；R·勒文塔尔和P·v·Z·米伦：《1933至1945年德国的抵抗和抗拒》，柏林，1982年；K·马姆马哈：《1933—1939年德共和德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法兰克福，1974年。对工人运动抵抗的概述，H·J·赖希哈特：《工人运动抵抗的可能性和界线》，载于施米特亨纳尔和布哈海姆编：上引书《抵抗》，第169—213页；W·阿本德罗特：《工人运动的抵抗》，载于

- E·魏克编：《1933—1945年德国的抵抗。在学校教科书中的研究和叙述的观点》，海德堡，1967年，第76—96页；D·波伊克特：《反对第三帝国的德国工人抵抗》，柏林，1981年，第3版；《德国工人运动史》，第5卷，《1933年1月至1945年5月》，柏林，1966年。
- ⑤ 关于德共的抵抗，巴内：《德国共产党》，H·杜克：《1933—1945年的德共》，科隆，1972年；A·西沃特克：《德国的人民民主，1935—1949年德共政治主张的研究》，杜塞尔多夫，1971年；D·波伊克特：《德共在抵抗中。1933—1945年莱茵河岸和鲁尔区的迫害和地下工作》，乌珀塔尔，1960年；G·尼切：《泽夫科夫—雅可布—贝斯特莱因集团》，柏林，1967年；G·格隆达耶夫斯基和H·舒曼：《诺伊鲍尔—波泽尔集团》，柏林，1957年；I·比克劳泽：《舒伯特—恩格尔特—克雷斯集团》，柏林，1966年；K·H·比尔纳特和L·克劳斯哈尔：《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舒尔茨—博伊森/哈纳克组织》，柏林，1970年。
- ⑥ 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总工会的抵抗，L·J·埃丁格尔：《社会民主党和民族社会主义》，汉诺威，1960年；P·格拉斯曼：《1933—1945年社会民主党人反希特勒》，慕尼黑，1968年；R·屈斯特迈埃尔：《红色突击队》，柏林，1970年；F·莫拉夫：《“统一”的口号和社会党。论德国社会民主党1933—1948年在地下时期和战后初期的党组织和社会政治的方向》，波恩，1973年；K·克里姆：《反对第三帝国的社会主义抵抗运动。论述“新开端”集团》，哲学博士论文，马尔堡，1957年；H·I·赖希哈特：《新开端，对反纳粹主义抵抗史的一篇论文，载于《德国中部和东部史年鉴》，第12期，1983年，第160—188页；R·勒文塔尔：《抵抗集团“新开端”》，柏林，1982年；J·V·弗赖贝格：《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1934—1937年统一行动问题之前的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者》，科隆，1973年；H·埃斯特斯和H·佩尔格尔：《抵抗运动的工会干部》，汉诺威，1967年；L·赫肖尔德：《总体国家那边的工人运动，工会和1944年7月20日》，1944年，维也纳，1963年。

- ④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派别的抵抗, K.-H. 恰登:《“德共反对派”的结构和职能》, 迈森海姆, 1964年; Th. 贝尔格曼:《1928年12月30日至1978年12月30日德共(反对派)的50年》, 汉诺威, 1978年; H. 德雷克斯勒:《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迈森海姆, 1965年; J. 布雷默尔:《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3—1945年地下和逃亡时期》, 法兰克福, 1976年; W. 林克:《国际青年图书馆和国际社会主义斗争联盟史》, 迈森海姆, 1964年。
- ⑤ L. 尼特哈默尔等编,《1945年工人首创精神》, 乌珀塔尔, 1976年。
- ⑥ 齐普费尔, 上引书《教会斗争》; 康韦, 上引书《教会政策》; E. 贝特格:《迪特里希·邦赫费尔。神学家—基督徒—同时代人》, 慕尼黑, 1978年; K. 迈埃尔:《新教教会斗争》, 2卷本, 格丁根, 1976年; G. 冯·诺登:《纳粹夺权这一年内的新教教会》, 居特斯洛, 1979年; H. 普罗林霍伊尔:《1934—1935年K·巴尔特事件》, 诺因基尔兴, 1977年; J. 施密特:《教会斗争中的M·尼默勒》, 汉堡, 1971年。
- ⑦ 莱维, 上引书《天主教会》; H. 米勒:《天主教会和民族社会主义》, 慕尼黑, 1965年; K. 戈托和K. 雷普根编:《教会、天主教徒和民族社会主义》, 美国谈, 1980年。
- ⑧ G. 里特尔:《卡尔·格尔德勒和德国抵抗运动》, 斯图加特, 1966年, 第3版; G. 布赫海特:《L·贝克》, 慕尼黑, 1964年; P. 霍夫曼:《抵抗—政变—暗杀》, 慕尼黑, 1969年; G. 冯·罗恩:《抵抗运动的重新组合。德国抵抗运动内部的克莱强集团》, 慕尼黑, 1967年; 米勒:《陆军和希特勒》; B. 朔伊里希:《H·冯·特雷夫夫》, 奥尔登堡, 1973年; Ch. 聚克斯:《A·冯·特罗特》, 科隆, 1969年; F.-D. 舒伦堡伯爵:《在国家利益至上和叛国之间》, 汉堡, 1964年; K. 芬克尔:《毛奇伯爵和克莱强集团》, 柏林, 1978年; F. 冯·毛奇等:《1907—1945年H·J·冯·毛奇》, 斯图加特, 1975年; K. 芬格尔:《施陶芬贝格》, 柏林, 1967年;

Chr·米勒,《总参谋部上校施陶芬贝格》,比塞尔多夫,1971年。

- ② 地区性和日常反抗和抵抗的事例:K·克洛茨巴赫:《反纳粹主义。在多特蒙德市的抵抗和迫害》,汉诺威,1969年;H·-J·施泰因贝格:《1933—1945年在埃森的抵抗和迫害》,波恩,1974年;M·布洛萨特和E·弗勒利希编,《纳粹时期的巴伐利亚》,第2—4卷,慕尼黑,1979—1981年;D·波伊克特和J·罗伊勒克编,《对纳粹统治下日常生活史的系列完整的论文》,乌珀塔尔,1981年;D·波伊克特,《同胞和异族。纳粹统治下的适应、灭绝和反抗》,科隆,1982年。
- ③ 普卢姆,《抵抗运动》,P·许滕贝格尔,《对“抵抗运动概念”的初探》,载于J·科卡编,《历史学家实践理论》,格下根,1977年,第117—139页;T·-D·施拉姆,《反纳粹主义的德国抵抗运动。它对联邦德国在机构和教科书方面所起影响的意义》,柏林,1980年;W·维佩曼,《民主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现实与思想》,柏林,1980年。

第 4 章

- ① 有关奥地利法西斯主义史的论著:A·G·怀特塞德,《奥地利》,载于罗杰和韦伯编,《欧洲的右派》,第302—363页;L·杰利卡:《奥地利卫国防军》,载于《现代史杂志》第1期,1966年,第127—144页;诺尔特,上引书《危机》,第252—256页;G·雅格那茨:《1946年前在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载于《法西斯主义和欧洲》,第2篇,第76页及下几页;F·费尔纳,《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背景》,载于林格编,《法西斯主义》,第15—23页;J·拉恩:《独裁的奥地利》,载于同上;G·克林根施泰因:《对奥地利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述评》,载于《历史和文献中的奥地利》,第14期,1970年,第1—13页;B·F·保莱,《公鸡尾和十字架。1918—1934年施蒂里亚护乡团和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维也纳,1972年;P·L·卡斯滕,《奥地利法西斯主义。从舍纳勒尔到希特

勒》，慕尼黑，1977年；W·霍尔策，《1918—1938年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载于《奥地利》，第1篇，1978年，第79—170页；G·博茨，《对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支持的改变方式（1918—1945年）》，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主义分子？》，第202—225页；B·F·波利，《纳粹分子和卫国军法西斯分子：争夺奥地利的最高领导权（1918—1938）》，载于同上，第226—238页。

- ② 参阅下列全面叙述第一个奥地利共和国史的论著：E·贝内迪克特编，《奥地利共和国史》，维也纳，1954年/慕尼黑，1977年；W·戈尔丁格尔，《奥地利共和国史》，维也纳，1962年；E·霍尔，《1918—1938年的奥地利，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国家》，维也纳，1966年；S·克莱斯勒，《从革命到合并。1918—1938年的奥地利》，维也纳，1970年；G·博茨，《政治暴力。1918—1934年在奥地利的谋杀、冲突、暴动和骚乱》，慕尼黑，1976年；A·万德鲁斯卡，《1918—1970年从第一共和国成立到社会党一家独权时期的奥地利》，载于Th·席德尔编，上引书《手册》，第7卷，第823—832页。文献报告：U·克卢格，《民主制的困境。对1918—1938年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史的研究中期总结》，载于《新政治文献》，第23期，1976年，第219—247页。
- ③ 对政党体制的论著有：A·万德鲁斯卡，《奥地利的政治结构》，载于贝内迪克特编，《历史》，第23卷—465页；A·福克和H·-J·施泰因贝格，《运用选举和武器。奥地利社民党走向失败之路》，载于古贝尔和施韦特费格尔编，《和平、暴力、社会主义》，第261—495页；A·佩林卡，《等级还是阶级。1933—1938年奥地利基督教工人运动》，维也纳，1972年。
- ④ 有下列论著：A·C·怀德赛特，《1918年前的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海牙，1962年；综合论著，卡斯頓，《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第30—38页和第67—80页；博茨，上引书《方式》，第202页及下几页。
- ⑤ 关于卫国军史，特别有，卡斯頓，上引书《奥地利法西斯主义》，

第20页及下几页，保莱，上引书《公鸡屋》，同一作者，《纳粹分子》，第226页及下几页。

- ⑥ 对奥地利社民党反法西斯纲领有，顺克和施泰因贝格，上引书《运用选举和武器》，第461页及下几页，G·博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载于《现代史杂志》，第11期，1976年，第129—156页；Z·扎赫，《1918—1934年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的困境》，载于《特拉维夫大学德国史研究所年鉴》，第9期，1980年，第429—474页；塞佩曼，上引书《分析》，第9页及下几页。
- ⑦ J·霍夫曼，《普夫里默尔暴动。1931年施泰里亚卫国军的进程》，维也纳，1965年。
- ⑧ 对陶尔斐斯政权的论述有：拉恩，上引书《奥地利》，卡斯纳，上引书《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第211页及下几页；I·贝尔塔勒，《祖国阵线。历史和组织》，维也纳，1971年；L·克勒克斯，《民主的黄昏。墨索里尼、格姆伯斯和卫国军》，维也纳，1966年；L·耶特立卡，《奥地利的极权制度。对欧洲右派运动的一篇论文》，载于《政治和现代史》，第30期，1970年，第8页及下几页；J·拉恩和C·W·舒姆，《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政权。法西斯主义的还是独裁主义的？》，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主义分子？》，第249—256页。
- ⑨ 对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政变，有：G·雅戈席茨，《政变。1934年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奥地利》，格拉茨，1976年。
- ⑩ K·-J·西格弗里德，《普济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奥特马·施潘的社会形像》，维也纳，1974年。
- ⑪ 关于所谓“合并”和纳粹统治下的奥地利史，J·吉尔，《德国和合并》，伦敦，1963年；W·罗莎尔，《德意志共同体。赛斯—英夸特和合并》，维也纳，1971年；G·博茨，《奥地利并入德国。1938—1940年政治行政合并的计划和实施》，维也纳，1972年；N·绍斯贝格尔，《攫取奥地利。合并》，维也纳，1978年；D·里

森贝格，*《奥地利。从内政畸形发展到对外政策上的无能》*。载于福恩德兰等编：*《对内对外政策》*，第239—256页；K·R·施塔德勒：*《反映在纳粹档案中的1939—1945年的奥地利》*，维也纳，1966年；E·魏因切尔：*《太不公正。奥地利人和对犹太人的迫害（1938—1945年）》*，格拉茨，1969年。

- ⑬ 关于两次大战期间的匈牙利史：Th·冯·博吉亚伊：*《匈牙利史概论》*，达姆施塔特，1957年；C·A·麦卡特尼：*《匈牙利简史》*，爱丁堡，1962年；同一作者：*《10月15日。匈牙利现代史（1929—1945年）》*，2卷本，爱丁堡，1956—1957年；D·希拉吉：*《1918年以来的匈牙利，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卡达尔时代》*，载于高德尔编：引上书*《手册》*，第7卷，第863—919页。
- ⑭ 关于匈牙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史：诺尔特，引上书*《危机》*，第204—211页；E·代奥克：*《匈牙利》*，载于罗格和韦伯编：*《欧洲的右派》*，第364—407页；G·兰基：*《匈牙利法西斯主义问题》*，载于休格编：*《法西斯主义》*，第65—72页；G·巴兰尼：*《匈牙利法西斯主义根源》*，载于同上，第73—82页；M·洛茨科：*《箭十字党人，1935—1944年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布达佩斯，1969年；同一作者：*《中东欧法西斯主义》*，第39页及下几页；同一作者：*《匈牙利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根源。箭十字党》*，载于拉森等编：引上书*《谁是法西斯主义者？》*，第395—400页；G·兰基：*《1939年在布达佩斯的法西斯选举》*，载于同上，第401—417页；N·M·纳吉-塔拉维拉：*《绿衫党和其他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法西斯主义史》*，斯坦福，1970年；塔默尔和维佩曼，引上书，第99—103页。
- ⑮ 对此特别有：洛茨科，引上书*《根源》*，第395页及下几页；G·兰基，引上书*《法西斯选举》*，第401页及下几页。
- ⑯ 关于对外政策：M·D·芬约：*《希特勒、霍尔蒂和匈牙利。1941—1944年的德国关系》*，纽黑文，1972年；J·K·赫恩施：*《匈牙利的修正主义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蒂宾根，1967年。

- ⑯ 关于罗马尼亚史，M·胡伯：《罗马尼亚史概论》，达姆施塔特，1973年；H·L·罗伯茨：《罗马尼亚。一个农业国的政治问题》，纽约，1951年；G·罗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秩序到人民民主时代的东南欧诸国》，载于席德尔编，上引书《手册》，第7卷，第134—1313页；修订版，第1134页及下几页；K·-D·格罗特霍森编：《东南欧手册》，第2卷，《罗马尼亚》，格丁根，1977年。
- ⑰ 关于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史，E·韦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20世纪的革命学说》，伦敦，1964年；同一作者：《罗马尼亚》，载于罗格和韦伯编，上引书《右派》，第501—574页；同一作者：《天使长的追随者》，载于拉克尔和莫泽编，《国际法西斯主义》，第142—176页；诺尔特：上引书《危机》，第212—226页；E·图尔辛斯基：《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背景》，载于休格编：《法西斯主义》，第99—111页；St·菲希尔—加拉蒂：《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载于同上第112—121页；纳吉—塔拉维拉：《绿衫党人》，第12页及下几页；塔默尔和维佩曼，上引书，第109—119页。
- ⑱ 关于对外政策方面：A·希尔格普贝尔：《卡罗尔国王和安东内斯库元帅。1938—1944年的德罗关系》，威斯巴登，1964年。
- ⑲ 关于两次大战期间的南斯拉夫史，F·W·抗迪乌斯：《南斯拉夫各民族共同体》，海牙，1968年；St·K·帕夫洛维奇：《南斯拉夫》，伦敦，1971年；罗德：《东南欧诸国》，第1103—1226页；K·-D·格罗特霍森编：《东南欧手册》，第1卷，《南斯拉夫》，格丁根，1975年。
- ⑳ 关于南斯拉夫法西斯主义史，I·阿瓦库莫维奇：《南斯拉夫法西斯主义运动》，载于休格编：《法西斯主义》，第135—144页；D·德约尔杰维奇：《1918—1941年南斯拉夫的法西斯主义》，载于同上，第125—134页；L·霍里和M·布洛萨特：《1941—1945年的克罗地亚乌斯塔莎国家》，斯图加特，1964年；塔默尔和维佩曼，上引书，第91—99页。
- ㉑ 关于对外政策，J·维斯特：《南斯拉夫和第三帝国。1933—1945

年德南关系记事》，斯图加特，1969年；J·霍普特纳：《1934—1941年危机中的南斯拉夫》，纽约，1962年；R·J·文特：《英国和德国“对东南欧的压迫”。两次大战期间南欧的资本关系和商品来往》，载于弗里茨·菲舍尔的生日文集，杜塞尔多夫，1973年，第483—532页。

- ② 关于西班牙史的概述：R·卡尔：《1808—1933年的西班牙》，牛津，1965年；R·科内茨克：《1873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载于席德尔森，引上书《手册》，第6卷，第505—538页；同一作者：《1917—1960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独裁政权时期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载于同上，第7卷，第651—638页。
- ③ 关于社会和经济史，E·E·马利费基斯：《西班牙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革命。内战的根源》，纽黑文，1970年。
- ④ 关于政党系统的发展：D·诺伦：《19世纪西班牙议会制》，迈森海姆，1970年。
- ⑤ 关于军队的作用：St·G·佩恩：《近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和军事》，斯坦福德，1967年。
- ⑥ 关于西班牙左派：P·布鲁埃和É·泰米纳：《西班牙的革命和战争》，法兰克福，1962年；St·G·佩恩：《西班牙的革命》，纽约，1970年；E·E·马利费基斯：《左翼政党和第二共和国》，载于R·加尔编《西班牙共和国和内战》，伦敦，1971年。
- ⑦ 关于西班牙共和国史：布鲁埃和泰米纳，上引书；加尔编，上引书《共和国》；G·杰克逊：《1931—1939年的西班牙和内战》，普林斯顿，1965年；R·A·H·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右派、共和国和革命，1931—1936年》，牛津艾博特，1970年。
- ⑧ 关于西班牙法西斯运动史，St·G·佩恩：《长枪党。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史》，斯坦福德，1962年第2版；B·内勒森：《不准的革命。长枪党的崛起和没落》，汉堡，1933年；H·托马斯：《荒凉地区的英雄》，载于拉克和莫斯编，引上书，第240—262页；塔默尔和维

佩曼，引上书。

- ② 对此现有：S·G·佩恩：《西班牙长枪党的社会组成和地方势力》，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主义者》，第423—434页。
- ③ 关于内战：布鲁埃和泰米纳，引上书；加尔编：《共和国》；H·托马斯：《西班牙内战》，法兰克福，1964年；W·席德尔和C·迪佩尔编：《国际政治中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慕尼黑，1976年。
- ④ 关于第三帝国的政策和目标：M·默克斯：《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中的德国政策》，波恩，1963年第2版；M·艾因霍恩：《1936—1939年德国在西班牙的法西斯干涉的经济背景》，柏林，1962年；H·-H·阿本德罗特：《西班牙舞台上的希特勒，1936—1939年自内战爆发至世界大战爆发在欧洲利益政策紧张地区内的德西关系》，帕德博恩，1973年；席德尔和迪佩尔编：《内战。论德西关系的进一步发展》，D·S·德特维勒：《希特勒、佛朗哥和直布罗陀，西班牙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威斯巴登，1962年；K·-J·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班牙，佛朗哥、长枪党和第三帝国》，汉堡，1975年。
- ⑤ 关于佛朗西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其他历史：J·J·林茨：《西班牙过去和将来的政党制度》，载于S·M·利普塞特和S·罗坎编：《政党制度和选民阵线》，《全国基督教展望》，伦敦，1967年，第197—282页；同一作者：《从长枪党到运动组织》，《西班牙唯一的政党和佛朗哥政权》，载于P·亨廷顿和C·H·穆尔编：《近代社会的独裁政治。建立一党制的动力》，纽约，1970年，第128—203页；K·冯·拜迈：《从法西斯主义到发展型独裁——西班牙的权贵和反对派》，慕尼黑，1971年；M·加洛：《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史》，巴黎，1969年；J·热奥尔热尔：《佛朗哥主义，1939—1969年的历史和总结》，巴黎，1970年；W·豪布里希和C·R·莫泽尔：《佛朗哥的遗产。西班牙走向今日之路》，科隆，1976年。
- ⑥ 为此继续提供下列参考书目：维佩曼：《波拿巴主义理论》，第202

页及下几页和第41页及下几页，K·哈默尔和P·C·哈特曼编，《波拿巴主义。历史奇迹和政治神话》，慕尼黑，1977年；A·鲁基埃：《波拿巴分子的假设和半竞争制度的出现》，载于《法国政治科学评论》，1975年第25期，第1077—1111页。

- ④ 关于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和布朗热主义，Th·泽尔J，《1848—1945年的法国》，第1卷，牛津，1973年；A·当瑟特：《布朗热主义》，巴黎，1946年；J·内雷：《布朗热主义和报刊》，巴黎，1964年。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评价：维佩曼，《波拿巴主义理论》，第41—86页。
- ⑤ 关于法国法西斯主义的这些思想意识和政治方面的先驱，R·雷豪：《从第一次复辟到第五共和国的法国右派政党》，巴黎，1963，第172页及下几页；Z·斯特恩埃耳：《莫里斯·巴雷斯和法国民族主义》，巴黎，1972年；诺尔特，《法西斯主义》，第90—183页；E·韦伯：《法兰西行动。20世纪法国的保皇主义与反动》，斯坦福，1962年；R·索西：《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莫里斯·巴雷斯事件》，伯克利，1972年。
- ⑥ 关于社会史和经济史：R·F·凯塞：《20世纪法国的社会与经济现代化》，伯克利，1966年；梅尔：《资产阶级的欧洲》，K·J·米勒：《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和现代化》，载于《现代史杂志》，第11期，1976年，第75—107页；A·索维：《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法国经济史》，第2卷，巴黎，1967年。
- ⑦ 关于第三共和国的历史，J·-P·阿泽马和W·维诺克：《第三共和国1870—1940年》，巴黎，1970年；Ph·贝尔纳：《一个世界的末日，1914—1929年》，巴黎，1975年；H·杜比夫：《第三共和国的没落。1929—1938年》，巴黎，1976年；Ch·布洛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制民主的发展和斗争》，斯图加特，1972年；R·冯·阿伯蒂尼：《法国的自由和民主》，弗赖堡，1957年；阿伯特尼：《从凡尔赛和约到第四共和国结束的法国，1919—1958年》，载于席德尔编：《手册》，第7卷，第438—480页；关于人民阵线：

- L·情丹和J·医夏德，《1936年人民阵线》，巴黎，1972年第2版。
- ⑧ 法国法西斯主义史概论：雷蒙，《右派政党》，第224页及下几页；J·普吕米恩和R·拉西拉，《法国的法西斯主义，1923—1963年》，巴黎，1963年；E·韦伯，《文集》，第139—143页；韦伯，《法国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载于《法国历史研究》，第2卷，1963年，第271—307页；诺尔特，《法西斯主义》，第90—103页；R·索西，《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实质》，载于拉克和莫斯编书，第46—85页；塔马尔和雅佩曼，第120—161页；Z·斯特恩埃耳，《法国法西斯主义的成员》，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分子？》，第479—503页。
- ⑨ 关于瓦卢瓦，Y·居舍特，《乔治·瓦卢瓦或法西斯主义者的幻想》，载于《法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期，1963年，第1111—1144页；Z·斯特恩埃耳，《法国法西斯运动的剖析：乔·瓦卢瓦的“束棒”》，载于《法国政治科学评论》，第26卷，1976年，第5—40页；J·利维，《乔治·瓦卢瓦和“束棒”》，载于《法国历史研究》，第6卷，1973年，第279—300页。
- ⑩ 关于“爱国青年”和“火十字团”首先有：普吕米恩和拉西拉，《法国法西斯主义》，第28—81页；Ph·马舍弗，《法国法西斯主义联盟，1919—1939年》，巴黎，1974年，第9—24页。
- ⑪ 参阅前所列书目。
- ⑫ 参看普吕米恩和拉西拉，《法国法西斯主义》，第46—65页；斯特恩埃耳，《成员》，第496页及下几页；R·索西，《作为阶级调和和道德更新的法国法西斯主义》，载于《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1971年，第291页及下几页。
- ⑬ 关于多里奥，D·沃尔夫，《多里奥运动。一篇法国法西斯主义史的论文》，斯图加特，1967年；G·D·阿拉迪西，《雅克·多里的政治转变》，载于拉克和莫斯编书第86—110页；阿拉迪西，《雅克·多里奥和法国法西斯思想》，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评论》1975年，第31—44页；J·-P·布律内，《多里奥分裂的反思》，载于《社会运动》，

第70期，1970年，第43—64页。

- ⑭ A·普法尔：《法国的战争一代和法西斯主义。政治作家P·德里厄·拉·罗歇尔》，慕尼黑，1971年；A·汉密尔顿：《法西斯主义的号召力。对知识分子和法西斯主义的研究，1918—1945年》，伦敦，1971年；T·肯纳斯：《德里厄·拉·罗歇尔、塞利纳、布拉西拉赫和法西斯分子的诱惑》，巴黎，1972年。
- ⑮ 关于贝当政权：R·帕克斯通：《法国维希。老警卫和新秩序，1940—1944年》，伦敦，1972年；H·米歇尔：《贝当、赖伐尔、达尔朗三政客》，巴黎，1972年；雷蒙：《右派政党》，第245—251页；A·西格弗里德：《贝当的维希政权，赖伐尔的维希政权》，载于《法国政治科学评论》，第6期，1956年，第737—749页；S·霍夫曼：《维希政权的观点》，载于同上杂志，第6期，1956年，第44—49；R·布尔代龙：《维希政权是法西斯主义的吗？》，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评论》，第23期，1973年，第23—24页。

第 5 章

- ① 关于两次大战期间英国的社会和经济史：J·霍布斯鲍：《英国经济史》，第2卷，法兰克福，1969年；D·A·奥尔克洛夫特：《两次大战期间(1919—1939年)的英国经济》，伦敦，1970年；B·W·E·阿尔福特：《萧条和复苏。1918—1939年英国经济的发展》，伦敦，1970年。
- ② 两次大战期间英国史概论：A·H·P·泰勒：《1914—1945年的英国史》，伦敦，1966年；Ch·L·莫瓦特：《两次大战期间(1918—1940年)的英国》，伦敦，1968年第2版。
- ③ 关于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史：C·克罗斯：《英国的法西斯分子》，伦敦，1961年；诺尔特：《危机》，第297—387；A·本尼威克：《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伦敦，1972年；W·F·曼德：《反抗主义和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伦敦，1968年；N·纽根特与R·金编：《英国右派。英国的保守党人和右翼政治》，伦敦，1977

年，J·D·布鲁尔，《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关于其成员身份的几个暂时结论》，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分子？》，第542—558。

- ④ 关于芬兰的历史，E·尤蒂卡拉和K·皮里宁，《芬兰史》，斯图加特，1976年第2版，第341及下几页；J·H·沃里宁，《芬兰史》，伦敦，1955年，第202页及下几页；E·尤蒂卡拉，《从争得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方向时期的芬兰，1918—1966年》，载于席德尔编，《手册》，第7卷，第1018—1106。
- ⑤ 对此，E·阿拉普罗，《大学生和国家政治：两次大战期间芬兰学生运动的比较研究》，载于《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研究》，第3期，1973年，第128页及下几页。
- ⑥ 关于拉普阿运动和“祖国阵线”，请尔特，《危机》，第237—241页；M·林塔拉，《三代。芬兰政治中的极右派》，布卢明顿，1962年，同一作者，《欧洲政治印象。民众的爱国运动》，载于《中欧事务杂志》，1963年第21期，第308—316页；R·克拉普罗，《芬兰民众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载于拉森等人编，《谁是法西斯分子？》，第678—686页；R·E·黑诺宁，《从民众运动到小党：芬兰人民爱国运动，1932—1944年》，载于同上书，第687—701页。
- ⑦ 两次大战期间比利时史概述，R·皮雷纳，《比利时史》，第4卷，布鲁塞尔，1962年；J·维莱克特，《1926—1965年的内战》，载于《比利时现代史，1914—1970年》，布鲁塞尔，1976年；F·佩特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欧洲一体化政策时期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1918—1970年》，载于席德尔编，《手册》，第8卷，第699—728页，特别是第705—707页。
- ⑧ 关于佛兰芒和瓦龙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J·斯坦赫斯，《比利时》，载于罗杰和韦伯编，《欧洲右派》，第128—166页；诺尔特，《危机》，第272—275页；R·巴埃，《若里斯·范·塞维伦其人》，布鲁塞尔，1965年；J·维莱克特，《比利时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评论》，1967年第17期。

第85—109页，J·-M·艾蒂安：《1940年前的雷克斯运动》，巴黎，1968年，L·舍彭斯：《比利时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1919—1940年》，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分子？》，第501—516页；D·沃利夫：《克里斯杜斯·雷克斯的成份》，载于同上书，第517—523页。

- ⑧ 荷兰史概述：佩特里：《比利时，荷兰》，第708—711页；G·盖斯曼：《荷兰的政治结构和行政制度》，法兰克福，1964年；A·莱伊法特：《荷兰的顺应政策，多元论和民主》，伯克利，1969年。
- ⑨ 关于荷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史：诺尔特：《危机》，第276—278页；H·v·d·乌斯滕和E·斯米特：《荷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力，1931—1935年》，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分子？》，第524—541页；A·A·德容：《荷兰的民族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产生和发展》，海牙，1968年；C·A·克罗伊：《一个“人民”运动的影响，1931—1934年荷兰的纳粹化和非纳粹化》，阿森1964年。
- ⑩ 关于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史：H·波尔森和M·德尤萨：《丹麦纳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分子？》，第702—713页；M·德尤萨：《丹麦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丹麦的纳粹党，1930—1945年》，哥本哈根，1979年；H·普尔森：《占领国与丹麦的纳粹分子》，哥本哈根，1970年。
- ⑪ 关于瑞典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史：E·韦伦斯塔姆：《瑞典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斯德哥尔摩，1972年；O·W·捷尔尼谢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瑞典法西斯主义思潮和组织》，载于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大学的科学杂志《北欧研究》，1974年第7期，第41—59页；B·哈格弗特：《在边缘上：瑞典法西斯主义，1920—1945年》，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分子？》，第715—722页。
- ⑫ 瑞典史概述，H·冯·格雷耶茨：《1848年以来的联邦国家》，载于《瑞士史手册》，第2卷，苏黎世，1980年第2版，第1019—1246页；E·邦儒尔：《瑞士中立史》，3—6卷，巴塞尔，1967—1970

年；E·格鲁内：《瑞士的政党》，伯尔尼，1977年。关于阵线史：W·沃尔夫：《瑞士的法西斯主义。瑞士德语区阵线运动史，1930—1945年》，苏黎世，1969年；B·格劳斯：《民族阵线。瑞士的法西斯主义运动，1930—1940年》，苏黎世，1969年；K·-D·策贝莱因：《瑞士德语区阵线主义的开端》，迈森海姆，1970年；B·格劳斯：《瑞士的民族阵线》，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分子？》，第467—478页。

- ⑩ 关于“民族统一党”，H·O·布雷维，《民族统一党是政党还是派别，1933—1937年》，奥斯陆，1989年；H·-D·洛克：《吉斯林、特尔波文和罗森贝格》，斯图加特，1970年；P·M·海斯：《吉斯林的生涯和政治思想，1887—1945年》，伦敦，1971年；S·U·拉森：《挪威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1933—1945年。成员出身资料分析》，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分子？》，第595—620页（附地方和区域的考察）；J·P·迈克利布和B·哈格弗特：《民族统一党党员基础的地区差别。挪威法西斯主义政治生态学研究，1933—1945年》，载于同上书，第621—650页；H·亨德里克森：《挪威东部和西部的农业法西斯主义，一个比较》，载于同上书，第651—656页；S·S·厄尔森：《谁给吉斯林投票？》，载于同上书，第657—666页；H·-D·洛克：《30年代对民族统一党的支持》，载于同上书，第667—677页。

- ⑪ 关于“斯洛伐克人民党”和蒂索政权，Y·吉利内克：《赫林卡的斯洛伐克人民党，1938—1945年》，布卢明顿，1966年；同上作者：《教士和法西斯主义，斯洛伐克的赫林卡党和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运动》，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分子？》，第367—378页。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史概述：J·赫恩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史，1918—1965年》，斯图加特，1978年第2版；H·德雷斯：《斯洛伐克和欧洲法西斯主义新秩序》，柏林，1972年；G·罗德：《捷克斯洛伐克从宣布独立到“布拉格的春天”，1918—1968年》，载于席德尔编：《手册》，第7卷，第920—977页，特别是第922—944

页。

- ⑫ 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兰史概述：H·罗斯：《波兰民族史，1915—1960年》，斯图加特，1964年第2版；H·罗德：《波兰史》，达姆施塔特，1979年第3版；E·D·怀诺特：《转变中的波兰政治。民族团结阵营和权力斗争，1935—1939年》，阿森斯，1974年；N·戴维斯：《上齐的游戏场。波兰史》，第2卷，牛津，1981年。关于民族主义潮流：F·戈尔切夫斯基：《波兰人的德国形像，1918—1930年》，杜塞尔多夫，1974年。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H·韦雷希基：《法西斯主义和波兰》，载于华加尔编：《法西斯主义》，第85—91页；P·S·万迪奇：《波兰的法西斯主义》，载于同上书，第92—98页。关于波兰对德国占领的抵抗：M·布罗察特：《民族社会主义的波兰政策》，斯图加特，1981年；Ch·克萊斯曼：《一个民族的自我维护。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和总督辖区的波兰抵抗运动（1939—1945年）》，杜塞尔多夫，1971年。
- ⑬ 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史概述：M·赫尔曼：《立陶宛史概要》，达姆施塔特，1966年；G·冯·劳赫：《波罗的海各国史》，斯图加特，1970年；J·冯·黑恩：《民主和专政之间的拉脱维亚》，慕尼黑，1967年；G·冯·劳赫：《30年代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议会制危机》，载于H·-E·福尔克曼编：《东欧和中欧的议会制危机》，马尔堡，1967年；G·罗德：《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立陶宛争取独立的斗争，1917—1944年》，载于席德尔编：《手册》，第7卷，第1052—1075页；A·冯·陶贝：《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作为独立的共和国和作为苏联的联盟共和国，1918—1970年》，载于同上书，第1107—1133页。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诺尔特：《危机》，第233—236页。
- ⑭ G·罗德：《保加利亚，1918—1960年》，载于席德尔编：《手册》，第7卷，第1241—1266页。
- ⑮ Ph·C·施米特：《葡萄牙独裁统治的社会起因、经济基础和政治责任》，载于拉森等编：《谁是法西斯分子？》，第435—466页。

第 6 章

- ① D·霍尔斯特和M·尼科利纳科斯编：《法西斯主义时代结束了吗？》，法兰克福，1971年；E·诺尔特：《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冷战，演讲和论文，1964—1976年》，斯图加特，1977年，第193—208页。关于新法西斯主义的概述，（不可靠的）概况，A·德尔博卡和M·乔瓦纳：《今日法西斯主义，世界概览》，伦敦，1970年；A·J·乔斯：《当今世界的法西斯主义》，博尔德，1978年。
- ② P·巴科雅尼斯：《希腊的军人统治。对超资本主义和晚期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斯图加特，1972年；M·尼科利纳科斯：《希腊的抵抗和反对派》，达姆施塔特，1974年。
- ③ 维佩曼：《法西斯主义理论》，第1页及下几页，和第49及下几页；布拉赫尔：《论争》，第13—32页；H·A·温克勒：《革命、国家、法西斯主义。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格丁根，1978年，第65—117页。
- ④ 维佩曼：《德国左派》，第185页及下几页；同上作者：《反法西斯主义》。
- ⑤ J·菲斯特塞：《非纳粹化。德国战后政策的一章》，诺伊恩德，1989年；L·尼特哈默尔：《巴伐利亚的非纳粹化。美国占领下的清洗和恢复权利》，法兰克福，1972年；同上作者等编：《工人主动性》，1945，乌珀塔尔，1976年。
- ⑥ R·亨基斯：《民族社会主义的暴行。历史和法庭》，斯图加特，1965年第2版；A·吕克尔：《对民族社会主义罪行的追究，1945—1978年》，海德堡，1979；P·施泰因巴赫：《民族社会主义的暴行。1945年以后德国公众的讨论》，柏林，1981年。
- ⑦ 关于德意志国家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党：O·比希和P·富尔特：《战后德国的右派激进主义》，柏林，1957年；M·延克：《是来自右派的密谋吗？论1945年以后德国的右派激进主义的论文》，柏林，

1961年，H·W·赫夫肯和M·萨特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右派激进主义。新老右派和新纳粹主义》，汉堡，1979年第2版，第15页及下几页。关于德国民族民主党：R·金尔等《德国民族民主党，一个新法西斯主义党的机构、思想和职能》，法兰克福，1969年；L·尼德哈默，《适应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民族民主党的政治实践》，法兰克福，1969年，M·罗沃尔特：《在权力的阴影下》，杜塞尔多夫，1974年。其他参考文献有：R·金尔，《联邦共和国的右派激进主义。一篇文献报道》，载于《PVS》，1969年第9期，第423—442页；K·P·瓦尔拉文：《民族主义和右派激进主义》，载于《新政治文献》，1969年第14期，第321—343页。

- ⑧ 关于所谓“新右派”，G·巴尔奇，《来自右边的革命？新右派的思想和组织》，弗赖堡，1975年；赫夫肯和萨特勒，《极右主义》，39及下几页。
- ⑨ R·施特斯，《从民族主义到环境保护。联邦共和国政党体系中的德意志共同体，独立的德意志人行动联盟》，奥普拉登，1980年。
- ⑩ J·彼得斯编，《新法西斯主义。上升中的右派》，柏林，1979年，第121—180页。
- ⑪ R·容克，《原子国家。论进入野蛮》，慕尼黑，1977年；H·格鲁尔，《一个行星被掠夺》，法兰克福，1978年。
- ⑫ H·M·布罗德纳，《德国觉醒。新纳粹分子——行动和挑衅》，博恩海姆—梅尔滕，1978年；J·波莫林和R·容格，《新纳粹分子》，多特蒙德，1978年；同上作者，《前进，我们在后走。新纳粹分子》，第2卷，多特蒙德，1979年；G·保尔和B·朔齐希编，《青年和新法西斯主义》，法兰克福，1979年；彼得斯编，《新法西斯主义》；A·迈尔和K·-K·拉贝：《我们即将到来的时刻》，博恩海姆—梅尔滕，1979年；W·本茨编，《右派激进主义。是无关紧要的现象还是复兴》，法兰克福，1980年；A·温克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法西斯主义。现象、背景、危险》，柏林，1980年；P·莱文希编，《被忽视的危险。联邦共和国的右派激进主

义》，赖因贝克，1981年。其他参考文献：U·巴克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极右主义》，载于《新政治文献》，1982年第27期，第147—201页。

- ⑬ S·克萊因，《披着羊皮的灰狼》，载于彼得斯编，《新法西斯主义》，第231—234页；联邦内政部长编，《关于：保护宪法'78》，波恩，1979年；同上作者编，《关于：保护宪法'80》，波恩，1981年。
- ⑭ W·哈贝特，《德国人是法西斯分子吗？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右派和极右派思想传播的研究结果》，汉堡，1979年；五百万德国人：“我们再要一个领袖……”。《关于德国人的极右主义态度的研究》，赖因贝克，1981年；A·齐尔伯曼，《我们是反犹主义者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种社会偏见的规模和影响》，科隆，1982年。
- ⑮ E·桑塔雷尼，《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罗马，1974年；P·罗森鲍姆，《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法兰克福，1975年。
- ⑯ 关于法国的新法西斯主义：S·霍夫曼，《布热德运动》，巴黎，1956年；普吕米恩和拉西埃拉，《法西斯主义》，第261页及下几页。
- ⑰ 关于英国的新法西斯主义：M·沃克，《民族阵线》，格拉斯哥，1972年；M·菲尔丁，《民族阵线》，伦敦，1980年；M·比利，《法西斯主义者。民族阵线的社会心理学概览》，伦敦，1978年；F·格雷斯和H·-G·雅施克，《德国和英语区域法西斯主义分析的新倾向。概况》，载于《新政治文献》，1982年第27期，第20—47页。